

●一九四五年

# 国共巨头在重庆

●「刮单干风」的

## 曾希圣沉浮记

●宋代改革中的左、中、右三派

●两岸离情四十年

●股票来了

●台湾爆炸案

●周恩来与

三峡工程

炎 崇  
春 秋



中国历史 总第100期

# 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

李学勤

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告诉我们，在中华的辽阔疆土上，早在史前时代便有许许多多的民族部落生息居处，逐渐扩大融合，对国家和文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全国各个地区和民族更是经常交往通会，开创出既有大量共同因素，又有各自不同特点的文化。因此，我们考察历史时必须注意到，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是各个民族共同缔造的。

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是古代很多民族的共同祖先，也是种种文明事物的创造者。早在两三千年的周代，已经流传着以炎黄二帝为祖先的谱系。古书中有关记载，尽管有些分散零碎，在细节上有不少出入，但是基本的轮廓是一致的，比较清楚的，这是因为这种谱系并非凭空杜撰，而是从远古传流下来，得到当时人们公认的。

有些学者认为炎黄二帝的传说，特别是黄帝事迹，是到战国时才兴起的，这个看法并不正确。在现存文献里面，关于炎帝，黄帝的最早记载是《逸周书》的《尝麦篇》。这一篇的文字有好多特点，肯定是西周时的文献，而且可以和《尚书》中的《吕刑》联系起来。篇中记有国王的一段话，详细讲述了赤（炎）帝，黄帝杀蚩尤的事情。至于记述春秋史事的《左传》、《国语》，谈到炎帝、黄帝的地方就更多了，还有收在《大戴礼记》书里的《五帝德》，《帝系》两篇，是孔子弟子所传，《史记·五帝本纪》正是根据它们编写的。

仔细研究这些史料，不难知道以下几点。

首先黄帝是先秦几个王朝的共同始祖，古书中常见，“三代”，指夏，商，周，有时前面再加上虞（包括唐尧，虞舜）称作四代。虞、夏的祖先是黄帝之子昌意，商、周的祖先是黄帝之子玄囂。这样的传说表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这几个王朝，虽然互相更代，仍有着血缘以及文化的联系。近年已有一些学者从考古学出发，对这种联系性进行很有意义的探讨。

黄帝据说有二十五子，其中十四子得姓（建立了部族），共有十二姓。《帝系》只提到玄囂，昌意二子，是由于其后裔建立王朝的缘故。容易推想，整个二十五子的分布，要比虞、夏、商、周王朝本身广泛得多。过去有些学者在这方面做过一些探索，如清代秦嘉谟的《世本辑补》。看他们的研究，可以知道很多古代方国

或民族都是有炎黄后裔的传说，有些是边远的民族。例如：北狄，传说是黄帝之孙始均的后裔，春秋时赤狄是姬姓，白狄是酉姓，都在黄帝之后十二姓以内。

熏粥，传说是夏的后裔，当然也就是黄帝的后代，据云夏桀死后，其子熏粥以桀的众妾为妻，逃到北方游牧，后被称为匈奴。这可能反映了夏人北迁的情况。

犬，传说是黄帝所生苗龙的后代。

氐人，传说是炎帝之孙灵枢（音契）的后人。

蜀，也与黄帝有关，黄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乾荒，乾荒生颡项。后来颡项的庶子封蜀，在夏、商、周三代作诸侯。

苗民，传说也为颡项之后。

商代在后来的齐地有逢国，其君伯陵是炎帝之孙。

越，传说是夏王少康庶子所封。

这一类传说，近世史学家多弃置不顾，以为是晚起的附会之谈。其实，在古代讲一个方国或者民族的始祖，是一件大得很的事，断不能信口雌黄。上面引述的这些古书中的说法，有的可能反映历史的实际，有的可能代表民族的融合，无论如何，都表明了炎黄二帝受到广泛宗奉的史实。

炎黄二帝系统以外的传说人物，当时也有流传，他们有的和炎黄系统有血缘关系，例如通婚，如上面提到的蜀山氏之类，有的尚待考定，但他们都在古代历史观察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连传说被黄帝所杀的蚩尤，后来也由于善战为人尊奉。《鹑冠子·世兵篇》甚至以黄帝百战与蚩尤七十二战相提并论。

如果我们再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炎黄二帝的意义更为明显，古书有许多炎黄时期发明创造的记载，尤其是黄帝时期的创造，多出于诸臣，如《世本·作篇》讲的，包括天文、历法、律吕、算数、乐器、图书、冕服、柞白、弓矢、驾牛、舟船等等，足见黄帝可称古代文明的象征。古代中国的各个民族，即使在血缘谱系上与炎黄传说无关，从文化来说，仍然在炎黄以来的大文化圈内，并且有所参与，有所贡献。炎黄二帝的传说，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长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样看来，今天世界上华人华裔自称炎黄子孙，是有道理的，我们说研究炎黄文化，就是要探讨和发扬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继  
张国涛 李学勤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戴 远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 社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 洪 炉

**总经理:** 徐 孔

**本期执行副总编辑:** 刘家驹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3-1170

印刷: 石家庄市塔冢印刷厂  
社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北京图书馆分馆内  
邮码: 100802  
美术编辑: 陈飞燕

〔专稿〕

**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

李学勤 ..... (1)

〔春秋笔〕

**1945·国共巨头在重庆**

黄济人 ..... (4)

**关于三峡问题的“御前”争论**

李 锐 ..... (13)

**周恩来与三峡工程**

陈先义 ..... (19)

〔英杰谱〕

**徐特立的四次整寿**

师秋朗 ..... (22)

**黄埔同学会在延安**

邵文彬 ..... (61)

〔殒星篇〕

**“刮单于风”的曾希圣沉浮记**

水 静 ..... (24)

**八一起义时的南昌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是——**

**中华英烈彭干臣**

陈先义 ..... (32)

**毛泽民当行长**

冯 都 ..... (36)

〔神州光〕

**十年厄运 十年辉煌**

— 邓小平授予解放军医学科学家黄翠芬“模范科学工作者”称号

窦红梅 窦孝鹏 ..... (38)

**“爆炸大王”李正华**

吴宗蕙 ..... (43)

〔九州景〕

鬼城丰都悠悠情

肖 岚 ..... (48)

重庆林园逸事

杨永革 范继河 ..... (53)

〔人海浪〕

张灵甫死之谜

张凤雏 ..... (58)

震惊台湾的麦当劳爆炸案始末

崔绍珍 于祖范 ..... (62)

轰动台湾的大陆演员王路遥

言 民 ..... (81)

〔古镜台〕

龚自珍兴王论中的改革观

郑超麟 ..... (65)

〔古今谈〕

宋代改革中的左、中、右三派

徐庆全 ..... (70)

〔同根结〕

两岸离情 40 年

徐志耕 ..... (76)

〔时代风〕

股票来了

刘宏伟 ..... (82)

〔访谈录〕

和平发展的中越边境贸易

阮生江 ..... (88)

画家李琦和《人小鬼大》

少 丹 ..... (30)

〔论谈窗〕

我爱《炎黄春秋》——读刊一年札记

思 忖 ..... (55)

关于王实味问题致读者

温济泽 ..... (94)

真实才是历史

霜 晓 ..... (94)

粗心大意 照片印反

赵勇田 ..... (95)

加强校对

朱 亮 姚锡佩 ..... (95)

哪些书代表中国文化 ..... (31)

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

征聘著者 ..... (92)

陈立夫为炎黄二帝塑像题词 ..... (31)

通 告

为方便与各方面的联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及《炎黄春秋》杂志社，已迁到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北京图书馆分馆内6号楼新址办公。

邮政编码：100802。电话号码：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601.6633-273。《炎黄春秋》杂志社 601.6633-227。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秘书处  
《炎黄春秋》杂志社

# 一九四五·

## 国共巨头在重庆

黄济人



毛泽东倚在桂园楼上房间的窗前，俯首之时，他竟被眼帘底下的景致吸引住了：一片片深黑色的屋瓦之上，正盘旋着一群白鸽，那平展开来的翅膀，由于颜色的强烈反差，连羽毛上的纹路都明晰可辨。

“你们都快来看呀！”毛泽东招呼着沙发上的张澜、沈钧儒和黄炎培，“这简直是一幅构思奇特的版画哩！”

张澜伸出头去：“哦哦，这个景致好，它蕴藏着一种希望……”

“金秋时节，天色原本是蓝的，云彩原本是白的。”沈钧儒凝视着鸽子下面的屋瓦道，“可是重庆这个地方，黑暗笼罩了一切……”

黄炎培手扶窗棂，突然想起了什么：“新近见《新华日报》载，润之先生偕恩来、若飞先生访柳亚子先生于沙坪坝寓所时，为其邻居卢子才之子题词曰，‘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独立、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柳亚子先生写在题词后面那首七绝

是，‘兰玉庭阶第一枝，英雄崇拜复何疑。已看三杰留鸿爪，更遣髯翁补小诗’。我想，恐怕便是今天我们有目共睹的这幅版画的真正意境了。”

毛泽东摇摇头。直到那群鸽子慢慢飞出了“画框”，他才缓缓地回过身来，不无惆怅地对黄炎培道：“任之先生，现状你都看到了吧，和平、民主、团结，不过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影子。刚才，我向诸位介绍了国共两党谈判的情况，至少对于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回天之力的。所以，今天把大家请来，还希望能够得到诸位进一步的指教才是。”

“有些问题，诚如润之先生介绍的那样，我认为大体上还是有了眉目。当然，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究竟能否得到承认，人民自由权利究竟能否得到保障，以及政治会议究竟何时召开，这都需要我们拭目以待。”黄炎培想了想道，“我认为最关键的，还在于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愈是极力诬蔑，愈是诡称‘根本与国家政令军令之统一背道而驰’，你们就愈是要在

谈判桌上当仁不让，反击到底！”

张澜回到座位上，不紧不慢地道：“任之是抓住了要害问题的。何以见得呢？我有过这方面的经历：‘五·四’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血腥统治，使人民能够获得一点点起码的自由，我曾经和吴玉章先生在川北推行过地方自治。事情最后没有搞成，但是，政权和军权对于人民的重要性，我算是从内心深处感觉到了……”

张澜抬起头，望着毛泽东：“国民党比北洋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当今天下，全中国的人民都把希望寄托给了你们。因为如此，你们当坚持的，就一定要坚持到底，才好为中国保存一方净土。”

毛泽东连连点头道：“张表老，你尽管放心好了。对于重庆谈判目前出现的情况，我们是估计到了的。‘针锋相对，寸土不让’，正是我们为着对付这种情况而制定的方针。现在的问题是，在坚持这个方针的前提下，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以打破谈判桌上的僵局？”

沈钧儒转过身来：“依我之见，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们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

毛泽东朝沈钧儒笑了笑：“从内心讲，我是双手赞成你的意见的。只不过，谈判之初，我们答应了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就是说，谈判未有结果之前，双方均不得公开谈判的内容。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只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了。”

张澜捋捋胡须，不慌不忙地说：“润之先生有所不便的话，可否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呢？把问题摊在全国人民的面前，也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和推动呀！”

张澜将手伸进长衫，把题为《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的几页蝇头小楷，递给了毛泽东——

介公主席 勋鉴：  
润之先生

国共团结问题，关系整个国家民

族前途甚大。自润之先生来渝，双方高谈已逾十日，不惟国人倾耳静待好音，即盟邦友好，亦莫不期待中国内部问题有一圆满适当之解决……

惟其如此，则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

目前商谈之中心问题，不外政治与军事。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此为国人一致之要求。纵国共双方存有若干特殊问题，不妨事先商讨，但所作成之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今日全国兵力，合各方计之，当不少于三百师。如能采用全盘统筹之编遣计划，以目前养三百师之物力，移用于极少数量之常备军，而此种常备军，绝对超越党派关系，绝对遵守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之原则……

如谓“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所谓“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之为统一，岂不令人气短？……

凡上所陈，以公等谋国之忠，当早已计及。中国民主同盟为团结各方之新兴政团，公等即以此诚，作为一部分国人之公意，用资参考，或于问题之解决，亦不无裨益也。专此敬颂

勋安

张澜

毛泽东看罢抬起头，望着张澜飘逸的胡须，饱满的天庭，尤其是那对直面人生的目光，禁不住感激之情：“老成谋国，老成谋国呵！老实说，在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道路上，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信，我们可以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张澜前虑尽消，喜出望外：“有润之先生这番话，我五更鸡也便没有白叫了！明日我将此信分送给重庆的《新民报》和成都的《华西晚报》，这事先已经跟两家报馆商量好了……”

“张表老，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呢？”毛泽东忽然着急起来，“我是说，这封信我不同意你公开发表！”

“为什么？”张澜大吃一惊。

毛泽东郑重其事地说：“不为别的，只为你的人身安全，为你这样民主的大树不能倒！你想想看，这封信正是国共谈判桌上最为敏感的政权与军队的问题，信一旦公开，无疑如天上掉下来的巴掌，不偏不倚地打在蒋介石的脸上，而他一旦破了脸皮，那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呀！”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六位议员访问延安

张澜这才平静下来：“润之先生多虑了。这封信里所谈到的问题，和我去年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提案《加强实行民主以求全国团结而共济时艰》，其精神是完全相同的。你若不相信，我不妨把提案里头的句子背出来听听：‘甲要一党专政，因而训练党军，以图巩固其政权，即不能禁乙之训练党军，与之对抗。故必须实行民主，不以国家政权垄断于一党’……”

“好了，好了，你张表老就是长了十个脑袋，也早被蒋介石砍光了！”黄炎培转而面朝毛泽东：“我意还是让这封信公开发表为好。特别是你在重庆的时候，蒋介石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对张表老下手的。再说，国共谈判当中，尽力斡旋，相机行事，本来就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还将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包括和国民党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毛泽东缓慢地点了点头，刚想对几位先生再说点什么的时候，楼梯上传来了他所熟悉的稳健的脚步声。

当他望着房门口周恩来那倒竖的浓眉，那紧咬的牙关，以及那微微颤动的嘴唇的时候，他一下子站起身来：“出了什么事情？恩来同志。”

周恩来神色严峻地道：“主席，还有各位先生，刚刚收到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拍来的紧急电报说，今日凌晨3点15分，国民党军队向我上党地区发动了全面进攻。阎锡山先后指挥其国民党第二战区所辖之六十六师、六十八师、二纵队、六纵队、七纵队以及暂编三十七师、暂编四十六师、暂编四十九师，攻入襄垣、屯留一带，企图侵占整个晋东南地区……”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什么话也没有说。唯一的反应便是坐回沙发，恢复了先前缓慢的神态，缓慢地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缓缓地划燃火柴，然后凝望着窗外的天空，那静静的云，微微的风，大口大口地吞云吐雾起来。张澜一拳击在茶几上：“这个蒋介



△毛泽东在重庆机场

石……”

## 二

陈诚和张群来到德安里官邸客厅那个固定的座位坐定，蒋介石寒暄之后，书归正传：“今日把你们两位请来，我想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嗯嗯，陈部长是负责上党战役的军事长官，张主席是进行重庆谈判的首席代表，‘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那么，如何‘张’得起来，又如何‘弛’得下去，这就是你们两位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了。请陈部长先谈谈好吗？”

陈诚早就有了万无一失的话题：“八月下旬，阎锡山部在占领太原和同蒲路沿线城镇后，又攻克襄垣、潞城，并在暂编各部的配合下一举拿下被共军包围的长治、长子、喜关、屯留诸城，不过是给了前来重庆的毛泽东一个下马威而已，九月初——”

身着戎装的陈诚挺了挺胸膛：“共军乘我不备，虽袭取了襄垣与潞城，但是，作为对共军的全面反击，眼目之下，委员长已令阎锡山主力第十九军楔入上党地区。与此同时，胡宗南部、孙连仲部、李昌仙部，正分头沿同蒲、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全力向

北推进。所以，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给端坐在谈判桌前的毛泽东当头一棒的话，这就是已经打响的第二阶段的上党战役啦！”

殊不知蒋介石并不满意陈诚的说法。在他的印象中，陈诚之所以被称作“常败将军”，就是因为这种战前的承诺太多太多。于是，他的脸色倏然一沉，那发红的眼睛里面，也忽地射出一束绿光来：“辞修，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有点儿答非所问！嗯嗯，前不久的潞城之战，共军只用了五分钟就登上城头。在军事上我们只要稍有行动，共军在作战中便会全力反击。你究竟有什么把握，能够在上党之役中稳操胜卷呢？”

陈诚明白蒋介石的意思：“委员长！第十九军正在加紧修筑白晋铁路长治至沁阳段。他们的兵力配备完全是遵照你的‘以长治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布置的……”

蒋介石煞有介事地道：“嗯嗯，你刚才提到的沁阳这个地方，倒使我想起一件事情来，阎锡山和冯玉祥结盟，发动了对付我的中原大会战。平心而论，阎锡山还是有点儿谋略的，他向冯玉祥面授机宜，预定在沁阳会师，想一口吃掉我驻防在河南的军

队。谁料冯玉祥的参谋长在拟制命令的时候，却误将‘沁阳’写成了‘泌阳’，而河南南部偏偏就有泌阳这个地方，与沁阳足足相隔了好几百里地！如此一来，冯玉祥的部队在泌阳手搭凉棚，望眼欲穿；阎锡山的部队则在沁阳捶胸跺脚，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而那好几百里的中间地带，便是我们的军队跃马扬鞭、分进合击的绝好战场了！”

陈诚转动眼珠：“委员长放心！我军不会是杂牌部队那样的衣架饭袋。据我所知，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多年来是分散进行游击战争的，马上集结起来，进行大规模运动战，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更不要说他们每团不过千人，整个部队除了六门山炮而外，剩下的就是每人几发子弹……”

蒋介石却摇摇头道：“陈部长，你怎么把我们共军第三次围剿的教训搞忘了？那时，共军的兵力是三万，我们的兵力是三十万，至于装备之悬殊，恐怕更是远远超过了一比十的程度。而战略方面呢？有鉴于共军在我们对其进行第一次、第二次围剿之后，既未得到任何休整，也来不及制定什么作战方案，所以我当即以总司令的名义，在南昌发出了进军命令：‘趁共军绕道千里回到赣南之际，我军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不给对方以喘息之机，务求一举全歼！’……”

陈诚愣愣地听着，思绪却把他带进那个炎热而烦闷的七月，当他诚惶诚恐地抬起头来，蒋介石还在有气无力地说：“……当然，这个教训你应当吸取，我也应当吸取。譬如说，八月之初，我就发出急电，命令各军所有向南、向西之主力部队，皆转旗向东，全力并进，以密集大包围的态势压向红军主力。可是，谁又想得到呢？他居然发布了一道让他的军队也大吃一惊的命令：原地休息，睡个好觉，最好三天三夜不醒！”

“陈部长，这次毛泽东不会跑到山西上党前线，我唯一担心的是，毛泽东在重庆，从而造成了我们新的麻

痺……”

陈诚点点头，未露声色。他不仅发现了蒋介石是这样地畏惧着毛泽东，而且意识到了其间的缘由。

端坐在一旁的张群反倒按捺不住了：“毛泽东不在山西，山西的仗自然好打，可是，毛泽东在重庆呀，重庆的事情现在麻烦得很……”

蒋介石扭过脑袋，皱着眉头问：“昨日下午，你们和共产党代表的会谈记录，我已经看了。那里头不是有问有答，进行得顺顺当当的么？”

“怕就怕有问无答——”张群哭丧着脸道，“事情出在昨天晚上。张澜和张申府两人，约请国共双方代表周恩来、王若飞、邵力子和我四人，到民盟总部所在地特园相会，听取双方介绍谈判情况，意图从中进行斡旋。考虑到此两人都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所以我们去了。交谈中，周恩来就中共方面所提十一项的方案逐条介绍，说明已处处让步，并表示‘苟能求全，不惜委屈’……”

蒋介石蓦然打断张群的话：“我只想知道你们是如何回答的！”

“我，邵力子，分别阐述了一些政府方面的困难。”张群咬着牙关道，“可是，我们话音未落，张澜就霍然起身，疾言厉色地质问我们，‘重庆在谈，山西在打，这不是贻笑天下吗？阎锡山怎么不给蒋先生留点面子呢？唉唉，公开打电报请共产党来谈判的是蒋先生，背地里发动战争去打共产党的又是蒋先生，试问这个蒋先生就不感到难堪吗……’”

蒋介石显然被张澜的话激怒了：“那么你究竟是怎么说的？”

张群不得不硬着头皮道：“我说，凡是谈判桌子以外的事情，我们都一概不知。如若阎锡山向解放区进攻一事当真，那也纯属他的个人行动，我们无权代为解释……”

“回答得好，回答得好！”

蒋介石忽地转怒为嗔：“有权解释而且解释得一目了然的还是阎锡山。因为他在用大炮发言，用子弹说话。

嗯，大炮的声音是洪亮的，子弹的声音是尖厉的，用希特勒的话来说，武力才是无可辩驳的真理！所以呀，国共两党会谈的地点应该在山西，在上党，重庆没有的东西那里有，桌面上得不到的东西，我们尽可在战场上得到它！”

张群咧咧嘴：“我自然懂得委员长的意思，可是毛泽东毕竟在重庆呀。他呆在重庆，增加了我们政治上的压力。我们只好越发小心谨慎。”

蒋介石眯眼笑了：“实话实说吧。你们害怕毛泽东，我也害怕毛泽东。重庆只有一个人不害怕毛泽东。他嘛，就是我们的赫尔利先生……”

### 三

赫尔利整整熬了一个通宵，才写完了向美国国务院呈交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

大半年了，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赫尔利先生的胸前既没有增加一枚勋章，肩膀上也没有增加一颗星花。恰恰相反，他在中国的行为使美国舆论界忧虑：他是不是在没有得到充分授权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先斩后奏？他是否仅仅是一个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笨蛋……

赫尔利需要对他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反击。于是，报告中尽量突出谈判双方已经取得的成果，国共两党相安无事，中美关系也相安无事，他自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化身……

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谈判者同意他们将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复兴中国及制止内战而合作。双方同意支持作为共和国总统的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他们又同意双方将拥护孙中山的学说，并将合作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民主的政府。共产党同意他们将承认国民党为控制政府的主要政党，并将在从目前的政府形式过渡到民主政权的时期内，与其合作。不少其他问题，包括释放政治犯，人身、言论、出版、信仰、集会与社



等自由，都取得了协议。

“还有两个重要点，会谈尚未取得协议，……其中一点是共产党主张在某些省内有任命、选择或选举省长之权利，而政府则认为直至制定宪法和建立民主政府之时为止，任命省长和官员的特权应属于共和国总统。

“另一点双方已达成协议，但并未最后同意，此即包括在中国和平时期国家军队内的共产党部队的数量。政府指出目前计划要求一个包括八十至一百个师的和平时期军队，而国民党认为是少数党的共产党却主张大约占和平时期军队半数的权利……”

“谈判人员之间的精神是良好的。会谈将继续，毛泽东还留在重庆。蒋委员长许诺毛氏并以他的人格保证毛氏和他的随员的安全。”

“双方曾对大使的合作与帮助表示深切的感激。大使在促成会谈和在谈判过程中以调解者的地位所给予的一切帮助都是对中国的巨大贡献，对此，表示谢意！”

呈交给国务院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赫尔利用密电拍往华盛顿。在重庆，作为一种公开的表现，赫尔利则给桂园打了一个电话，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出席他在大使馆内备下的午宴。

当三位共产党人如约前往，驱车直抵大使馆门前时，赫尔利早已迎候在石阶之下，直直地如同路旁的电线杆。

他现在弯下腰，亲手为毛泽东拉开车门：“见到你们，总是这样令人高兴。今天正好是谈判休会的日子，我特地为你们准备我家乡的烤鸡，地地道道的俄克拉何马风味呢……”

毛泽东微笑道：“大使先生的饭，我们是一定要吃的。不过，有道是，饱食不如宽坐。既然我们和国民党方面谈不下去了，何不趁此机会，和你好生叙谈叙谈呢？对于我的这个建议，你不会反对吧？”

“不反对，不反对。”赫尔利高翘着八字胡须，伸出他那长长的手臂，

“各位先生，请！”

赫尔利刚刚在壁炉旁的沙发上坐下，便用一种煞有介事的语调说：“方才，当毛泽东先生告诉我，重庆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的时候，作为国共两党共同的朋友，我在良心上顿然承受了一种痛苦的自责。不是么？倘若我能够对上一轮谈判的过程进行研究，倘若我能够对下一轮谈判的内容提供线索，那么，这种谈不下去的局面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毛泽东坐在壁炉另一侧的沙发上，望着赫尔利滑稽的表演，不觉想起了这位美国将军以总统特使的名义访问延安的时候，那高叫着战争口号的声音，那出乎意料的歇斯底里的举动……。不过，与当时的惊讶和感然相反，毛泽东现在对付赫尔利的，除了那淡淡的微笑，还有随之而来的轻言细语：“大使先生，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你确实愿意对下一轮谈判的内容提供线索的话，那么，我想，正好周恩来先生在这里，王若飞先生也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上一轮谈判的过程和盘托出，以便你进行研究，从而促使重庆谈判有所进展呢。”

赫尔利的面孔刷地变得通红：“既然你们如此地信赖着我，那就让我试试看吧。对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方面曾经告诉我说，可以新增加的代表名额确实有限，若重新遴选，除各团体请求增加名额外，所余者为数极少。不知道这个问题上一轮谈判涉及到没有？”

赫尔利的目光迫不及待地转移到壁炉对面去了。他看看周恩来，又看看王若飞。然而，回答他的，依然是死死盯住他的毛泽东：“上轮谈判涉及到了国民大会问题。中共代表提出了两点意见。其一，国民大会势必延期召开；其二，国大代表应当重选，并要求修改选举法和组织法，以实行民主自由与普选。不过，大使先生，这个问题只是五个议题之一。上轮谈判的关键问题还在于是否承认解放区。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实质性的问题上，你难道不愿意听听中共方面的意见么？”

“愿意，当然愿意，”赫尔利显得烦躁与不安了，“可是，国民党方面至今未能接受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方案，事既如此，关于解放区的问题，你们又能够告诉我些什么呢？”

周恩来现在开始答话了：“大使先生，需要向你并通过你向国民党方面强调的是，在本党控制之下有十九个解放区，政治上已实行减租减息，民选政府。本着互相让步之精神我们提出建议，即主张某些地区已由中共负责者，由中共推荐主席，而其他党派仍可以参加地方政府，彼此合作。而张治中先生则谓我等要求数省之主席乃为封建作法，我等实不能同意。虽然如此，吾人为顾及中央政令之一致，在全国其他地区未实行普选以前，不单独实行普选。”

赫尔利托着腮帮：“那么，请问：中共方面的重划省区之议，又将意味着什么呢？要知道，这才是有关解放区能否得到承认的至关重要的实质性问题！”

王若飞说话了：我等以为欲解决解放区问题，惟有两种办法：一为普选，请中央承认人民所选举之地方政府；二如中央以为不能有少数省区实行此种特殊之制度，则惟有采取我等现提之办法。

赫尔利哧哧地喘着粗气，声嘶力竭地道：“国民党方面不是有过建议了吗？在各收复区成立一个人事整理机构，这难道就不能成为解决地区问题的一个办法吗？”

“这个办法既然来自国民党方面而非大使先生的建议，我们就无须乎在这里讨论什么地区问题了。因为本党重划省区之议，亦已向中央有过提案——”

周恩来为着顾全这位外交官的面子，他用极为平静的语言，来缓和一下大使馆里的气氛：“当然，我还是以为我方的办法切合实际。中央如能采

纳，自不必形诸文字形式，有一致的协商与决定即可。总之，关于解放区问题，我党在尽量让步，以期依据中央统一之政令，求得问题之解决，以促成两党之合作。”

殊不知赫尔利无言以对之余，竟得寸进尺：“不，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至少在我看来，政治是与军事相联系的。一省一区之内，有政治问题，也有军事问题。而军事问题能获解决，则其他问题也必然能获解决……”

赫尔利的吼声突然被毛泽东的笑声打断了：“老实说，如果恫吓可以征服我们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共产党啦！当然，这兴许不是你大使先生的过错。你的过错在于，当委员长先生政治上已陷入被动，你却彻底地拉下了‘居中调停’的假面具，硬要去充当什么救命稻草。须知，你是救不了什么人的。中国人的事情，全靠中国人自己来办！”

赫尔利浑身颤抖着，隔了半晌，他才从牙缝里迸发出：“毛泽东先生，这句话可是你亲口讲出来的！以后若是要追究究竟是何人破坏了重庆谈判的话，请你不要推卸属于自己的责任。至于我的责任嘛，我想，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我需要尽快地回国述职了。从明天开始，但凡谈判的事情我一概不管！谈与不谈，谈这谈那，都请直接和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张群先生联系……”

#### 四

自从那天德安里官邸的谈话之后，搞得张群乍暖还寒，但他毕竟得到了最有用处的暗示。那就是，蒋介石的热情都用到山西的战场上去了，正因如此，连续两天的谈判休会，便成了张群理想的度假日。他去了北温泉。昨晚回到寓所，今晨却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电话是周恩来打来的：为了表示诚意，中共方面建议下午三时仍在德安里101号，恢复业已中断的重庆谈判。

张群未置可否。放下话筒之后，给蒋介石写了一纸便函。

出乎张群意料，蒋介石竟然很快地打了一个电话过来：“岳军呀，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重庆若是不谈，那么山西又如何好打呢？至于怎么谈，你相机行事嘛。”

在蒋介石面前，张群永远是被动的。现在，他决意改变过去那种以众敌寡的战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叶楚傖不必来了，人云亦云、唯唯诺诺的张厉生也不必来了，他仅仅带上了邵力子，便大摇大摆地前往德安里101号去了。

已经端坐在那张长方形桌前的周恩来和王若飞同时站起身，依然按照前几轮谈判之前的礼仪，笑容可掬地与对方握了握手。

张群一屁股坐下来，神情无比傲慢：“今天你们把我们请到这里来，究竟要和我们商谈什么事情呢？”

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反问道：“关于重新划分省区问题，不知兄等有什么方案提出？”

“此事曾向委员长请示。承示日前委员长与毛先生所谈者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说，在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关于省县行政人员，中共可以推荐，中央当本‘用人唯才’之精神，予以任用。而兄等本月三日建议案内关于省区之拟议，与国家政令之统一不符，碍难考虑。”

周恩来接过话题：“委员长所提示者，仅为一个原则，具体办法仍然需要商量的。例如遵照委员长之指示，或由下而上，根据民选之结果呈请政府任命，或由中共推荐人员请政府核委，二者似可择一而行。以山东为例，中共解放区八十余县，均已实行民选县长，治理县政，只等中央承认加委。”

“山东已有中央任命的省政！”张群噙声噙气地道，“中共所占各县，自然也有了省府委任的县长……”

王若飞当即予以反驳：“中央虽委有县长，但皆未进入县境。一如过去

东北四省主席，长驻在重庆那样，这莫非就是中央要采取的办法么？”

张群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周恩来继续道：“坦诚地说，我方所要求某几省由中共任主席，某几省由中共任副主席，并非一党包办，乃系与各方合作，中央当然可以派人参加，地方贤达亦可参与，不过由中共负主要责任而已。”

张群疾言厉色：“中央政府本着国家政令统一之原则，已任命省市地方行政长官，如须划定何者由中共任主席，何者由中共任副主席，此仍有悖于政令之统一，所以是政府绝不可能接受的！即令人事方面的特殊情况，须予照顾，也不能如此作为谈判条件，甚而致于以此来限制政府呀。”

周恩来笑道：“岳军兄多虑了！中共方面的建议案，实为国民大会召开以前的过渡办法。在国民大会之后，即可实施宪政，依法办事，人事方面的事情，也可实行全国普选啦！”

王若飞补充道：“我们所提的办法，乃目前过渡时期之必要办法。吾人以为民主统一之理想，未可一蹴而就，须经过此必要之步骤与过程方能达到……”

张群沉默了一会儿，不得不改变了话题：“我们再来谈谈军队缩编和军队驻地的问题吧。我等期待着将中共方面要求的四十八个师的军队再行缩编。另外，顺便问一句，中共军队所驻扎的地方，是否就是解放区？”

周恩来自然明白这句问话的意思：“将来中央军如果缩编，我军自须缩编。而我党之军队，当然驻扎在现在的解放区，不会在其他地方安营扎寨的。”

王若飞更是直言以告：“我方之军队将集中于淮北和黄河以北。至于湖北、广东等地的军队，皆将撤出。”

张群再次陷入窘迫之中。他瞟了邵力子一眼，刚想说点什么的时候，冷不防周恩来点着他们两人的名字道：“岳军兄，力子兄，中共方面为谋求问题之解决，让了一步让两步，让

了两步让三步。而政府方面呢？政府对军队缩编之事，除了已经提出的原则外，难道就没有任何其他意见了么？”

这次答话的是邵力子：“你们的军队问题，可不可以与善后复员问题合并在一起，从而统筹研讨出妥善的办法来？就是说，现在即依照中央的规定，缩编为十二个师，其他编余人员，可以从事农垦与建设工作，如此，则中央的整军计划，必可加速进行，彻底落实了。”

周恩来摇摇头，淡然一笑：“兄等可以落实，吾人却落实不了呀。你们设身处地地想想看，我方一百二十万军队，若要一旦裁减为十二个师，那实在是不可可能的，所以军队缩编，必须分期实施。”

邵力子欲言又止，不再说话。张群只好继续唱他的独脚戏：“日本投降之后，委员长邀毛先生来渝，其意在共商大计，解决国是。但商谈内容，在你们所提的办法是事先经过你们党内决定，并在你们来重庆之前就已经公布。而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我等此次与兄等会商，乃奉委员长之指派。委员长的主张，须对党与政府负责，吾人不能不体谅其困难。兄等自谓已经让步再三，并声明此乃过渡之办法，然委员长对于各个重要问题，确乎均已有过明白表示。对于军队之缩编，收复区行政人员之任用，均已从宽。要贯彻政令之统一，即不能完全承认兄等所谓既成事实，盖就中央政府立场而言，凡国境以内不容有两套相反之法令制度同时并行！”

周恩来深邃的目光盯着张群，不闪不瞬：“我们解放区一切行政设施并未脱离三民主义之范围。就制度言，我们并未要求改变中央之制度，而依照中央之规定；就政策言，我方所推行者，都是中央过去所颁布者，其实施情形，可以派员分别考核呈报。所以呀，解放区之法规制度与中央并无不同之处，而在此原则之下，由中共

方面推荐人员，请中央加委，同样是并不违背委员长之主张的。”

张群慢慢转动着眼珠：“嗯嗯，至于双方现行之地方制度，大体上无甚差异，不过名称有所不同，所不同者，按照中央法令规定，户长会议，每户只户长一人参加，而你们现在所实行，一户之内凡及年龄之公民皆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县以上，中央之制度为专员，而中共方面为区主任，区主任可当专员之选者，兄等亦可推荐。总之，在符合中央政令统一的原则下，一切事情都是可以十分默契地求得解决的。”

王若飞不失时机地接过话题：“我党现在所提之办法，为由训政进入宪政，由一党专政进入自由普选之必要办法，亦为解决当前现实问题，以避免内战所应采取之必要步骤。政府如能采纳，则边区可以归原省区，政令亦可统一。我以为政府之法令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为容纳事实，有时确乎有变化之必要哩……”

周恩来以强调的语气插话：“我党对于国民党已作了重大让步，如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承认国民政府之统治权，以军队而论，现在国民党有263个师，而中共只要求48个师，尚不及六分之一，故军政政权，中共皆承认国民党为中国第一大党。”周恩来稍有停顿，“我们此次所提的十一项建议，较之8月25日我党所发表的六大原则已相差甚远，这是因为有毛泽东先生在重庆的缘故，我等随时可以请示让步办法，所以会谈容易进行。”

王若飞点点头：“谈判必须承认对方之地位，尊重对方之意见，始能接近。委员长所提出的办法何以尚不能解决问题，乃因有事实上的困难存在。如不顾此种困难，则即令我等接受，亦行不通的。我中共之军队，乃历史之产物，即要裁减，亦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与步骤，且整编之后，亦非永远为中共的军队，将来全国整编军队，仍可以公平合理之原则，整编

为国防军。

“其次，关于地区问题，我党之军队集中于淮北及黄河以北地区，乃是一大让步。现在海南岛、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和京沪杭三线之郊区等，都有我党之军队，我们将考虑予以撤出。现我党所提十一项，实充满让步之精神。国民党对中共的忍让求全精神不予顾及，仍坚持只给十二个师的编数，自难求得问题之解决。”

张群猛地掉过头来：“你们方案提出之前，老实说，政府考虑只给几个师，今即允为12个师，已实为顾及中共之困难。而今兄等提出仍要48个师，与政府相距实在太远。有鉴于此，恕我直言，你们可否提出一个新的修正案呢？”

周恩来依然淡淡一笑：“我方所提方案，乃第一步在国民大会以前，将120万军队裁减为48个师，将来随国军之缩编而缩编，自可再为减少。”

“好了，好了，军队缩编之事，今日就谈到这里。”张群皱着眉头，忽地又眨眨眼睛，“兄等如果不愿意谈下去的话，那好，可否将军队驻地与解放区问题合并讨论，拟定具体办法，作一次性解决呢？现在兄等所谓淮北尚有范围，至于黄河以北，则包括的地区未免太广。所以最好按军队数目之多寡以定其驻地之大小，如此则军队问题可以解决，政治问题也可以连带解决了。”

周恩来与王若飞交换了一下眼色：“岳军先生，你这个建议我们倒可以考虑，如果毛泽东先生也认为可以考虑的话。”

张群似乎突然来了精神：“那么，那好！趁热打铁。”

## 五

毛泽东快步从桂园楼上的办公室走下来，远远就看见邀请的客人已经进了大门外边的竹篱笆了。

他以主人的身份站在客厅门口，

先与走在前面的左舜生握手道：“大驾光临，有失远迎，看在我们两个都是湖南人的情分上，舜生先生该不会见怪于我吧？”

“润之先生不必客气。”左舜生侧过身子，依次把走在他后面的人介绍给毛泽东，“这位是何鲁之先生，这位是常燕生先生，这位是陈启天先生，这位是余家菊先生……”

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微微点头道：“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鲁之先生是四川华阳县人，燕生先生是山西榆次县人，而启天先生和家菊先生，无疑都是湖北黄陂县人。哦，还有，燕生先生原来的叫做乃瑛，又曾叫过乃惠，是不是这样的呀？”

这批西装革履的客人大多留洋归来，如果说他们的翩翩风度中刚才还夹杂着一些矜持与傲慢，那么，现在他们一个个都楞怔住了。尤其是常燕生，他皱了皱眉头，大惑不解地道：“润之先生功成名就，妇孺皆知，可是吾人不过学府中人，教授学者而已，竟能让你如此记得真切呢？”

“燕生先生过谦啦——”毛泽东忽地开怀大笑道，“要晓得，教授学者数以千计，但是头上戴着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乌纱帽的，只有你们这几位佼佼者呀！况且，蒋介石先生手上的乌纱帽金贵得很，他给了我一顶，那是因为我是共产党；他给了你们几顶，那是因为你们是青年党。而青年党现在是欺侮不得的。你们有一本《醒狮》杂志，你们是中外扬名的‘醒狮派’，你们只消朝墙角打个喷嚏，他老先生也会吓得两腿颤颤的哩！”

众人似乎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唯有左舜生脸皮子火辣辣地发热发烫，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有什么好说的呢？青年党的前身，就是“五四”以后“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国家主义派”。其口号“内除国贼”，亦即反共；“外抗强权”，亦即反苏。就是说，从它成立之日起便为国民党所豢养，每月悄悄地领着蒋介石的津贴。于是，大革命时期，它曾与

军阀相勾结，残害进步力量；抗战爆发后，它又曾在首届国民党参政会上，大肆攻击共产党。

不过，既为政客的左舜生，他具有随风转舵的本事。抗战之初，南京的“和平空气”正浓时，他曾有过和平妥协的言论；抗战中期，重庆的民主呼声高涨，他又发出“民主团结”的号召。他甚至撰文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国民大会，表示国民党一党专政若不打破，民主同盟决不会与蒋介石有任何形式的合作……

进客厅落座后，左舜生仿佛突然来了灵感：“润之先生，诚如你说的那样，我们青年党是欺侮不得。我们主张，凡我全国党派，无论在朝在野，均应以和平建国为共同目标，不算旧账，不结新怨，更不以未来之威胁利害观念，去阻挠当前民主统一事业的进行。所以，当你要我来桂园扯谈扯谈的时候，我不仅欣然前往，而且把在渝的青年党中央常务委员们，统统都请到你这里来了……”

“我自然是应当感谢你的，舜生先生。不过，按照我的想法，要是你能够把曾琦先生和李璜先生也请到重庆，请到桂园来的话，那么，你就功德圆满，帮忙帮到底啦——”毛泽东坐在左舜生的对面，笑眯眯地点燃了一支香烟，“你们三位是青年党的三巨头嘛。清朝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时人便有过‘三杰’并称的佳话，而你们三位恰恰又是一个‘曾、左、李’，这就不仅是青年党的骄傲，若是我三生有幸，能有机会奉陪末座的话，亦便成了吾人的自豪。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想听听来自青年党各方面对于眼下国共谈判的意见。据我所知，你们的意见是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理当如此，但是究竟是什么促使了这种分歧，以及其间国共两党各自需要承担什么责任？这都是我过去不知道而今天想知道的。”

左舜生直直地盯着毛泽东，身却不安地左右摇晃起来。那情景，仿佛

是在他的背后隐藏着一只黑手，而绝不能让对方看见似的。

这只黑手是蒋介石的。

早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期间，蒋介石便看中了在民主同盟里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左舜生。为了拉拢青年党以便操纵民主同盟，就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亲自提名，把左舜生抬高到了参政会副主席的地位。然而，这却使得青年党的党魁曾琦大失所望，一怒之下跑到昆明，继而跑到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南京、上海去了。

不过，左舜生在重庆的日子并不好过。

由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等三党三派联合组成的民主同盟中，左舜生虽然担任着秘书长的职务，但是，在民主同盟33个执行委员中，青年党毕竟只占到了9个名额。于是，蒋介石操纵得了左舜生，左舜生却是操纵不了民主同盟的。

事既如此，蒋介石对左舜生慢慢冷淡下来。左舜生虽不敢与蒋介石交恶，却乐得在国民党无法越俎代庖的情况下有几句较为激进的言论，从而挣一点用以维持他在民主同盟的地位的资本。眼目之下，资本似乎有那么可观的一笔了，可是，就在昨天晚上，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却让他鸡飞蛋打，前功尽弃：蒋介石已经悄然派出“美龄号”座机，要把此间呆在北平的曾琦接回重庆，以支持其在青年党中恢复党魁的地位，企图再用曾琦领导的青年党来达到左舜生达不到的操纵民主同盟的目的。退一万步，能够利用曾琦把青年党从民主同盟中拉出来，对于从来就把民主同盟当作眼中钉、肉中刺的蒋介石来说，也不失为一着绝路逢生的好棋。

虽说是这样，左舜生却不愿意把实话告诉毛泽东。在他看来，共产党是重要的，国民党也是重要的，在这两个重要的力量尚未完成历史意义上的较量之前，他需要谨慎行事。

此刻，左舜生收回目光，绕过话

题道：“润之先生，‘党中有派，派中有党’，至于个中道理，我想对于任何政党的领袖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我们青年党在中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最大的而且最有历史的政党，它在民主同盟三党三派中，更是最大的最为重要的党派。有鉴于此，我们在时下的国共谈判中，谈判双方除了为自己争得利益外，还应当充分考虑别的政党的地位和影响。”

毛泽东朝烟缸里抖了抖烟灰：“舜生先生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不过我不明白共产党要争得的利益，究竟和青年党有什么两样？譬如说，吾人坦率承认国民党及蒋介石先生担负领导抗战和领导建国之重任，但同时吾人又必须坚决要求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苟不如此，则领导统一建国之工作，不特无由开始，而胜利之果，可反为内争之对象。试问：如果这并不是青年党要争得的东西的话，那么，你们倒底需要争得什么呢？”

左舜生一时语塞。侧旁座位上的何鲁之，却胸有成竹：“润之先生，两月以前，你在延安曾对一位访问者说，‘蒋介石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那么，现在我们有幸和你一起讨论国共谈判的时候，你说过的这番话，是否是你来重庆的真正的目的！”

左舜生瞪了瞪何鲁之。因为他就是那位访问者。他不能让毛泽东产生这样一个印象：青年党的铁腕人物居然是一个背后议论人的人。

毛泽东显然并不介意。他依旧望着何鲁之，淡然一笑道：“我现在教给你一个办法：等到出太阳的天气，不管天上有几个太阳，你只消仰起脑壳，看看哪个太阳能够给人民带来温暖，哪个太阳能够给中国带来光明！嗯，这就是我说的‘两个太阳’的意思。虽然共产党是在野党，我们暂时还不很强大，但不会是月亮，更不会

是星斗……”

“润之先生，你如此坦率地承认了共产党暂时还不很强大，”何鲁之侧旁的陈启天忽地冷冷笑道，“那么，在靠双方实力支撑起来的国共谈判桌上，你又如何去说服蒋先生，从而组成贵党梦寐以求的‘联合政府’呢？”

毛泽东立即掉过头来：“你说对了，启天先生。‘联合政府’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梦。既然我们暂时还没有强大到能坚持参加国民政府的程度，那么我们就干脆放弃联合的要求，而限于要求在蒋介石先生控制的现政府下的民主化。这样做似乎是现实的，因此我们做得非常努力。我们已经同意缩编军队，只要国民党也同意把它的军队按同样比例进行缩编。我们需要坚持保留的，只是军事力量及其根据地。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陈启天侧旁的余家菊，透过他那副在伦敦买的金丝眼镜望着毛泽东：“关于保留什么东西的问题，昨天的《新华日报》上面，不是正好有中国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先生日前接见该报记者时，对目前时局发表的谈话么。他是这样谈的：‘至于行政系统之统一，军队还于国家，本属一个民主统一国家之绝对原则，即无任何党派的军队，无任何党派之特殊利益的保留’。此语虽非共产党所言，却登在共产党的报纸上，不知润之先生对此有什么评论没有？”

毛泽东不紧不慢地掐灭烟蒂，这才抬起头来，给了余家菊一个正眼：“我双手赞成章伯钧先生的意见。因为他在谈到你方才引用的那句话之前，还有这样一段话哩：‘目前解放区之军队及政权问题之解决，须着眼于实际的情况，觅取妥当而切实的过渡办法，因此等军队与政权，系由当地人民取自敌人，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这就是说，他谈到的绝对原则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实现全国政治的真正的民主化！”

众人无语，面面相觑。

左舜生反倒回过神来了：“其实，民主化不过是一个虚无的概念，而且各有各的解释。对于现实的中国政治来说，重要的不是要对中国未来的两种相对的概念作出判断，而是要对体现中国两个未来的人物作出判断。所以，我在想，如果润之先生能以某种形式维持现状，那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腐败无能，以及由此引起的国民党政治和军事机构的瓦解，最后定能使共产党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的适当结合，达到迫使蒋介石先生放弃政权的……”

“那只是你的推理罢了。”毛泽东讨厌这种试探性的说话，作为回敬，他和盘托出自己的结论，“对于蒋介石先生来说，他是不会把希望寄托在时间上面的。至于国民党还愿意和我们继续谈判下去，那不过是他们不愿落得个阻碍和平建国的罪名而已。要知道，他们现在所进行的一切，包括和我们握手，和我们微笑，和我们在筵席上碰杯，都是为着立即打垮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因此，不要说眼下没有条件达成协议，就是以后有了那么一张黑字白纸，中国的未来也是一个不解之谜哩！”

左舜生面露尴尬之色：“也许，也许。但是，我相信润之先生是有回天之力的。譬如说，发展你们在政治上的攻势，而在军事上保持守势。由于蒋介石先生得到了美国人军事方面的支持的缘故，所以你们……”

“所以我们就只好逆来顺受、坐以待毙了，是吗？”毛泽东猛力挥臂，提高嗓门道，“可是恰恰相反，舜生先生，要是你没有搞忘的话，我在延安还对你说过另外一句话，那就是，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因为既是烂枪，就不怕打烂，所以我现在等待着的，就是杜鲁门的一声令下啦！”

……

（责任编辑：仲文）

（本文节选自即将出版的《重庆谈判》一书手稿）

牵动亿万人心的三峡工程，早在五十年代就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毛泽东不仅亲自主持了一场激烈的论争，又由支持三峡工程转而支持了这一问题上的“反对派”，更从中发现了培养秀才的重要。请看当年当事人的回忆。



## 关于三峡问题的“御前”争论

——忆毛主席亲自主持的 1958 年南宁会议

李 锐

### 1.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58年1月17日，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告，让我第二天乘专机去南宁，参加中央的会议。办公厅负责人说，电报上写的是讨论三门峡问题。还说专机在武汉停留时，接林一山同志一起去。

“讨论三门峡问题？”我纳闷了一下：三门峡正在施工，没发生什么问题。过武汉接林一山一起去，当即想到是电报中多出了一个“门”字，必定是讨论三峡问题。因近几年来，水利部特别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及其负责人林一山，曾以各种办法催促中央：为了解决长江防洪问题，三峡工程应尽快上马。我当时在电力工业部主管水电建设工作，是坚决反对这种意见的。

1953年毛主席视察长江，从武汉到南京航行中，听取了林一山的设想：三峡筑坝解决长江防洪，并可南水北调。长江特大洪灾之后的1954年底，京汉线旅途中，林又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有关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大概就在此时，燃料工业部电力代表团在苏联参观时（刘澜波任团长、我任副团长），接到国内来电：水利部要修三峡工程，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当即回电：现在还没有力量顾及此遥远之事。1955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曾多次组织中、苏专家查勘

长江和三峡坝址。这时黄河流域规划已经完成，三门峡即将开工。1956年，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于长委机构之内，正式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主要是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水电系统也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但是，对于三峡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林一山同志和我都曾写了几万字的文章，阐述论证各自的观点，我还另写了3万余字的详细报告。可惜发表在专业刊物上的文章和我的报告，毛主席并未看到，因此他并不了解这方面的不同意见。1956年夏天，毛主席第三次游泳横渡长江时，在有名的《水调歌头》一词中写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就更鼓舞了三峡上马之风。早在1955年12月，水利部就传出：三峡工程可以3年勘测设计，4到5年施工建成。国务院一次谈到三峡工程的会议上，众口一词认为应尽快动工，我提出不同看法。周总理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大声说道，有一个人说困难，这很好。随后我将水电总局保存的三峡重要图纸，请总理过目。

同年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副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工

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报道中还谈到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当时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似乎三峡工程很快就要上马了。我于是写了一篇《论三峡工程》的三千字文章寄《人民日报》，报社寄来了清样，但终于未能刊出。报社副总编辑王揖（我们是延安《解放日报》的同事）告诉我，总理不赞成当时在报上公开争论此事。后来，我只好上《水力发电》1956年第11期上，又发表了一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的6000多字的说明长文，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

我这个人对自己认定的事情，不管有何等阻力，是定要坚持到底的，尤好发表一点意见。当年对三峡问题的确是忧心忡忡的，这不仅是由于这个方案关系国计民生太大，太不成熟，而且由于它的干扰，会打乱水力资源即水电的正常开发。

1957年4月我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讽刺“大”辩的杂文。此文当时虽未引起任何舆论反响，却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我在水电部受批斗时，当作“罪证”之一。我及整个水电工作“反三峡、反水利、反火电。”此是后话。总之，所有以上这些有关三峡意见和水电、水利之间的矛盾，毛主席都不知道；他只是听取了林一山和水利系统单方面的观点和看法，因此要“高峡出平湖”。但是我并未就此放弃自己的不同意见。就在我前面谈到的那份长篇报告中，我在历述自己的论据后说：“我们完全赞成主席和中央的积极开发长江的方针，以解决我国的大问题，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加速前进。我们武汉、成都两个水电设计院一直在从事长江流域的工作，对于干流也作了积极的配合，如承担部分地质勘测工作，派遣得力干部参加规划领导。但是在电力的远景部署上，关于长江干流三峡等电站的容量，列入计划的时间，列入的数量等问题，现在还难于肯定。

关于整个长江工作的原则，我们认为应当遵照主席的指示精神：“不可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这个长篇报告，我去南宁时带在身边。我还打算趁此机会，将我国加快水电建设的必要与可能直接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作点“宣传”，于是我又带上有关水电的资料，并请负责水电规划的老工程师，赶出一张全国各大水系近期和远景应予开发的大中型水电站示意图。

飞机在武昌机场着陆时，林一山已经在等着。他的秘书魏廷铮（现任长委主任）提着一口沉甸甸的大皮箱。相形之下我的手提包实在太寒酸了。我们只是打了一个招呼，在飞机上并没有交谈，我跟林过去只见过面，没有交往。接管沈阳之后，听到东北局的一些负责同志对他有过某种介绍。1952年，我从湖南调北京之

前，湖南省委几位负责同志一同去参观过荆江分洪工程，是他向我们作的工程说明。当时觉得他天文地理侃侃而谈，很博学，知识丰富。如今这两个人要参加“御前会议”，“对证公庭”了。以上情况说明，在三峡问题的争论上，我是“知己知彼”的，虽然匆匆上阵，仍然“胸有成竹”。我不时俯看机翼下的大地景色，心境自然而平静。

## 2. 两个“冤家”碰了头

近中午时到达南宁，住进一座新宾馆。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马上来找我，说他和胡乔木都为我捏一把汗，急切地向我介绍了会议形势：主席大批“反冒进”，总理当面挨了批评，柯庆施攻击陈云。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睡不着觉。《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反冒进社论原件，也从北京调来了。反冒进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泼了冷水，泄了气，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会上主席插话很多，发表了许多意见，反对分散主义，权力要集中。批评做经济工作的人只务实不务虚，只专不红。平时不通气，一来文件就倾盆大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字，这实际上是一种封锁。讲了许多工作方法问题，开动大家的脑筋，等等。田还谈到乔木的看法，主席当时的精神状态，那种“乘风破浪”的兴奋情绪，有点类似抗战初期。根据林一山和水利部门的意见，主席主张修三峡，薄一波于是反映，此事有反对派。还讲了水电同水利之间，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于是主席当即决定，水利、电力两部合并，将林一山与李锐找来，当面各抒所见。他们为我的担心当然有理。过去虽然常同田家英接触，但隔行如隔山，关于三峡问题，从未谈起过。随后见到周小舟，他也是同样担心。他告诉我，毛主席在插话中，又狠狠地批了张奚若那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因此，我在三峡问题上的反冒进，当反对派，是很不合时宜的。由于晚上就要开会，我也不及向他们多谈多问。不过我心中有底，飞机上的平静心情并没有受到干扰，就如同运动员参加决赛，演员上台之前一样，必须情绪如常。

在饭厅吃晚饭时，人们见了，笑我与林一山是“两个冤家碰了头”。当天晚上，“两个冤家”参加了接近尾声的南宁会议。我们的住处离主席住的“明园”不远，会议即在不太大的会客室中开的。中间一张长条桌，大家围桌而坐。我们两人坐在毛主席正对面，对面左右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还有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及各大区和中南各省（两湖两广、河南、江西）的一把手和中央工业各部主要负责人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在延安时期，如此面对面同毛主席坐在一起开会，

只有过一次，即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座谈会，参加的人要多一些。林一山是毛主席熟悉的，他们之间有过多次长谈短谈。这条横穿中国东西的伟大长江，其开发利用，其关系国计民生，工业农业、航运民力、防洪灌溉、近期远景，等等，是如何重要，三峡又是如何不可替代的伟大工程，他确实被林的悬河之口打动了的。据说他曾向林说过这样的话，我很羡慕你呀，我很想当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主任呢！而这个李锐，则不认识。其实我在《解放日报》写的好多篇社论和长篇文章，曾得到过他的赞赏，虽然没有署名或用笔名，我又写过《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他还是知道有我这样一个湖南人的。在客观形势上，我确有极为不利的一面，人们为我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

大家都坐定了，毛主席即要我们两人开腔。问林一山，你要讲多少时间？林答，要两个小时。又问我，我说只要半小时。我请主管长江的林一山先讲，

林一山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二千多年间，长江洪水如何为害，平均10年一次。辛亥以来的40年中，平均5年一次，可见长江洪灾越来越严重。1931年水灾，死14.5万人；1935年大水，死14.2万人；1949年大水，死5700人；1954年特大洪水，采取紧急分洪等措施，保卫了武汉和荆江大堤安全，仍死了4900人。他还谈到长江如同黄河，河床也在逐渐抬高。特别强调荆江河段之险，保卫荆江大堤的重要，这关系到300万人的生命安全。汛期有溃决的危险，万一决口，将造成难以想像的惨剧。且将淹没武汉，切断京广铁路，断绝沪渝航运，造成复堤工程等一系列严重恶果。于此，还谈到如遇1870、1860等年洪水，则后果更不堪设想。这些年份，宜昌以上洪水来量都比1954年为大。1954年，汉口以上分洪决口水量约600亿立米，汉口下约30亿立米。因此，如能控制住1000亿立米洪量，就可以解除近百年来已经发生过的最大洪水灾害。之后，就谈到长江流域也有旱灾，全流域丘陵区占22%，其灌溉必须由大型工程远距离引水才能满足。长江的伟大，还表现在它有充足的水量，有超流域的全国意义。华北黄、淮平原缺水，需要由汉江和长江引水400亿立米，以灌溉约1亿亩耕地。如果按远景计划，这个地区大量改种水稻，黄河水源留灌蒙古沙漠，则黄淮平原所需引水量在1200亿立米以上。此外，从长江引水，还可以洗碱，更是永久性效益。同1956年6月那篇长文不同，这时林一山大讲水力发电是我国工业动力的主要来源。为了15年内赶上英国，以钢铁与电力增长比例计算，钢达到1000万吨时，电力需要400~500亿度；当1972年钢达到4000万吨时，电力相应需2000~2400亿度；第五个五年计划钢可能达到6000万吨，电力相应要4000~4500亿度。他也谈到耗电工

业，化学肥料每亩50公斤，则全国播种30亿亩，每年需1.5亿吨化肥，单是化肥一项即需耗电量2000亿度。然后又比较了国内外航运情况，我国水运如何落后，仅及铁路运量的16%。三峡以上干流河道渠化后，可以使长江变成我国独有的“地中海”，以目前铁路运力计算，长江就至少可以代替200条铁路的作用。到1972年，长江干流货运量，仅钢铁一项即达9100万吨。所有以上这些除害兴利的雄伟计划，彻底征服长江，根本改变长江流域以及黄淮平原的自然面貌，只有以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才能使之实现。长江洪水高峰来自宜昌三峡以上，至少占汛期干流水量50%以上。因此，三峡枢纽对长江防洪有决定性意义。只有三峡才能控制川江洪水，解除荆江大堤的严重威胁和洞庭湖区的洪灾。宜昌以下的支流，找不到有控制性的有效水库，如汉江、沅水的洪水典型年度变化很大，能控制的水量较小，而且还不一定是干流防洪中必须削减的洪峰的组成部分。关于三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经过苏联专家的帮助和研究，林一山这时不再强调必须235米了，而提出210~200米的方案，以210为最好。这样，水电站至少可装机1340万千瓦，年电量1000亿度以上，耗电工业可以集中在它的周围，也有利于国防。输电距离可以北越陇海路，南接五岭，东至上海，西通重庆。将三峡全部投资摊给水电单位千瓦造价不过526元，比火电也贵不了多少。由于1956年《水力发电》的《长江规划专号》中，我的长文及他有关文章，谈过三峡这样超巨型水电站如过早上马，同中国电力工业及相应经济发展不成比例，林说，到1977年，三峡输电范围内，所需电量至少将是1600~1800亿度，从国家极需化肥和化纤等工业情况看，三峡电站不但经济而且合理。林一山最后谈到三峡工程技术上的可能。地质勘查结果已选好了几个比较坝段，共3个方案。施工难度和强度同国外类似工程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又谈“围堰发电”的设想（随后写的文章就不提了）。关于投资，估计总数约为72亿元，按照基建投资一五计划时期共480亿元、二五900亿元、三五1620亿元、四五2750亿元、五五4680亿元推算，1963~1977累计约9050亿元。以电力投资占基建10%计算，不能说国家没有钱修建三峡枢纽，关于100多万人的移民问题，他根本没有谈，随后的文章中也没有提及。

以上这些大要，是我根据回忆和林随即写出的文章作的概括。林讲的时候，以远大的理想为主，不很系统，有时离题较远。讲了许多听者不易一下弄明白的数据，“行话”也太多，不必要讲的东西讲的太多。总之，不是从当前实际与可能出发，而是从遥远的理想出发，特别强调洪水要死人，成百万人死于非命。他讲的时间



超过2小时。

我讲的比较简单，没有超过半小时。我首先讲长江不同于黄河，自古以来是条好河，轮船从上海可以通到宜宾，是世界大河中数得出的黄金水道，最好的通航河流。泥沙远不如黄河之严重，水量为黄河的20倍，洪水量为50倍。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黄河为200多倍，长江只25倍。三国时期就有诸葛亮夏口（汉口）吊丧，可见2000年来，武汉三镇并未因洪水有何变化。黄河下游大改道7次，开封城被淹没过，城墙低于河床十几米，故称为悬河。黄河为世界上最严重的害河，对国家威胁太大，治标治本，必须及早解决。三门峡控制流域面积90%，水库削减洪峰可起防洪决定作用；（黄河洪水峰高量小。为尖峰形；长江洪水峰缓量大，为馒头形。）估计水库有50年寿命，可以为上游水土保持赢得根治时间。可是三峡只能控制长江流域面积50%，即只能管住西水（川江），而对南水（湖南四水及赣江等）和北水（汉江）则无能为力。宜昌以下中下游平原地区，发生的洪涝灾害特别是涝灾，三峡只能望洋兴叹，无能为力。长江汛期由两季决定，一般南水最早，次为川江，最后为汉江，有时也有错乱。因此，历史上各种洪灾形态不同。1954年，南水推迟，川水、汉江都提前，受灾面积中，溃水内涝及先涝后洪约占80%。（我这里说的比例同林一山的完全不同）水利部门历来重防洪轻除涝。因此，武汉被围困40天。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决非“落后”不可靠之物，决不可贬低而放松其作用。不论有无三峡，必须搞好堤防，1870年所谓长江千年一遇的大洪水，主要是川江洪水，四川灾情极重。洪水过三峡后，向南冲开松滋口（南岸四口中最上位），并未割破荆江大堤。因此说什么荆江决口要死上百万人，是一种危言耸听不实之辞。我们的能耐难道还不如蒋介石时期？长江堤防现已加高加固，1954年洪水再来，武汉可保无恙。长委总工程师已讲清楚了这个问题。

孟浩然说：“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宋朝以前荆江灌段9穴13口南北分洪，演变到明朝，最后剩下的北岸郝穴，被宰相湖北人张居正堵塞，于是洪水向南（历史上北堤固于南堤）先后冲开藕池、松滋、调弦、太平四口洪水经洞庭湖入江，于是，云梦泽从历史上消失了，从而淤肥了洞庭湖田。（湖北人因此埋怨张居正“保北舍南”的政策。辩证法说明洪水也有有利的一面。）历史上盲目围垦湖田，防洪标准只能依据国力逐渐提高，想一下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历史与现实说明长江防洪最重要措施在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如已修的荆江分洪区很起作用。这也是至今世界各国采用的方针。如按坝高200米方案修建三峡水

库，估计移民就至少要105万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

我强调说，三峡如修建，其作用主要是一个一千几百万千瓦的大水电站（水库只有发电才能收回成本并赚钱）三峡水库防洪能保护荆江大堤，对武汉并不起作用。胡乔木此时插话（显然是帮我的忙）讲水电很重要，引起主席与大家兴趣。乔木曾同我谈过，主席爱听好事、鼓舞人心之事。于是我说，1957年，我国电量为190亿度（装机约460万千瓦），钢524万吨，煤1.2亿吨。15年赶上英国，钢要求达到3500~4000万吨，煤5亿吨，电2000亿度（电相当于苏联1957年水平）。电的增长倍数最大10倍。现在190亿度电量中，水电只占47亿度（23%），其他均煤电。火电发展受煤的制约。如东北煤炭虽多，但不久以后也将从关内运煤去。中国水力资源世界第一，开发条件极其优越，造价比火电贵不了多少。因此，电力工业长远方针应该是“水主火辅”，缺水力资源的地方才以火电为主。应尽力开发物美价廉的水电。西方和苏联都是优先发展水电。欧洲好多国家水电已开发殆尽。日本水力资源很少，都是小河流，1957年水电仍占电力的2/3，当年一占领东北就开发松花江和鸭绿江。水电站形成的水库，又有防洪、灌溉、航运等综合效益，一举数得，新安江2期工程预计为4年半发电，造价4.1亿元，每千瓦700元（后来实际为3年半发电，造价未超过）。谈到这个地方，我将带去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铺在桌上，引起了主席和与会者极大兴趣。之后，我又谈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是国家财力，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按水库高程200米，一个装机近2000万千瓦，能发1000亿度以上电的大电站，何年需要投入呢？根据苏联的经验，最大电站的极限可达全国电力的1/5-1/4。我又谈到电网是许多电站组成的，要什么样条件才能形成全国统一电网。因此，最乐观的估计，三峡这样大的电站，中国要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随后谈到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很复杂，如弄清地质情况要多年时间，搞水电的有此经验。其他多级船闸、电站机组容量（至少60万千瓦一台等）、以及施工等等问题，都是超世界水平的。国防也是问题，同世界形势有关系。毛主席这时插话：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决不能遭受破坏。有人插话，那是下游几千万人生命安全问题。最后我又谈到“围堰发电”，那种“临时电站”的极不合理。

我讲的时候，听者为之动容。讲完之后，我看到那些为我担心的人，或者担心三峡上马的人，似乎有一种宽松了一点的表情。这时我心中感到：如同下围棋，林一山执黑先行，可是现在棋局的主动权已操在执白手中了。两个人都讲完之后，毛主席发言：讲了还不算数，

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3天交卷。第3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 3. 执白后行操胜券

“两个冤家”在1956年都为三峡问题写过大块文章。就林一山而言，他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和长江规划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多年来朝思暮想三峡工程如何才能上马。1955年下半年，苏联专家来到后，长办即集中了长委成千技术人员，还有众多水电、交通、农业和科学院等有关部门的技术人员，以及十几位苏联专家，为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枢纽勘察设计而日夜工作，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次到南宁来，他让秘书带了那一大箱子材料，写起文章自是得心应手。关于三峡属国家长远规划问题，我虽然“胸有成竹”，但究竟不是我的日常业务。且1956年后，此事早已放下，现在仓促准备，所以成文速度远不如林一山，记得到第3天早晨，乔木急急跑来问我，文章交出没有？他说，林一山的已经印发了，怎么不见你的？我说，已经写好，就要交出，他看了一下我的开篇，就说，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写文章要有三性，准确，鲜明，生动，你这个开头还不够鲜明，于是我又稍加修饰，匆匆交出付印，这两篇文章已经收进历史档案，属于《1958年1月中央南宁会议文件》。林一山的文章约2万字，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内分四节：（一）长江概况，（二）综合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迫切性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三）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四）有关兴建三峡枢纽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我的文章约8000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将英国部分为四个问题：（一）电力工业在15年内赶上英国的关键，（二）水电能不能赶得上呢？（三）水电如何赶上去，（四）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投资与技术力量）。文中谈到电力长远发展方针应当“水主火辅”，关于三峡有六点看法，第一，控制三峡修建时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第二，投资问题，第三，105万人的搬迁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第四，三峡与国防的关系，第五，三峡的技术问题，第六，关于“围堰发电”问题，（现在看来，这篇文章仓促写出，有些问题就在当时也是离谱的），乔木点明三性之后，文章开篇加了这样一句话“主席：遵照您的指示，将如何更多更快发展水电，使我国电力工业在15年内赶上英国，以及三峡工程何时修建问题，汇报如下”。

第三天晚上，大概是1月22日，仍在原处开会，大家都已将两篇文章看过了，记得彭真坐在我的斜对面，看见他在我的文章上划了许多红杠杠，主席表态后，他拿起打了红杠杠的地方，支持我的看法，会议情况大概有

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决，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仍是毛主席先讲，说我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特别赞赏我文章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关于三峡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关于水电，说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这时李富春、薄一波也插话，都赞成只要有条件，应当尽量多发展水电，现在赶不上，第三个五年计划总可以做到水主火辅。主席最后还指着我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南宁会议产生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第47条为“要培养秀才”。）

关于坝址的地质工作，我在文章中着重谈到几年来在工作中的体会，是任何人都看得懂的，“三峡水电站所有重大的技术问题，可说无一不超过当前世界的水平很远，当然这一点吓不倒我们，但问题是需要时间”，“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技术问题允许冒一定程度的风险，但有一些技术问题绝不可丝毫冒险，任何一个水电站的工程中，在开工之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地质问题，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在峡谷中间斩断一条河流，将顽皮的水驯服下来，而被拦河坝抬高起来的比平时增加了几百几千倍力量的水流，它总是不服输，总是尽力地、无孔不入地、日日夜夜地来破坏我们的工程，河流的峡谷在地质上属于最软弱的地带，否则河水就不会从这儿冲出来，因此凡是修水电站的地方，地质问题总是极其复杂的，总是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弄清楚，总是同我们的主观愿望作对，这个问题决不能有任何疏忽，决不能有任何侥幸的心理，这是所有从事水电工作的人员感触最深的一个问题。”

毛主席最后很不客气地对林一山说，第一段不大懂，你师范大学毕业，文理不通（这两句话《工作方法六十条》最初草稿曾写入47条：要培养秀才）还说谁要是想睡好觉，听林一山讲一顿，你写文章大而无当，薄一波和胡乔木这时也把林一山重重批评了几句，要说实在话，再不要在中央面前讲煽动性的话，第二天吃饭的时候，乔木又对林一山数说了一顿。

### 4. 中了“状元”反担忧

我没有料到的是，在散会之前，主席指着我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我连忙说，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这时，旁边的人也讲赞成的话，主席于是说，是兼职的嘛。会后，毛主席将三峡问题交给周总

理负责处理。

这样一场三峡之争的结局，我是有精神准备的，可是“当秘书”这个意外结果，我真是毫无精神准备，这在党内恐怕也是“史无前例”之事。三峡问题是南宁会议最后一个议题，大家都为此事的如此结束而高兴，田家英、胡乔木等不用说，北京来的知道三峡轻重的人，将心上的一块石头放下了。周小舟向我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李锐，你中了状元了。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主席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过去在延安时我就同田家英较熟识，1941年秋，我从中央青委调到《解放日报》评论部工作，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有文章来，必经我手，于是也就成了文字之交，1952年秋，我从湖南调到燃料工业部管水电建设，从此脱离“坐而论道”的宣传岗位。一到北京，我就把多年搜集的一大批中国近现代历史书籍送给他了，表示从此“洗手”，脱离文字生涯。家英自1948年就担任毛主席的专职秘书，那本《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在《中国青年》连载时，我让他同刊物编辑直接打交道，内容也由他全权处理。他比我在行，多年来，我们之间可以随便谈心，没有什么顾虑，确实是“多时不见忽相忆，无事而来乱扯谈，世界纵横三万里，古今上下五千年”，<sup>①</sup>我早就知道一些他在中南海工作的难处，他也谈过主席的一些性格特点，特别是有时意见多变，不易适应。散会后第二天，家英跟我详谈了此次会议的情况后，我对“兼职”之事忧心忡忡，说自己心中藏不住东西，心直口快，恐怕容易惹祸。还说虽已活到40岁了，并不善于处理复杂的环境，尤其没有应付高层人事关系的本事。但他赞成我这种“兼职”（后来曾想活动我任“专职”，被我坚决拒绝了），原因在他们都不熟悉工业，认为主席（我们谈话时他称为“主公”）现在直接抓经济建设，我来了，可以作他们的帮手，等等。我开玩笑说，我这是“自投罗网”。回北京见到刘澜波时，我也谈过此种心情，而且肯定说，我一定会碰到麻烦的（我用了“碰鬼”湖南土话），不料这些话真成了谶语。

同周小舟也是能随便交谈的，他是一个平易近人，讲究实际，遇事有自己见解的人，南下时，他是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我任过他的副职，1951年初他到湘西任区委书记。即由我接替他的职务。小舟抗战初期担任过毛主席的秘书，因此对我这回的“胜利”，特别高兴，他还特意让我签名送他一本，《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当时南宁书店正摆满了这本书。关于会议的情

况他也谈了些自己的看法和感想，说很想读点书，更多地熟悉经济工作。

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时，胡乔木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同他谈问题也较少顾忌。

“水主火辅”方针的认可，这于我可说是此行最大的收获，觉得从此水电部建设可以展开一个新的局面，要钱要人可能比以前会顺利一些。但这个方针在电力部内部是会有争议的，尤其计划部门和火电系统会持怀疑态度。多年来，我常常谈到水电是在“夹缝中奋斗”（“夹缝”即指火电与水利之间），觉得今后有可能从夹缝中脱出，从事水电建设的人，无不希望水电这一廉价、再生、干净能源，能多搞快上。这时尽管心情有愉快的一面，但我仍背了两个包袱离开南宁回到北京，一个即“兼职秘书”，前途未卜；另一个是水利、电力两部合并，我很不安，担心受到责难。因两部领导对此毫无精神准备，以为是我挑起了这种矛盾，导致合并，我知道电力部的同志是不同意采取这种办法解决矛盾的。于是我向李富春反映了这种顾虑，请他向两部领导讲清这个时差——并非是我谈了三峡的看法和两部矛盾之后才做的合并决定

我的秦城诗作《龙胆紫集》中，有三峡诗三首，其中第一首即记南宁开会之事：

一电忽传飞邕宁，事关三峡误三门。

故人为我担忧虑，成竹藏胸敢直陈。

骋辩当廷虚实显，上书隔日是非分。

偶逢破格常言事，祸伏之心归语人。

第三首则对“秀才”之名颇有看法。在三峡之争中，我是从自己的工作水电建设同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关系，作了经济和技术等较全面的了解，才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看法，从而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毫不动摇。如果说在这场争论中对优胜者值得赞扬的，首先应当是义理和经济，而非词章，而且这是脱离了坐而论道的宣传岗位后，才能做到的，这种心情和祸伏结局，反映在第三首五言十二句中：

案前摆战场，亦似叙家常。

诸公心落石，朝日雾飞光。

但说文章好，未言经济长。

已非涂抹手，斩水劈山忙。

或云夺鼎甲，谁解非瑞祥。

及今思谶语，鬓雪须也霜。

不过，我同三峡的纠葛没有完，对此我将另作“交代”。

（本文是作者长篇回忆录中的一章，本刊有删节。）（责任编辑：卢弘）

<sup>①</sup>见《龙胆紫集》“怀田家英六首”第一首。

# 周恩来与三峡工程

访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

陈先义



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炮火刚熄，中共中央一纸命令，把一位挥师征战的将军调到了长江边，毛泽东、周恩来派他来管理长江水利。从此这位多年鏖战沙场的军人，便改行当起了长江大总管，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双目几近失明。他，就是被人称为“倔老头”的林一山同志。此刻，他对我谈起周恩来生前对三峡工程的关注，那无尽的话语似长江之水，滔滔不绝。

环顾林老居室的四壁，我似乎置身在水的世界。西墙并列悬挂的荆江分洪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陆水试验坝、葛洲坝工程等巨幅彩照，记录着林老为中国水利事业40年奋斗的足迹。引人注目的是单独悬挂在东墙的那幅照片。照片上，头戴一顶深色毡帽的周恩来正全神贯注地听林一山讲着什么，飘飞的雪花撒满了总理全身，连那浓黑的双眉也被雪花染白了。照片记录的是1958年2月林一山陪同周恩来查勘三峡坝址的情景。此情此景，引出了林一山许多难忘的回忆。

在长江兴建三峡工程，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从建国之初就开始酝酿了。此前的旧中国，孙中山曾在他的《实业计划》中作过设想，国民党政府也曾花费数百万美元进行过初步筹划，但均如过眼烟云，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萦绕在中国大地几十年的三峡梦又升腾起来。林一山永远不会忘记，1953年2月，他陪同毛泽东乘“长江”号军舰在长江连续航行三天三夜之后，对修建三峡工程的宏伟设想，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的政府，一定要为人民办好这件大事。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在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全国人民通力支援，把灾害减少到最低程度，但仍淹没耕地4755万亩，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万余人，京广铁路100天不能正常运行。这年冬天，在北行的专列上，毛泽东、周恩来问林一山：上三峡工程，我国技术力量如何？林一山十分自信地回答：“如果快上，需要苏联专家帮忙。如果稍等一段时间，等完成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之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完成三峡工程的设计。前两三年苏联专家对我们有帮助，两年以后我们将超过他们。”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那兴奋的神采，令林一山终生难忘。毛泽东、周恩来在1954年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商定，第一批苏联水利专家于1955年春来华，一个伟大工程的全面规划开始了。1956年，当毛泽东在畅游长江之后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伟大诗篇之后，周恩来也许下宏愿：一定要把这个造福人民的伟大工程建设好，作为共和国总理，他要让毛泽东亲眼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宏伟景观。

然而，一个伟大的设想，既需要非凡的勇气，更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周恩来是务实的。自从中央决定上三峡工程以后，三峡的大小事都牵动着他的心。一个数字的改动，一个方案的拟定，常使他夜不能眠。周

恩来曾不止一次对林一山说：在山谷中修一座200米高的大坝，是千年大计，承受力如何，重要的是坝址要选好，选对头了，会福荫后人；选错了，却会遗祸子孙。

林一山不会忘记，恰恰在选坝址问题上，中苏专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抗战末年美国水利专家萨凡奇拟定的南津关方案；另一种则是中国专家的三斗坪方案。在苏联专家看来，前者是不容置疑的，因为萨凡奇是国际权威，有设计60余座大坝的历史，美国著名的鲍尔德水坝和大古力水坝，都是他的杰作，是誉满全球的坝工专家。而林一山领导的中国专家组一开始就认为：南津关地质结构不符合建坝条件，萨凡奇是在抗日战争的连天炮火声中匆匆勘察的。即使是国际权威的方案，也决不能盲目照搬。两种方案摆在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面前，怎么办？一贯以工作细心著称的总理不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他对林一山说，我一定要去现场亲自看一看。

1958年2月的一天，大雪纷飞，寒气袭人，林一山陪同周恩来顶风冒雪溯江而上，来到三峡。那天首先来到了南津关地区著名风景区三游洞，这是因白居易、元稹、苏东坡曾来此游玩而得名的旅游胜地。周总理一看双眉紧皱，对林一山同志说：“我是来查勘三峡坝址的，你怎么带我游山玩景呢？”林一山忙解释说：“这里是南津关方案中典型的石灰岩结构，我是请您进洞看岩溶构造的。”三游洞里，钟乳倒挂，石笋林立，总理一边看，一边对在这样地基上建坝表示了忧虑。对于两个坝址的区别，林一山曾向他和毛泽东作过专门汇报。南津关属石灰岩地区，虽抗风化，但溶洞漏水却是一大难题；三斗坪属花岗岩地区，坚硬，不透水，却有风化层。当林一山说三斗坪以上的河段是片麻岩时，毛泽东高兴地拍着手说，片麻岩，好啊，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抗风化性能要高得多。此刻亲临现场，他才真正觉得在石灰岩地区建坝漏水问题的严重性。出了三游洞，他们又冒雪到了三斗坪坝址。周恩来接过林一山递来的花岗岩岩芯，用地质锤轻轻敲打几下，那声音如同金属的碰撞。在经过详细查勘之后，周总理高兴地对林一山说：“感谢你们选到了这样好的坝址，实在太好了。”他指着远处的一座高山问林一山：“建成后的大坝有这山高吗？”林一山回答：“有这山高！”周恩来说：“那将是多么雄伟壮观啊！”林一山看到，总理双眼闪着兴奋和喜悦的光采。

也就在这次三峡查勘过程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兴建三峡水利枢纽的会议。在这次会上，他仍然没有急于拍板，而是再次请大家就选坝址问题发表意见，特别提示大家就三斗坪方案进行辩论。苏联专家提出：若在三斗坪建坝，三斗坪至南津关峡谷间有40公里航道处在

三峡水库下游，这段险滩若得不到改善，势必成为出川航道的卡口，给航运造成困难。总理认为，苏联专家的这个意见很有见地，考虑也比较细心。在他的主持下，中外专家经过认真讨论，终于形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在三斗坪下游40公里处修建葛洲坝反调节航运梯级，以改善坝下航道，使之成为三斗坪至葛洲坝间的航运梯级和反调节水库。兴建葛洲坝方案的形成，使三斗坪建坝的方案显示了更大的优越性。这次会议，周恩来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精神，给中外专家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苏联专家这样称赞：有这样工作细心、从善如流的总理，三峡工程一定能建得好！

1959年的夏天，周恩来总理再度召见林一山，详细询问三峡工程的准备情况。当问到规划设计达到什么程度时，苏联专家回答说：到了可以立即进行施工准备的时候了。此刻，周总理是那样激动。是啊，自从全国解放那天，他和毛泽东一起，都在做着三峡梦，谋划着这项功在子孙的宏伟大业，眼下，三峡工程将要破土了，他怎能不高兴呢！然而，也就在这时候，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形势都发生逆转，工程不得不暂时搁浅。此后，持续十年的动乱，使工程更难上马。一项伟大工程最终成为周恩来的一桩遗愿，成为他终生的遗憾。

三峡工程虽然搁浅了，可那宏伟壮丽的三峡梦却时时在总理心头萦绕。即使在“文革”的动乱年月，周总理仍惦着三峡。上三峡工程有困难，总理决定考虑先上三峡的反调节水库和航运梯级的葛洲坝，为上三峡工程作实战准备。林一山不会忘记，在动乱年代，是总理出面干预使他受到保护；他患眼病，又是总理亲自关心过问他的手术及治疗。上葛洲坝之前，又是总理把他专门请到北京，请他这位长江大总管发表意见。当他得知林一山对先上葛洲坝有不同意见时，总理是那样耐心地和他商谈，讲葛洲坝是三峡工程的组成部分，讲上葛洲坝是为上三峡作实战准备。其实，总理又何尝不想先上三峡呢，但是国内情况已不允许他这样做了。

作为一项伟大工程，周总理考虑三峡问题非常重视不同意见。1970年12月16日，由周总理主持讨论葛洲坝的会议已经结束，他得知林一山有不同意见，又单独听了林一山的陈述。当他发觉这些意见有价值，即使先上葛洲坝，也可以从这些意见中有所借鉴时，还特意让林一山写了份文字材料，附在确定上葛洲坝工程的报告后面，一块报给了毛主席。12月26日，毛主席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这足以说明，毛主席、周总理考虑三峡的事是非常缜密的。

在后来的葛洲坝施工中，由于受“文革”中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口号的影响，出现盲目蛮干现象，已经

浇筑的混凝土出现“蜂窝”、“狗洞”，坝身出现几十条大裂缝。1972年11月的一天，身患癌症的周总理带病接见葛洲坝工程代表，他面色严峻地说：“长江上如果出问题，修一个坝不成功，垮了，是要载入党史的。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同月21日，当他再次接见葛洲坝工程代表时又说：“20余年来我最关心两件事，一个是上天，一个是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是外行，也要抓。”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宣布成立以林一山为负责人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把他最关心的事交给了林一山。林一山没有辜负总理的重托，他率领葛洲坝工程的科学工作者经过十数年英勇奋斗，终于使这座被誉为“中国新长城”的大型水利枢纽巍然屹立于万里长江之上。遗憾的是，曾为之呕心沥血的周总理，没能看见这项工程变成现实的日子，便辞别了人世。

上葛洲坝工程，最终还是为了上三峡工程，这是周总理的深谋远虑，也已经为现实所证明，如今，当人大会议对三峡工程已经表决通过时，人们倍加思念从建国之初便关注三峡工程的周总理。在结束采访时，年逾80的林一山踌躇满志地说：“想到周总理，想到三峡，我便觉得浑身是劲，为三峡，我要尽余生的绵薄之力。实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高峡出平湖’的遗愿，是我毕生的追求之一。”

(责任编辑 晓 渡)

大型普及性新闻知识综合月刊

## 中国记者

新华社主办 征求  
1992年订户

“文字摄影并重、国内国际并重”是她的特色。普及性、知识性、可读性是她的追求。广大的新闻爱好者是她的朋友。

本刊代号：82-2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北京新华社《中国记者》  
发行组代办邮购。邮政编  
码：100803。订价每册  
1.95元。

欢迎征订



# 徐特立的四次整寿

师秋朗

今年2月1日，是徐特立老人诞辰114周年，每逢这个日子，总要引起我们对他的深深怀念。徐老生前，每逢生日总有不少同志向他祝贺，以表达对他的崇敬和热爱之情。

## 60大寿

1935年，徐老作为红军中最年长者（58岁），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吃苦耐劳、照顾别人，鼓舞士气的精神超过了年轻人。朱德总司令在徐老60寿辰时，以《你是一个老怪物》为题的祝寿信中写道：“我所见到你的革命精神与行动，真是可钦佩的。尤其是你的耐劳忍苦的模式，更兴奋了红色指战员及一般的同志，就是那些悲观失望、老掉队落伍的人们，想起我们徐老头样子，也就起来跑了。”

1937年2月1日，是徐老的60寿辰，这是徐老51岁入党以来第一个整寿。延安的干部们自发地给徐老做寿。在祝寿大会上，蔡畅、邓颖超给徐老戴上红领巾，并讲话赞扬徐老对党无限忠诚，对同志关心爱护，特别强调了徐老尊重妇女，对夫人徐师母的爱情始终不渝，他的高尚品德是共产党员的典范，徐老听了很激动，即席讲了以下的话：

我一直在外从事教育和革命，我的妻子是一个童养媳，没有文化，从小与我患难与共，她在家抚养儿女，还兼劳动兼办学，她支持了我的事业，也成全了我的事业，我一生提倡妇女解放，我假如丢弃了她，岂不又增加了一个受苦受难的妇女……

毛泽东给徐老的祝寿信中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

先生。”“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 70大寿

1947年初，胡宗南进攻延安在即，中央机关大部分都已疏散，徐老也到了绥德，随时准备渡过黄河，延安只留下毛主席和一个行动灵活、精干的机关。

毛主席留在陕北是为了吸引敌人的兵力并加以消灭之。可是敌人摸不清中共中央究竟还在不在陕北，举棋不定。毛主席为了帮助敌人下决心，就需要告诉胡宗南：“我在陕北，你来吧。”可是这句话怎样说法呢？他便想起了给徐老做寿。

绥德专区的同志早在暗暗地筹备为徐老祝寿。突然一骑快马来到，请徐老回延安，中央要给他老人家做

寿。徐老立刻意识到此举的意义，他说：“这是政治寿！”，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跟通信员返回延安。

新华通讯社的无线电波把这一喜讯传遍了全国。徐老桃李满天下，于是蒋管区和边区遥相呼应，一个规模巨大的祝寿活动在中华大地上涌起。

党中央给徐老的祝寿信上说：“你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又说：“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把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发扬光大，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任务。”

## 80大寿

1957年2月1日是徐老的80大寿，这个日子处于当时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最好的时期。

1957年1月的一天，朱老总给徐老打电话，要到徐老家吃豆花，徐老一家人忙做准备，泡黄豆、磨豆子，做豆花。

当朱老总品尝着四川风味的豆花时，突然提出要为徐老庆80大寿，徐老坚决不同意；朱老总为了宣传这位革命老人，坚持一定要做，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徐老没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在寿辰的前两天偕夫人和儿媳徐乾去了长沙。

长沙是他的学生最集中的地方，徐老的到来，像春风一样吹遍了长沙市。他的学生们纷纷前来探望徐老，一时间挤满了一屋子人，除了和徐老亲切交谈之外，还有人在窃窃私语商量什么。其中一位口快的说：“徐老，我们明天给您祝寿！”，徐老赶紧说自己的生日已经过去了。在场的人都说他们记得清清楚楚，莫想瞒过。徐老后悔莫及——躲寿不该躲到长沙来。于是赶紧买票，连夜上了去桂林的火车。

2月1日这天，徐老坐在火车上。徐乾出于孝心，到餐车上商量做两碗寿面。车上的服务人员得到这一信息，高兴极了！列车长带着乘务人员前来给徐老拜寿，乘客中也有听到这一喜讯前来给徐老拜寿的。就这样，徐老过了一个躲也躲不开的80大寿。

## 90大寿

1967年2月1日，徐老在北京西单堂子胡同20号迎来了自己的90岁生日，也是最后一次整寿。这一次，他不用耽心别人会给他做寿。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魔力使全国疯狂起来已经七个月的时候。本来常有他的老同事、老学生、老战友以及民

主人士来看望他，拜访他，现在没有人来了；徐老的老伴9年前已离他仙逝，唯一剩下的一个女儿也在接受审查，不能常来看他。整天陪伴徐老的，除了徐乾，就是一架半导体收音机。

一天，难得一位老朋友来看望徐老，他是右侧瘫痪了的谢老（觉哉）。谢老是坐着轮椅，由王定国推着来的。二老相见，格外高兴，只有这时才得以倾吐衷曲。徐老说：“我真是老了，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谢老也用含混不清的口齿说：“我也是一样。”徐老说：“我真想回乡下学养猪，还能清静地读点书。”谢老苦笑着。谢老回到家中，用左手写了一首七绝让王定国送给徐老，写的是：

九十高龄力有余，身闲不住待何如。

人老又羨耕和读，想傍桑荫学养猪。

徐老看了很高兴：“知我者，觉哉也。”

寿诞这天，徐乾总觉得心里过不去，又不敢自作主张，便同徐老商量：“请图片社来人给您照张相吧？”徐老摆摆手不让找。

徐老度过的最后整寿，是一次忧郁的大寿。

透视历史内幕  
追踪社会热点

爱我中华

扩大发行  
欢迎订阅

爱我中华以弘扬民族文化，沟通中西文化信息，推动改革开放大业为宗旨，特别注重发表透视上层历史内幕，追踪社会热点的重点作品，注重纪实文学的商品味和深层历史感，常设专栏有“华夏英杰”，“走下神坛”，“历史回眸”，“台港之窗”，“法制天地”，“明星世界”，“改革之路”等，自91年7月创刊以来，已发行百万册。

爱我中华现为双月刊，逢单月出版，自1993年起，将进一步革新内容，扩大报道面。为满足读者需求，交邮局扩大发行，邮发代号为26-87，单价2.90元，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也欢迎与本刊洽谈包销、零售业务。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209号，邮编230022，电话：335624，335623转爱我中华杂志社。



1958年，毛泽东在视察安徽“大跃进”时，欣然命笔：“沿途一望，朝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安徽出现罕见的大饥荒，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痛心之余，提出搞包产到户的“救命田”，正处于天灾人祸困境中的毛泽东，急不可待的支持了他，要他先搞试点。可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成了“两极分化的祸害”。会后被罢了官，郁郁而终。

# 『刮单干风』的曾希圣

## 沉浮记

水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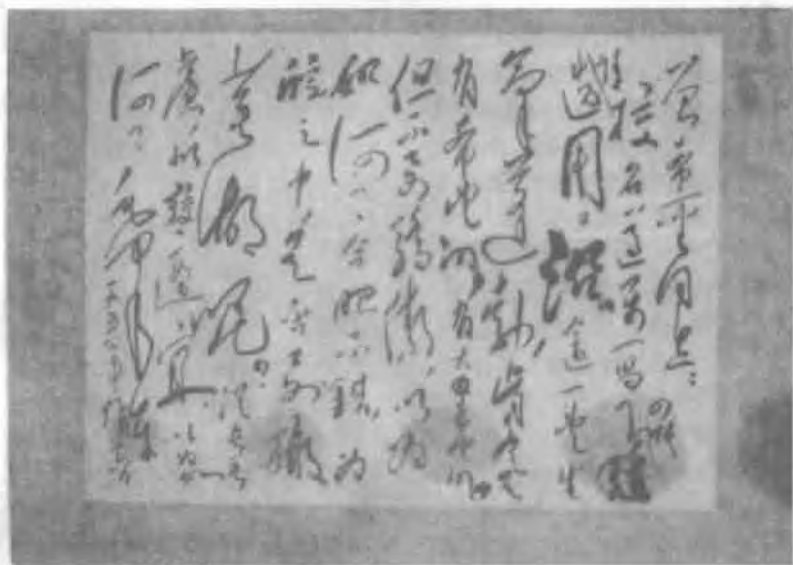
六十年代初，建树多、政绩卓越的曾希圣，却被撤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而长时期赋闲在家里。使我颓丧的是，正是由于他的创造性工作，使他失去了工作的机会。对于一个极富事业心的人来说，损失的就不仅仅是组成他的生命的时间；社会也因而慨叹，因为它少了一股强劲的推力。

我一向尊重曾希圣同志，和他的夫人余叔更是莫逆之交。但我之所以对他的遭遇感到惋惜，不仅是因为私交好，而且我还是他的老部属。

1944年，我参军到新四军七师时，他是七师的政委。是他使原来仅有3千人的部队，很快发展到3万多人，这是皖江地区军民皆知的，所以他威望很高。但他的性格刚烈，爱发脾气；加之不修边幅，满脸的络腮胡子，更觉得威严可畏。我那时才十六七岁，一听说“曾胡子来了”，马上就躲藏起来，怕与他碰面。不过，我很少看到他吹胡子瞪眼睛。听同志们传

说，他对女同志从不发火；女同志有什么要求，只要抹几滴眼泪，他就会批准的。我当时还是个黄毛丫头，除了工作，无事可求，所以也不曾验证。他的夫人余叔原是上海的学生并做党的地下工作，因为暴露了，党才把她送到七师来。曾希圣一眼就把她看中了，又是书信、又是情诗、又是谈话，向她坦露一片爱心，总之不停顿地正面进攻和翼侧迂回相结合，他们终于结婚了。我到七师时，就听说不少他们恋爱的逸闻趣事。但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接触过，他们自然不会认识我。接着日寇投降，七师奉命调山东集中，我们徒步走了三个多月，经过皖、浙、苏、鲁四个省的艰苦行军，才到达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不久，为了开辟东北根据地，我又被调往辽东地区工作。

真正认识曾希圣夫妇是在15年后的1959年春。当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曾希圣是安徽省委



△ 毛泽东给曾希圣的信

第一书记，尚奎是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因为又属同一个大区，所以都住在锦江饭店十八楼，而且是隔壁邻居。曾希圣比尚奎年长一岁，两人私交很好，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都是50岁的人了，还“小曾、小杨”地开玩笑。当我知道他们夫妇都近在咫尺时，高兴极了。我先去“侦察”了一下，看看这位老首长现在什么样子。我故意经过他们房间，在门口细打量了一下，他不再是那个全副戎装、令人生畏的“曾胡子”了，但面目依旧，只是头上有了白发，额上多了皱纹，一身深咖啡色中山服，使他显得有点文质彬彬的样子。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

不一会儿，余叔回来了，尚奎带我到他们的房间里。一谈起来，我曾同他们在部队，共同语言很多，一会儿我们就成了老朋友了。

“水静，你是七师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曾希圣说，“要是当时认识了，我会对你很好的。”

“你是大首长，我是小兵，几万人，怎么能都认识呢？”我说，“我可早就认识胡子政委了。你跟余叔的风流艳史，我还捡了一箩筐呢。”

他嘿嘿一笑说：“是吗？你倒是说说看。”

“孩子都这么大了，还扯那些事

干什么？”余叔打断他的话，然后对我说：“说真的，水静，要是那时候我们认识了，那该多好！”

我开玩笑说：“他那么凶，我哪敢挨边呀！”

余叔解释说：“其实老曾对人心肠挺软的，特别怕女同志哭鼻子。”“我也听说胡子政委是‘老虎脾气，菩萨心肠’”。我笑道，“不过，我那时还不了解，要不然也在他面前哭它一鼻子，说不定会哭出个一官半职来的。”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曾希圣笑着对尚奎说：“你这个水静呀，真够厉害的。”

我跟余叔更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她比我大两岁，当时是安徽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曾希圣的秘书。她出生在上海，自幼失去父母，寄人篱下，由于这种生活的锤炼，使她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倔强的性格和富于正义感。我们的性格、兴趣、爱好都极相似。我们不顾非议喜欢穿着人时的西装、旗袍、连衣裙。喜欢“海派”打扮。等等，每次中央召开省委书记会议，我们只要碰到一起，业余时间就形影不离了。

和曾希圣接触多了，就觉得他的脾气暴躁的一面被夸大了。有时候，他还是很有耐性的。记得有年冬天，中央在上海开完会后，决定让各省负

责同志到广州过春节，于是我们两家都把孩子带去了。过完春节，便安排我们到海南岛参观，而且是我们两家合乘一架飞机。我的女儿听说要飞过大海，便对我说：“妈妈，我不去了，掉下来会淹死的。”任我们怎么解释，她就是不去。这样，我和尚奎就决定不带孩子们去，可是到了动身的那天早上，大家正准备上车去机场，我的小儿子新力却一声不吭地坐到司机座位旁边，要去海南岛。先是我劝他留下来和妹妹在一起，阿姨叔叔会带他们到公园里去玩的。接着尚奎又去说服他，还讲了很多道理，他就是不下车。父子俩谁也不让步，僵持了40多分钟。飞机快要起飞了，以脾气急躁闻名的曾希圣，却一点也不着急。他笑嘻嘻地等着，看着严肃得使人发笑的俩父子，还不时走过来开尚奎的玩笑：“看这位大书记呀，连这么个小不点儿的儿子都说服不了。”

我和余叔都笑了。我说：“这个小家伙呀，像他父亲一样，不慌不忙，很有主见。这两天他从来没提要去海南岛，可是他心里想好了，到时候就非去不可。你看吧，最后他还是个胜利者。”余叔笑道：“有种像种嘛！”

后来连我也不耐烦了，曾希圣还在那里嘿嘿地笑着。直到机场打电话来催促，尚奎才不得不同意小儿子去海南。

在飞机上，我悄悄对余叔说：“老曾今天真不错，等了那么久也没有发火。”余叔说：“他很多时候都是通情达理的，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火爆火爆。要不然，谁受得了呀？”

话说回来，即使曾希圣有个坏脾气，不妨碍他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

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曾希圣是一个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仍不少。有一次我和尚奎在他们住处聊天，尚奎提到中央苏区的一些事，不知怎么触发了曾希圣对他哥哥的怀念。他告诉我们，他的哥哥叫曾中生，比他大4岁。1925

年，中生考进黄埔军校，结识了周恩来同志，不久党派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便到周总理主持的中央军委工作，很受周总理的器重。1930年冬，他又受中央的派遣，主持鄂豫皖特委和军委的工作，使红军和苏区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张国焘到达鄂豫皖后，推行王明路线，疯狂排挤和打击原来的领导，撤销了曾中生的党内领导职务，调任红九军政委。曾中生和徐向前等同志在一起，不顾个人安危，对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遭到长期关押，1935年终于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当中央命令张国焘保证曾中生同志安全的电报到达四方面军时，他已罹难半年多了……

曾希圣谈起来仍然很不好受，说明兄弟间的感情很深。他还说：“周总理对中生的死非常惋惜，直到现在，还常提起中生的往事……”

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尚奎说：“我常听人家讲，周总理特别喜欢曾希圣，原来是首先喜欢他哥哥的缘故。”

“不，这不是主要原因。”尚奎摇摇头说，“曾希圣之所以为总理所看重，是因为他有突出的聪明才智、战功政绩。”据我所知，他在中央苏区跟总理在中央军委工作时，他的一项特殊功绩就是参与创建了中央军委二局，并且担任了第一任局长。在1932年以前，红军和敌人作战，没有专门的军事情报机关。二局成立之后，在曾希圣的组织、领导下，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供了大量的准确的军事情报。红军之所以能在反围剿战争中以弱胜强，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后来又能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摆脱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跳出重围，取得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除了得到人民支持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之外，二局提供及时而准确的军事情报，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功劳是不小呀！”我说，“是呀，所以毛主席把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比做红军夜行军的灯笼，

说：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像的，有了二局，我们就象打着灯笼走夜路。这是很高的评价。周总理则称赞曾希圣是我军军事情报工作创业的人，他曾与朱总司令一起，给曾希圣颁发过一枚二级红星奖章。”

“原来是这样！”我恍然大悟了，但又有点嗔怪地说，“可是他从来没提起这些事，余叔也没有跟我说过呀。”

“我知道这些，也不是他说的，是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告诉我的。”尚奎说，“他立下的功绩知道的不多。实际上，就是你这个七师的兵，对曾希圣如何开辟皖江根据地，如何创建第七师，如何以大量的财政、物资支援兄弟部队，为解放战争立下汗马功劳，也知之甚少。他还当过二野的副参谋长哩。”接着尚奎又谈到曾希圣治理安徽这个饱受旱、涝灾害的农业省取得的政绩，比如曾希圣提出的具体治淮方针受到毛主席赞扬，取得良好的效果呀，又在两年间从上海迁进了一百

多个工厂企业，为安徽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呀……

我算彻底明白了，像曾希圣这样一个屡建奇功且又不居功自傲的骁将，那个统帅不爱呢？同时我也知道了尚奎对他如此尊重，如此契合的原因。

打这以后，我对曾希圣又多了一层尊敬。

庐山会议的后阶段，我和余叔依旧常在一起，但和曾希圣会面的机会却不多。这并非他出了什么麻烦，而是会议本身开得紧张了起来。这时候，他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是积极的，肯定的，因为安徽在执行中是比较坚决的，一时还没有认识到它的严重后果。我曾向他反映过我的家乡安徽无为县饿死人的问题，他听不进去。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当时流行一种所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公式，凡属缺点错误，大多笼统地归于“个别问



△ 1960年，在广州会议期间，杨尚奎、谭启龙、曾希圣、江华、叶飞、江渭清合影

题”，“一个指头”的问题，即使问题已大大超过一个指头的范围。这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现象，是无需多作解释的。

1960年春，山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大跃进”的问题暴露得够充分了，也引起了中央相应的重视。华东局在济南召开了一次会议，着重解决山东的问题；中央派了谭震林前来参加。尚奎是华东局的书记之一，当然是要与会，所以我也跟他到了济南。会议开了几天之后，便派曾希圣随谭震林去北京向中央汇报。余叔知道我还是刚解放时到过北京，便邀我同去看看首都新貌。

1949年的秋天，我随部队驻防丰台，北京和平解放之后，我们去参观了几天。那时城里乱糟糟的，地摊随意乱摆；房屋陈旧，道路肮脏，行人寥寥，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故宫也没有修整，斑斑驳驳，零乱不堪。总之，给人以破破烂烂的感觉。而11年后的北京已是焕然一新了。天安门雄伟庄严，长安街宽阔整洁，建国后的10大建筑巍然耸立，使这个古老的都城变得精神抖擞、光彩夺目。这使我们对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满怀敬爱和信心，觉得在我们的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也许，这和曾希圣的情绪对我感染有很大的关系。从他自然流露出来的充满自信的微笑来看，他们的汇报显然很顺利。

三天之后，我随曾希圣夫妇回到济南，华东局的会议在继续进行。会议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免掉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职务，由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原是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现在又兼领山东，一身兼任这么多要职，在地方高级干部中是少有的，特别是同时担任两个省的第一把手的实职，更属罕见。这一方面说明他精明强干，能力超群，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党中央对他的充分信赖。我跟他开玩笑说：“你现在不但是大忙人，也是大红人呀！”的确，这是他一生中

的顶峰时期。

他立即由合肥迁居济南，狠抓了山东的问题，使工作迅速走上了正轨。直到新任书记到来，他才重返安徽。

这时，安徽的问题也显露出来了。其实，岂止安徽，我们整个国家由天灾、“人祸”造成的严重后果，已在神州大地蔓延，开始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最严重的时期。安徽粮食短缺，人口大量外流，农村饥荒，饿死人已不是个别现象。后来在广州会议上他和尚奎作了一次恳切的长谈，他说当他了解到农村实际情况以后，他感到失职、内疚、痛心。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等等是那么严重，更没有想到它们使农村生产力遭到那么广泛的破坏。他在有关会议上主动作了深刻检查，对自己高高在上，偏听偏信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然后亲自组织干部研究合作化的历史，解剖解放后的农村，一定要找到一条摆脱当前困境、连接今后坦途的出路。

他本来就是一个实干家，经验丰富、才智出众、善于思考，为探索一个问题答案，他可以坐在办公桌前半天甚至整天的纹丝不动。他是一把未老的宝刀，稍一擦拭，便寒光闪闪、锋芒显露。他从社会主义工业的按件计酬责任制，联想到为什么不可以搞社会主义农业的定产承包责任制呢？经过反复推敲，终于形成了以户计工、多产多得、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等一整套设想，并提交到省委书记办公会上讨论。大家都赞成，但又觉得风险甚大。于是他又亲自带工作组到农村去试点，根据自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和经验，又亲自起草了一个文件：《定户到田、责任到人问题》，最后据以制定了“包工包产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简称“责任田”。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农业六十条》，他向毛主席汇

报了自己的设想，毛主席当即表示同意他搞试点。他还跟尚奎详细地介绍了“责任田”的一些细节，尚奎很欣赏他的创见；回江西后，又接到中央办公厅一个通知，关于“责任田”的问题，各省可以搞点试点……尚奎还亲自布置省里和各地都要搞一个试点，并亲自到星星县搞了一个试点。赞同这种做法的，显然不只是江西一个省。

凡是试验“责任田”的生产队，毫不例外地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安徽在全省普遍实行“责任田”后，被广大群众誉之为“救命田”，因为它神奇地迅速地恢复了农业生产，改善了农民生活，丰富了市场供应，得到城乡人民一致的拥护。这种“责任田”和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八十年代初期完成的农业承包责任制相似，都是将生产效益和农民利益直接挂钩的办法，是和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民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如果在20年前我们就推行曾希圣所创造并为毛主席同意的“责任田”，结果会怎样呢？我国的农业将推进20年！

遗憾的是，冷酷无情的历史，从来不给人们一个“如果”。失去的机遇就像飘过的风，是无法找回的。于是我们的农业在那20年里，便在原地徘徊、踏步，裹足不前。

一个生机勃勃、活蹦乱跳的“责任田”，一个被证明的广阔的前景的“责任田”，很快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尽管邓子恢、李富春和许多老同志、基层干部上书求情、高喊“刀下留人”，也无济于事。在1962年春天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责任田被视为“单干风”、“翻案风”和“方向路线性错误”而遭到错误的批判与取缔。而且，“责任田”还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两极分化的祸害”。毛主席批评了安徽，批评了支持安徽包产到户

经验的邓子恢等领导同志和其它一些部门；并严厉地指名批评曾希圣是“要代表富裕中农利益”，“为天下中农谋福利。”曾希圣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被免去，并且牵涉到相当一批干部。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加在谁的头上都不是一件舒服的事，但他更为受他连累的同志而担心。他多次向中央表示，“责任田是我提出来的，也是根据我的意见推行的，一切由我个人负责，与别的同志没有关系。”在那时候，这能起多大作用，很难说。一个领导干部一旦出了“路线”之类的问题，总是要株连一些人的，至于株连面的大小，大致与他所担任的职务大小成正比。

余叔很难过，她对我说：“老曾搞责任田，是主席同意的了，而且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主席不说话，别人也不说话呢？”我思想上也想不通，总觉得这不公平，一则搞“责任田”并没有错，再则，即使错了，也不能让曾希圣一个当灾。可是不通也得通，谁敢站出来评这个理呀？尚奎是个厚道人，他不好说什么，只是讲我们要多劝劝曾希圣，宽宽他的心。所以在曾希圣受到批判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两家是在一起过的。尽管这也无法驱逐他们胸中压抑，但有几个朋友在一起，多少可以冲淡一些心头愁云。

曾希圣突然从“大红灯”、“大忙人”的峰巅上摔了下来，成了一个大闲人。他移家上海，因为他还有个“华东局第二书记”的空头衔。过去听人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以为是对旧社会而言，在社会主义社会，同志间的阶级感情高于一切，是不会发生那种现象的，至少也不会在有觉悟的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中发生。可是自从曾希圣的事情发生以后，我的天真、理想主义的彩图，便成了一堆灰烬。他得意时，人们用最美好的词汇来赞扬他，用最佳幅度的笑脸来看望他，门庭若市，似乎多跟他接近一点，身上就会沾一点瑞气。今天他失意了，便门前冷落，车马寥寥，一些

人像避瘟神一样地避开他。如果他真的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倒也罢了，可是谁都知道他是做了一件好事，立了一个殊功而“犯错误”的呀！使人不解的是，就连柯庆施这样的高级领导人，也是如此，他原来对曾圣是何等地信任呀，可以说是言听计从的。现在呢？那态度简直判若两人。把人家往那儿一放，不理不睬，不给工作，不让开会，可是，不管怎么说，老曾的华东局第二书记的职务并没有撤掉呀？

当然，好同志还是很多的，他们在和尚奎的谈话中，经常或明朗或含蓄地为曾希圣抱不平，有的还常去看他。至于尚奎和我，仍和往常一样与老曾过从密切，只要是到上海开会，或者到北京时途经上海，就一定要去看望他，或者接来饭店一聚。有一回尚奎看到曾希圣居闲太久，胸中压抑，便邀请他来南昌散散心。尚奎亲自陪他参观了工厂和农村，晚上，我们便和他在一起看看戏或者打打麻将。这回他在江西转了一个多月，跑了吉安、赣州、抚州几个地区，情绪颇好，身体也好多了。有次我随尚奎去北京开会，特地上海停留一天，为的是看曾希圣夫妇。我们到他家时，发现屋里有一台插秧机和一台播种机的模型，便问余叔是谁把它搬到这儿来的。

余叔笑道：“老曾做的呀！”他把家里的瓶瓶罐罐都种上秧苗了。”

“什么？老曾会做插秧机、播种机？”我奇怪地问。

她告诉我，老曾是个闲不住的人，不给他工作，他就自己到郊区去走走。在和农民的交谈中，觉得用人工播种插秧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速度慢，往往误了季节。他对农村本来就就很熟悉，只不过以前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罢了。于是他参考有关的机械原理，自己动手绘制图纸，然后请来木工做成模型，再来试用、修改。“老曾这一段时间可忙了。”她说，“常往乡下跑，和农民商量用机械播种插秧的

事，有时饭都顾不上吃。”

“他闲得难受呀！”我说，“让他活动活动也好。”

“就是呀！”余叔说，“我开始也烦，后来一想，这总比成天闷坐着好些。”

我俩相视一笑，我觉得她笑得颇为凄凉，而我的笑意里，想必也有许多苦涩。

两个男人却谈得很高兴。曾希圣颇为自豪地介绍自己的作品，谈机械原理，谈每个零件的作用，显得兴致勃勃。尚奎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提个问题，或者提条修改意见。这两位省委第一书记呀，简直成了两位工人老师傅了。我为他们间的真正友谊而深感欣慰。

然而，我心里却感到阵阵疼痛。研制播种插秧机，无疑是一件有益的事；曾希圣在被剥夺工作权利后，做任何有益的事都是值得赞许的。但是，让这样一位久经考验、忠心耿耿、才华横溢、屡建功绩的老干部、省委第一书记一闲数年，不得不“自谋职业，”去摆弄他根本不熟悉的机器，这说明了什么呢？我觉得有点像用迫击炮打麻雀，是浪费？是滑稽？抑或是一种悲哀？

他设计的那两台机械的命运如何，无需追究，因为直到今天，仍没有一台适于南方水田的手推插秧机得到推广使用。1965年8月，中央调他到西南大区任职，于是举家移居成都。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能见到曾希圣了。不久“文革”爆发，他没有来得及做什么，便结束了在西南的使命。实际上，从1962年他58岁开始，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四川是“文革”中打得最厉害的地方之一，曾希圣的被揪斗、被摧残是可想而知的。一个铁骨铮铮、秉性刚烈的伟丈夫，受了长时间的思想压抑，继而又受到难以忍受的迫害，不久就患了血液病，住进医院。正被“造反有理”的口号闹得天翻地覆的医院，医护人员忙着“革命”，那有几多

时间为一个“走资派”供氧、输血？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他的病情迅速恶化，1968年7月15日便带着一腔委屈、愤懑和遗憾与世长辞。身后留下了余叔和5个孩子，以及一片清凄。

这时，我还在蹲“牛棚”，直到1969年秋天，我被“解放”回南昌，看到余叔给我的一封信，才知道曾希圣已去世一年多了，顿时悲痛不已。随即含泪给余叔复信，希望她珍重身体，带好孩子，不要过于伤心。一个多月之后，我进京探望尚奎，马上给余叔拍了一个电报。当我抵达北京车站时，她已在那里等我多时了。大难不死，好友重逢，悲喜交加，我们笑一阵，哭一阵，好久好久都无法平静下来。

在中直招待所余叔的住处，我仔细打量我的友好余叔，发现她又黄又瘦，面色憔悴，容颜苍老，算一下她的年龄，40才出头呀！心里一酸，泪如泉涌。

余叔知道我在为她伤心，便马上把话题岔开：“水静，你知道吗，老杨就住在这后院呀！”接着，她详细地谈了发现老杨他们的戏剧性的经过。原来，这中直招待所所有三幢前后排列楼房，余叔住的是第一栋，中间一栋是空的，不住人，而后面一栋虽然住了人，却不让进去。她感到好生奇怪，

√ 在庐山会议期间，林佳樵、

邓颖超、蔡畅、水静、余叔合影



却又不好找谁询问。有一次，她的小儿子“小猴子”在院里到处乱钻着玩耍，无意中竟钻到后楼去了，回来告诉她，“里面有好多老头子。”她猜想可能是被总理保护起来的那些领导干部。于是叫“小猴子”进去打听一下，并要他告诉他们：“我是曾希圣的儿子。”精灵的“小猴子”很快就搞清楚了，杨尚奎、江华等人都在里面。此后，“小猴子”就成了“联络员”，他们的衣服需要缝缝补补的，由“小猴子”拿出来，她弄了些吃的东西，也由“小猴子”送进去，因为孩子小，没有人注意。

这次我虽然只在中直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便因病住院了，但仍和余叔作了几次长谈，了解了老曾去世前后的详情，老曾的后事是周恩来总理派专人料理的，并对他的家属给以照顾。我回南昌后，还是没有多少自由，但可以写信。我们俩书信不断，互相倾吐友情，交流思想，也算是苦中乐事。我工作之后，借出差机会去北京时，还在她家住了好几天，余叔和我同住在一个小房间里，经常聊到深夜，从早上一道去菜市场买菜，到晚上没事闲聊，我们都在一起骂“四人帮”那伙贼子。1974年，尚奎重新担任省委书记，我去北京的机会就多了，每次都要到她家小住几天，陪她说说话儿，为她赶赶寂寞。这时她也担任了北京市二轻局副局长，总算有了个工作。1979年秋，她写信告诉我身体不适。从她的描述看，我发现了一种不祥预感。不久我到北京，找到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得知她果然患了结肠癌。我非常难过，并立即搬到她家陪她住几天，我装着高兴的样子和她谈天，可一个人在背后却暗暗流泪，我的好友显然不久于人世了。半年之后，我们在上海重逢，还遇到王光美和她的孩子，十年动乱后，第一次见到光美，又是伤心，又是高兴，别有一种滋味，后来我又和光美的儿子源源陪余叔到苏州去玩了一趟。我们照了很多相片，回到上海，

待照片洗出来时，我吓了一跳，我和余叔竟照了这么多照片，难道是最后一次合影了吗？我好哭了一阵。果然，她一回北京，病情就恶化了，手术后便一病不起。她的孩子在电话中告诉我，说：“妈妈非常想念水静阿姨。”我决定独自去北京看望她。可是，由于心脏病发作，医生和家人都不让我走。我只好书信、电话中给她以安慰，打算自己病情稍稍好转便赴京一趟。

我终未能和情同骨肉的姐妹余叔见上最后一面。1981年6月13日，海军司令员叶飞的夫人王于同志打来电话，她声音颤抖的告诉我：“余叔逝世了。”我扶着桌子，几乎昏倒，心绞痛随即发作。我知道这一天很快会到来，而一旦成为事实又觉得是如此突然。我为没有和她见上最后一面而深感内疚，更为不能参加她的追悼会而谴责自己。

后来孩子们告诉我，余叔的追悼会开得很隆重，连薄一波同志都去了。薄一波那么大的年纪，还冒着酷暑参加了向余叔遗体告别仪式。这多少给了我一点慰藉，但也引发了我对故友的深切思念。

半年后我的心脏基本平复，便随尚奎去北京开会。我到北京的头一件事，就是让余叔的几个孩子陪我去八宝山看他们的爸爸妈妈。到了八宝山骨灰堂，我一把将余叔的骨灰盒抢在怀里，放声痛哭：啊、余叔呀，余叔！从50年代末以来，我们有多少愉快的聚会哟！我们情同手足。你虽然比我大两岁，却是那么年轻漂亮，那么富于光泽，内心又是那么真挚，热情，那么纯正善良。每次来北京，你总有说不完的话，可现在，你怎么不说话呢……我哭得泪涕交流，不能自制。

接着我又去看望曾希圣的英灵。我对着他的骨灰盒鞠躬致哀。他的相片如同生前，戴着那副我熟悉的金丝眼镜，带着我熟悉的坦诚的微笑，似乎向我点头打招呼。对于这位为人民

革命事业立过汗马功劳的英雄人物，对于这位为建设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昔日领导，我更多地是把他看作是一位老朋友，一位老大哥，而他也乐意担任这个角色。我常跟他开玩笑，他则说我在七师一定是个“调皮捣蛋的兵”。我多么希望再听到他的声音啊！在他的周围，还聚集着陈毅元帅、陈赓大将、曾山、陈正人部长等许多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风流。我和他们都非常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可现在都成了一把冷灰。我心如刀绞、肝肠寸断，一种彻骨的悲哀浸透我的心身。我突然觉得生命的短暂和人生的空幻，想到《红楼梦》的《好了歌》……

我抬头再看一眼曾希圣的遗像，似乎他收敛了笑容，变得严肃起来，这位生前从来不曾批评过我的严厉的老领导，似乎要批评我了！我蓦地从哀伤中苏醒过来，正因为生命短暂，才应该格外珍惜，才应该对人民对祖国有所作为，使人生变得充实。曾希圣就是这样，他无论干什么工作，都是热情奔放，都在革新创造，纵然遭到罢黜，而长期赋闲，也丝毫不影响这种创造的意义。他在20年前所推行的“责任田”，即今天所说的农业承包责任制，不是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即将完成吗？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人们，听过这次传达的人们，以及安徽的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他们会记忆那个被斥责为“刮单干风”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吗！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全国曾流行过这样一句话：“要吃米，找万里。”因为万里在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时，率先实行农业承包责任制，使安徽这个历史上著名的缺粮省成为最早解决粮食问题的省份之一。这是否和曾希圣一度推行责任田打下的基础有关呢？

尽管他在很长一段时间过得很不痛快，但他的生命非常充实，很有意义，以至同志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责任编辑：刘家驹）



## 画家李琦和《人小鬼大》

少丹

四集电视剧《人小鬼大》，反映抗战初期，延安的十几个10岁左右的“红小鬼”化装成流浪儿，组成“难童抗战剧团”，在19岁的女共产党员“范姐”带领下，深入到陕西关中国统区，机智勇敢地与反动派周旋斗争，进行抗日宣传的传奇故事。

这部儿童题材电视剧，以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众多成年观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更引起我兴趣的是编剧署名李琦。这个名字竟与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著名人物肖像画家李琦的姓名一字不差！难道这真是他创作的？我实在不敢相信：著名大画家怎么会屈就为儿童写电视剧呢？李教授的领袖、名人肖像画在我国画坛独树一帜。他用寥寥数笔就能简洁洗炼地勾绘出一位伟人的神情气度。如他在六十年代初画的《主席走遍全国》，在我国已家喻户晓。他近年画的《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周总理亦是群众喜爱的作品。李教授还创作有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鲁迅、刘少奇、白求恩、雷锋等一系列领袖、名人肖像画。听说李教授还有一种超绝的艺术功力，就是能默画人像。

1988年，日本前首相竹下登于中日友好条约签订10周年之际访华，李教授被安排与其一面之见后，回到家里凭着印象默画出了一幅竹下登肖像，首相本人大为称道，说：“这是我至今所得到的所有画像中最能表达我内在气质的一幅画。”同年，世界石油大王艺术品收藏家哈默博士来京举办其90寿宴。李教授也是事先被安排见面后面画肖像赠寿星。席间该画像受到杨尚昆主席和哈默本人的赞许。

《人小鬼大》这部电视剧是不是大画家李琦所写，我总想追个究竟。

一天下午，李琦教授在北京王府井一条胡同的新居里，接待了我这个不速之客，我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李教授点了点头，作了肯定地回答说：“是我写的。”并说剧本发表在《中外电影》刊物上，是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推荐给了陕西电视台，陕西省委拨了10万元拍成了这部电视剧。

我大惑不解，提出一个新问题：“像您这样的大教授、大画家怎么会愿意为儿童创作电视剧呢？这并不是您的本行？”

魏哉炎黄二帝望像賢

魏哉炎黄澤潤八荒

子孫昌盛聖德彌高

李琦、李天、李吉

琦这样的革命干部子女。在地下党的秘密领导下，他们装扮成流浪儿，组成“流亡孩子抗战剧团”。由一位19岁的女共产党员樊镜秋任剧团团长，（这位同志现名林枫，年逾古稀，曾任河北省妇联主任，现在天津）带领大家为国统区宣传抗日。电视剧中的团长范旭就是以樊镜秋为原型写成的。流亡孩子抗战剧团在陕西渭南演出中，国民党师部政训处多次把樊镜秋找去盘查这个剧团的来历底细。每次去，樊团长总是带着李琦。有一次，政训处长把小团长追问得快哭了，李琦便装肚子痛，哭喊着借故拉着樊团长离开了狼穴。当反动派要采取行动强行扣押剧团时，原张学良的东北军的爱国官兵，冒险把孩子们用军车送上了去西安的火车，使他们得以脱险回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中共驻陕代表的林伯渠同志，在欢迎这批红小鬼凯旋的会上说：“陕北老乡形容一个娃娃能干，有句话叫做‘人小鬼大’，腰里别了个斧把。我说你们是人小志气大，为了干革命，啥也不害怕！”

最后，李琦教授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大家认为这部电视剧真切感人的话，那就再一次证明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的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结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李教授说：“我国有三亿少年儿童，为他们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中央关于加强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的指示，对下一代来说是更迫切的课题。我已经老了，但还想为社会主义事业多发挥一点余热。不管画家不画家，只要对人民有益的事，我力所能及的，就去做。《人小鬼大》这部电视剧所写的“红小鬼”的故事，是我亲身经历的生活，我把它写成电视剧，贡献给今天的孩子们，作为对过去一段革命生活的追忆和纪念。”接着，他向我讲述了这部电视剧创作的生活原型。

原来李教授当年也是一个“红小鬼”。1937年他随父母到了延安，9岁就参加革命，成为“抗战剧团”的小演员。那年冬天，他离别父母，随剧团开赴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宣传演出。当他返回延安时，父母已调往前方。这样，他与父母一别就是9年，待重逢时，他已是18岁的文艺战士，父母都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了。《人小鬼大》写的就是他的这段生活经历。

“抗战剧团”中青年演员与儿童演员各半。当时虽是国共合作时期可在国统区宣传演出，但常遭到反动派的刁难。迫于形势，剧团的青年演员只得撤回延安，留下24名儿童演员。这些孩子有的是陕北的放羊娃，有的是长征路上跟来的孤儿，再有就是李

### 哪些书

### 代表中国文化

文学：《诗经》、《楚辞》、《李白诗集》、《杜工部诗集》、《白香山诗集》、《韩昌黎文集》、《宋元戏曲史》、《水浒传》、《红楼梦》、《鲁迅杂感选集》。

史学：《左传》、《史记》、《史通》、《徐霞客游记》、《廿二史札记》、《帝王春秋》。

哲学：《论语》、《墨子》、《孙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论衡》、《金刚经》、《化书》、《李氏焚书》、《太平天国文选》、《五四运动文选》、《清代学术概论》、《孙中山选集》。

科学：《梦溪笔谈》、《农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



# 中华英烈彭干臣

## 萧克题

在八一南昌起义65周年之际，本刊郑重地向读者揭示一件长期湮没的重大史实：八一起义时的南昌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是北伐战将、共产党人彭干臣。中共中央和军队有关方面本着实事求是方针澄清和公布了这一几十年来的历史史实。本刊除独家披露此事始末，特发表邓颖超同志给彭干臣遗属的亲笔信，使读者了解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如何不忘故人和关心爱护革命后代，藉此寄托我们对她的思念。本文及有关资料再次表明：凡是对国家和人民事业作出过贡献的英雄志士，历史终究不会湮没他！



△ 彭干臣烈士

他，二十年代曾因反对曹锟贿选，上了北洋军阀政府通缉逮捕的黑名单；他，曾因讨伐陈炯明作战勇敢，由连长提升为团长；他，与朱德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窗学友；北伐时，他出任叶挺的参谋长，南昌起义，他被任命为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后来，他又相继出任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军的参谋长，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彭杨军校校长等重要职务。假如他活到今天，在我军将帅的星群里，他或许是其中璀璨夺目的一颗；或许作为一代元勋，参与筹划祖国建设大计，为我们的民族建树更大的业

绩。然而，这颗星毕竟过早地陨落了。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他和他的辉煌的历史被湮没了。南昌起义的将领名单里，他未被提及；记述党史军史的人物传中，他也未列其中。雄伟壮观的南昌起义纪念馆，这位当年的南昌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连一张图片也没有。这不能不是党史军史上的一件憾事。

然而，纸写的史书遗忘了他的名字，真实的历史却永远铭刻着他的辉煌业绩。他叫彭干臣，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位卓越的战将。

说到南昌起义，许多年来，不管报刊、影视还是一些传记读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朱德同志是南昌起义时的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这似乎已是定论，没有人敢对这一重大历史事实发生怀疑。因为人们相信，这种职务在当时非朱德莫属，不可能在这位一代元勋的身上发生史实的错误。然而，生活中本不该发生的事却偏偏发生了，南昌起义半个世纪后的1984年，一个令史学界为之震动的疑案提出来了：南昌起义的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不是朱德，而是此前在叶挺手下任武昌卫戍部队参谋长的彭干臣。

提问的不是别人，是彭干臣的遗属彭伟光。此时，他在上海旅游局工作，已年过半百。说来也很简单，1981年7月30日北京晚报一则访问老红军唐天际的专访，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文中有一句很重要且为一般读者所不注意的话，“南昌起义时担任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的彭干臣”云云。不是说担任此职的是朱老总吗？怎么成了自己的生身父亲呢？他想起20多年前的—件往事。那是1956年夏天，他刚刚20来岁，他从上海到了北京。大将陈赓欣喜万分地接待了他，并将他亲自送到中南海紫光阁去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周恩来、邓颖超把这位年青的小伙子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邓颖超含着眼泪说：“好了，我们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年你可把我们憋坏了！”周恩来说：“是的，这是彭干臣的儿子，这眼神，这面孔，无一处不像。”他们像招待贵宾一样招待了这个年青人，陪他在中南海划船，请他吃北京烤鸭，后来又送他去读书。那天，邓颖超满怀深情地对彭伟光说：“孩子，你爸爸在上海与我们一起做秘密工作，他是一个机智乐观，干事不顾一切艰难的人。对于他的牺牲，我们是很悲痛

的。今天见到你，我和我的周伯伯非常高兴。这样，对我们失去的战友彭干臣烈士有所交待了。”然而，当彭伟光向他们了解关于父亲的一些经历时，周恩来沉默了片刻，然后用商量的口吻说：“孩子，关于你父亲的经历，咱们以后不再谈及好吗？”

是为彭干臣牺牲而悲伤？还是因为彭干臣与他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而不愿多说？抑或是为战友的牺牲觉得对不起孩子？彭伟光没有作更多的猜想，他按照周恩来的话，从此再也没有提过父亲。1957年10月1日举行国庆观礼，周恩来带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主席。周恩来对毛主席说：“这就是彭干臣同志的儿子。”毛泽东听到“啊”了一声，一手拉着彭伟光

的手，一手摸着他的头说：“好，好啊！”他觉得毛主席有话要对他说，因为有很多国家的外宾在场，仅仅只能匆匆一见。

许多年来，尽管他记着总理的嘱咐，但急于对父亲经历有所了解的心情，却越发强烈起来，北京晚报的文章，引发了他极大的热情。他突然想到给父亲的老朋友，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写信，想通过他了解有关线索。这位80多岁的老人激动地连写几封回信，提供了有关彭干臣的许多重要情况。其中有一封信说道：“像你父亲这样杰出的革命家，竟被弄得无闻于世，这叫作愚昧，你作为烈士后代，应该尽一切努力，把他光辉的历史弄得清楚明白，以激励后之来者，这并

培德的旧同事关系，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官教育团团长、南昌公安局长、卫戍司令。同年春夏，蒋介石阴谋发动政变之前，朱培德的反共面目也日益暴露。4月10日，朱德便离开了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的岗位，6月上旬，他正式辞去这个职务，6月下旬便被反动派“礼送”出境，失去了在国民党江西当局的一切职务。八一起义时，作为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朱德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副军长，与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起义之前的7月27日，武汉卫戍部队的参谋长彭干臣与周恩来几乎同时到了南昌。作为起义的组织者，周恩来等领导人非常明白：一旦起义爆发，维护社会治安、镇压反革命、保卫前敌委员会等任务异常艰巨，直接影响起义的成败。鉴于彭干臣有担任武汉卫戍部队参谋长的经历，周恩来在7月27日的前敌委员会上，提议任命彭干臣为南昌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对外正式公布的命令是8月2日。

彭干臣不负众望，在起义当天，他组织张贴布告，安定民心，要求所有学校照常上课，所有商店照常营业，严厉打击敌对残余分子，这有效地保障了起义的顺利举行。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前敌委员会组建第15军，任命刘伯承为军长，彭干臣为一师师长。作为南昌起义的重要成员，彭干臣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作为南昌起义的指挥员之一，彭干臣为何又为历史所遗忘呢？彭伟光经过严谨认真地研究取证，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彭干臣曾几易其名，先后曾用彭干成、何榭、黄大老板等等。在一个时期，他的化名比真名还更有知名度。以至人们对其缺乏系统的了解。二是自从南昌起义后，彭干臣便开始使用各种化名进行工作，以至国民党的报刊及解放后我们的报刊先后两次说到他的死，一次说他在南昌起义途中牺牲，一次说他在赣东北被我军内部当

彭干臣之子——伟光

伟光从小就对学校历史和革命历史感兴趣，特别是从书上学到的。前些年在江西，他到南昌做调查，做了好多信，交给了他父亲。但父亲的内心却常常感到不安，所以又很谨慎地，总是叮嘱他不要把这一切写出来。后来他到南昌，他也就知道了父亲了。他也就知道了。

后来他就知道了父亲了，他也就知道了。那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那时候他父亲就转战各地，那时候他父亲就转战各地。

伟光之子。目前仍住在南昌。

伟光之子。目前在南昌。他父亲的经历，他没有回去。他父亲的经历，他没有回去。他父亲的经历，他没有回去。

邓颖超 1956.12.26

#### △ 邓颖超给彭伟光的信

非是你家的私事，而是党和国家的光荣事业。”他还说，“我们共产党人连自己的历史都说不清，将来大陆与台湾统一了，国民党会耻笑我们的！”这些话，给了彭伟光极大的鼓舞，他先后走访了数十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查阅了党史军史上的重要案卷，终于以铁的事实说明，彭干臣是南昌起义时的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并且将这个结论在人民日报上作了披露。遗憾的是，这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关

注，他费尽千辛万苦的调查结果，不过给史学界留下一个有争议的谜案：南昌起义时的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到底是谁。

南昌起义时的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彭干臣被误为朱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在南昌起义之前，朱德同志确实担任过这个职务。1927年2月，朱德受中国共产党组织委派，利用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国民党的江西省政府主席朱



△ 邓颖超和彭伟光合影

AB团分子活埋了。然而，后来大量的材料证明，这两次都是历史的谬传。彭干臣真正的牺牲是在1935年赣东北红军北上抗日的作战中。三是与周恩来密切相关。彭干臣生前的重大贡献，讨伐陈炯明、北伐作战、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几乎无不是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他是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而周恩来生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历史将由后人写，我在世期间，不准备写也不打算谈任何有关自己的东西。如果周恩来对彭干臣的经历作个详细的说明，或许历史不会发生后来的误传。然而，周恩来的严于律己，却使自己的战友湮没60年之久。

那么，周恩来与彭干臣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呢？这得从20年代说

起。

早在1924年春天，黄埔军校迎来了一批安徽学生，其中一个精明能干、个头有1米76的青年最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所欣赏。他叫彭干臣。在此之前，周恩来就知道他是安徽第一师范的学生领袖，曾参与组织过著名的六·二学潮；为声援“二·七”大罢工和反对曹锟贿选总统，他又在安徽组织了几次大学潮。陈独秀在一师建团时，他已担任了一师的党支部书记。对这样一位优秀青年的入学，周恩来自然十分高兴。次年，彭干臣已经成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主要成员。受周恩来的委派，他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与陈赓在同一个连队分别担任连长和党代表。彭干臣因为英勇善战，连连晋级，后来升为团

长。周恩来十分喜欢这个精于指挥、勇敢无畏且具儒将风度的青年。1925年6月，便向中央建议派他去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与朱德、刘鼎、张际春、曾涌泉、涂作潮等皆为同学，每当苏联教官授课时，他和朱德同作军事示范。1926年秋，又是周恩来传达中央的命令，让他回国参与指挥北伐作战，且分配在叶挺部工作。攻打汀泗桥、贺胜桥，他战功赫赫，攻打武昌城，他建议叶挺组织共产党员为敢死队，他带头冲锋陷阵，立下大功。攻克武汉后，叶挺独立团扩编为二十四师，叶挺为武汉卫戍司令，彭干臣升任参谋长。这么一位优秀的将才，更引起了周恩来的倍加重视，1927年3月，周恩来再次委派他化名潜往上海，参加周恩来领导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因为彭干臣对上海熟悉，他留学苏联之前，曾在上海吴淞机车厂创办工人夜校，建立了党组织，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望。起义胜利之后，“四·一二”事变发生，彭干臣亲自护送周恩来离开上海，到了武汉。恰在这年6月，夏斗寅叛乱，叶挺带兵征讨，彭干臣便代理武汉卫戍司令。相隔仅仅一个月，他又与周恩来一起来到南昌，策划组织南昌起义。彭干臣被任命为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的第一任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事及党的历史上，自然意义不同寻常。

1928年，时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彭干臣受中央委派，赴上海协助军委书记周恩来工作。同年，上海著名大律师蒋义女江鲜云介绍给彭干臣成婚。1929年夏天，中央在上海举办由周恩来领导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彭干臣以“蜂蜜经理处经理”身份，和妻子一起负责训练班的大量具体事务。外人不知他是彭干臣，只知道他是一表人才的“黄大老板。”在这里听课的人中，有著名共产党人许光达、王首道、伍云甫、黄火青和蔡申熙等，教员有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在白

# 幹臣烈士精神永垂不朽

魏文伯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八日



色旗帜下，彭干臣夫妇负责学员的接送、住宿、膳食、上课及安全，在一年中就举办了三期，培训了党的高级人才，没有发生任何差错。周恩来称赞他是“出色的将才经理。”1930年5月，彭干臣又携妻子赴奉天任满州军委书记，组织东北的军事斗争，同年12月，又赴天津任顺直省军委书记。1931年又重回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2年，彭干臣受周恩来的委派，去浙赣根据地任赣东北红军的参谋长、彭杨军校校长。1935年初，彭干臣协同方志敏率红十军团三万多红军北上，牵动大量敌军，使长征途中的红军主力免遭更多敌军的堵截围追。但是，红十军团毕竟是在敌人心脏行动，部队虽然作战顽强，但最终赣东北还是陷入敌人重围，全军覆没。倍受周恩来器重的一代骁将彭干臣英勇地牺牲在对敌作战的战场上。

时年仅36岁。

这支英勇部队的覆没，成为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大损失。但掩护了中央红军转移。自然，也为人们更详细地了解彭干臣造成了更大的困难。彭伟光了解到的材料，多数是从在世的老革命家口中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有关上海军政干部训练班的情况，被党史界及周恩来传记组的同志认为有很高的价值。

彭伟光的四处奔波，彭干臣的被历史湮没，引起了与彭干臣共过事的老革命家极大关注。1985年，彭干臣的战友刘鼎亲自写信给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申述了有关彭干臣的详细信息，要求中央对这个重大历史疑案作出调查。胡耀邦很快对这封信作了批复，指示中组部干审局办理。中央组织部干审局在经过大量调查取证后，确认彭干臣是1935年赣东北作战中英勇牺牲的，不是被我们冤杀

的。并对彭干臣的身世作了甄别。然而，这个批示的结果只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魏文伯、刘鼎”署名的《革命先烈彭干臣》的文章，就再也不曾提起。

1991年7月16日，对彭干臣有较多了解的中顾委委员李强亲自写信给国家主席杨尚昆，对恢复彭干臣的名誉提出了具体而详细的意见(原信另发)。

杨尚昆主席看了李强的这封信，立即批转中央党史研究室落实。中央党史研究室完全同意李强的意见，决定在有关党史、军史人物志中，补进《彭干臣》条目；在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中，增补有关彭干臣事迹展览的内容。从此，彭干臣这位被历史湮没的英杰，得以重见天日；一颗陨落的星又重新放出它灿烂夺目的光彩。

(责任编辑 卢弘)

尚昆同志：

你好！

大革命时期，彭干臣同志在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曾参加过黄埔学生军东征、北伐、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等重大军事活动，是我党我军早期杰出的军事活动家。由于彭干臣同志工作变动频繁，不断变换姓名，经常处于秘密工作状态，单线垂直联系，最后协同方志敏同志率领赣东北红军突围，全军覆没，所以，他的英名和业迹鲜为人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恢复了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彭干臣烈士的后嗣、在上海锦江集团工作的彭伟光同志在中央和上海党史工作者的指导下，及许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关怀下，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将其父历史查清。《人民日报》、《中共党史人物》(32卷)、《上海英烈》(5期)先后对彭干臣烈士做了客观介绍。最近南京军区司令部编研室向总政干部部上报，拟将《彭干臣》条目补进《中国军事大百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物志》；八一起义纪念馆拟增补

八一南昌起义时的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彭干臣展览内容；上海党史研究室拟拍摄中华英烈彭干臣电视纪实片。这些都需要得到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确认和批示，才能够进行。

我作为彭干臣同志的战友，出于对党史和军史的责任感，特将此事向你报告。望你在百忙中能予以关怀和过问。

此致

敬礼！

李强

· 冯 都 ·

## 毛泽民当行长



严格要求各级政府和地方武装，将所得的现金完全汇交国库，持金银币者必须兑换成苏维埃货币才能流通，他们制定《现金出口条例》，以控制金银币外流。此外毛泽民还主张苏维埃国家银行实行低息贷款，发展信用合作社和贫民借贷所，由群众自己集资，自己管理，千方百计扶助农、工、商业的发展。

在就任国家银行行长期间，毛泽民十分注意利用中央苏区的自然资源，发展生产，开展对外贸易，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经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他在赣南会昌县铁山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钨砂总公司”，并亲自兼任经理。这一行动，遭到“左”倾分子的指责，他们反对办钨矿，主张大量印纸币、印公债，日夜开动印刷机来解决财政金融的需求，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对毛泽民说：“你在上海当过印刷厂厂长，你现在不印钞票，而去挖钨矿，不务正业。”毛泽民感到压力很大，便去向大哥怎么办？大哥告诉他：“发纸币、发公债券，银行变成纸行了。我看还是要靠金山、银山，才有靠山嘛。”在大哥的支持下，毛泽民坚持开钨矿，到1934年公司已拥有三个矿场，约5000职工，产值200多万银元。赣南钨砂大量卖给广东、香港，为苏区换进了大批急需的食盐、布匹、药品、紫

那里捡来了一本字迹模糊的《经济学》，这本书使他受益匪浅，学到了不少金融理论，之后，他结合实际，制订了一套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和审计制度，并着手进行了各职能机构的组建，人员也逐渐增至50人，分设二处七科，即业务处、总务处和国库科、会计科、总务科、发行科、营业科、出纳科、保卫科等。在体制上总行下辖二个省分行、一个瑞金直属支行和四个兑换处，五个金银收买处，还在各县苏维埃政府和各军经理机关设立了几十个代兑处，初步形成了独立完整的金融体系。

马克思曾说：“对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毛泽民是深深懂得这一点的，他大力组织存款，将没收、税收、捐款、罚款，盈利等款项聚集到金库，办理机关、企业、红军部队和个人的储蓄。他在给全总执行局刘少奇委员长的信中说：储蓄“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将所节约的零钱存入银行，使得聚少成多，化零为整。”他还注意加强现金（即银元）管理，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毛泽东任命大弟毛泽民为第一任行长。行址选择在瑞金叶坪村的一幢小楼房里。国家银行成立之初只有5人，除行长毛泽民外，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调来的会计曹菊如以及记帐、出纳、杂务各1人。工作人员少，条件艰苦，自不用说，全部家当仅是缴获来又不多的银器、银元。毛泽民为此满面愁容。

毛泽东看出了大弟的心思，就笑着说：“润莲呀！你当我们苏区几百万大军的家，柴米油盐酱醋茶，枪炮弹药按标叉，担子不轻哩！”毛泽民不高兴了：“大哥，就这点家当办银行，叫我怎么搞法？”毛泽东告诉他，创业艰难还要统一财政，统一货币，按照市场需要，你可发行纸币嘛，同时吸收群众存款，事情总是从无到有嘛！”

毛泽民受到启发，他深入红军各部队，从缴获的战利品中，收集有关经济方面的书籍及各种帐册、表格加以研究，并给银行工作人员办培训班，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毛泽民从老表

油、火柴、电池、工业品和军用物资，繁荣了苏区经济，缓和了军民供给。与此同时，银行对苏区32个国营工矿企业进行重点贷款，以发展生产，并扶植浩如烟海的手工业，为支援前线的军事斗争，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仅仅三年，中央苏区就出现了一派可喜的局面。中央政府项英副主席称赞说：“苏区财政金融的统一，是毛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 二

建立国家银行必须拥有自己的货币，可有人觉得这项工作太艰巨了，说：“毛行长，我们自己制造货币的条件还不成熟，市面上不是已有现成的货币吗？先将就几年再说！”毛泽民笑了，他有自己的想法：“是的，但那是缴获敌人的钞票，印刷机在他们那边，刀把子攥在人家手里呀！我们有了人民政权，就应该有人民自己的货币，万事开头难嘛，怕什么，将来连天下都是人民的。”于是毛泽民先后起草了《统一苏区货币及其办法》和《发行纸币、铸造辅币的报告》，上报中央后很快得到批准。

要印制统一的苏区纸币，需要造纸原料，毛泽民亲自挑着箩筐，走家串户收破布、烂棉絮和烂麻袋，发动二线职工上山砍毛竹、剥树皮，然后用铁锤、石碓捣成浆，在酸碱水中浸上七天七夜，用土法造出了白细质韧造纸用纸。接着就是设计纸币。毛泽民听说有个会搞图案的人，名叫华广，已被打成“AB团”分子，就要枪毙，毛泽民赶紧骑马把他借用过来，经过考试，决定让华广设计。起初华广提出要在纸币上画中央政府主席毛泽民的像，毛泽民说：“我大哥不会同意，应该画列宁的像。”接着毛泽民开始筹划印票子的油墨和机器，他委托白区商人程虔生先生赴上海购买，程出发前与毛泽民签约，立字为据，程是天主教徒，对天主发誓说：“言者必行，永不反悔。”到了1932年7月7日，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

行”字样的纸币终于出来了，有壹元、伍角、贰角、壹角、伍分等五种，毛泽民正式批准发行后，苏区群众看到市面上流通着自己的票子异常兴奋。接着毛泽民要造金属硬币，于是在瑞金杨溪的祠堂门口，挂起一块“中央造币厂”牌子。毛泽民请曾留学日本的中央政府办公厅文书黄亚光设计、绘制了几种图案，经过临时中央政府挑选，决定采用两个图案：一个是正面中间写有“壹圆”，上方摆着扇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字样，下方有“一九三一年”时间，背面是镰刀斧头的银元图案；另一个是正面中间写有“贰角”字样，上下方的字与银元一样，背面是谷麦穗的圆形银毫子图案。两种图案确定后，毛泽民带领职工一面挥舞着凿子、榔头、锉刀、刻出了铜模，一面用一百多斤重的花岗岩条石作天碓，压成银元坯子。不几天，第一批银元试制成功了，可以批量生产了。土法铸币的速度缓慢，满足不了市场流通的需要，大家束手无策，毛泽民也处在焦急之中。这时，前方传来一个好消息，红军于1932年10月中旬攻克闽西诸县时，在上杭敌军钟绍奎老巢缴获一台铸造银毫子的新式铸币机，其中包括铝板机、绞皮机、滚边机、冲床和钢模。毛泽民为有这套“真家伙”高兴得忘记了吃饭、睡觉。他动员大家不分昼夜的拆\*洗、安装，改造。而且采用三班作业，这样一天可铸银元和银毫子一万左右，造币厂职工也由几十人增至170人。1933年8月中旬，红军东征入闽解放沙县时，又缴获了一台铸币机，毛泽民更为高兴，他主张用这台机器专门仿铸白区银元，流通到白区去购买物资和对外贸易，如铸造大清银元、光绪元宝、大头洋（指币面有袁世凯像）、小头洋（指币面有孙中山像）、拐杖（指币面有洋人拿着拐杖的全身像）。这样造币厂的两台铸币机同时使用，每天就能生产银元16000多块了。大家高兴得欢欣雀跃，许多人情不自禁地

唱着山歌“哎呀哩！造币机一声响，哗啦哗啦流光洋；冲破敌军封锁线，活活气死委员长。”

## 三

毛泽民对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金融业绩感情至深，十分珍惜，从不铺张浪费，以身作则抵制腐败。他常对银行职工说：“中央苏区现存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要严格地管理好。”有一次省委领导下到黎川县，县委书记方志纯请每个领导同志吃了一碗米粉肉，报帐时，毛泽民执意不答应，他对方志纯说：“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率先艰苦奋斗。要从你的伙食费里扣除这笔请客的钱。”又有一次闽赣省委开会至深夜，省苏维埃主席邵式平开玩笑地说：“泽民同志，开开恩搞点东西吃吧！”毛泽民笑着说：“不行啊，邵大哥！财务上没有这笔开支，你就让肚子唱唱空城计吧！”

毛泽东来访和视察，也从不用公费请客，只用平常群众的伙食标准相待，有时仅是一杯开水。有的同志看不过去，提他的意见，认为招待一下同志加兄弟也无非议，更何况毛泽东还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呢？而毛泽民却笑呵呵地说：“革命友情比兄弟情份更为重要，手足之情也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他带头每月只领取二、三毛钱伙食尾子和津贴费，每天还节约二两米。

毛泽民在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期间，经常深入基层，携带的行李总是一双草鞋，一顶斗笠，背上的小被子还包着衣服、笔墨、帐簿和算盘，当时有的群众笑着说：“毛行长的办公室打在背包里。”他作风踏实，每到一地就先检查该地区的财政金融工作，仔细询问收入、支出、储存情况。他常与同志们拉家常说：“以前我在家里是管家的，现在到了革命大家庭里，还是管家的，无论是持家，还是为国理财，都要勤俭办一切事业。”

（责任编辑：张 君）



# 十年厄运 十年辉煌

邓小平授予军事医学科学家黄翠芬“模范科学工作者”称号

龚红梅 龚孝鹏

1984年4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发布命令，授予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医学微生物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黄翠芬“模范科学工作者”称号。《光明日报》发表了《“视名利淡如水，看事业重如山”》的评论文章，高度赞扬了黄翠芬同志取得的科技成果和感人至深的思想品德。1981年至1991年这10年，是黄翠芬由60岁进入70岁的老年阶段，也是她的事业取得大丰收的季节。

八十年代以来，她在遗传工程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主要有：1984年“工程菌产乙肝核心抗原的研究与开发”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6年“预防仔猪黄痢、白痢遗传工程活菌苗”的研究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年“354”装置的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1年国家“七五”重点攻关项目“预防幼畜腹泻工程菌双价活疫苗”的研究，获重大科技成果荣誉证书等。这些项目她都是主持人。

收获与耕耘是遂行的。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的人，国家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给他以奖赏的。在这10年

中，黄翠芬不但获得军委授予的“模范科学工作者”的荣誉称号，而且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的称号，还被解放军总后勤部树立为“双文明建设”标兵和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87年她作为英模代表，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1990年国务院给她颁发了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荣誉代表着成就。但黄翠芬何以在过了花甲之年后，在科研攻关的阵地上，能一个接一个地发起冲锋，摘取一顶顶辉煌的桂冠呢？

黄翠芬八十年代的美国之行。将为我们揭示这一秘密。

## 她难道忘了心上的“伤痕”？

蓝天，白云，气流，阳光。空中的世界是这样的绚丽多彩，而又飘忽难测。那无尽的空间，把几块大陆隔得那么远，却又连得这么近，才几个小时呀……

啊，美国！离别31年后，又踏上了你的身边。你还是那么美丽，那么宜人吗？

随着上下晃动的机身，她的思绪

像机翼旁那悠悠的白云，又飘回那遥远的年代。

黄翠芬是移居美国的华侨后裔，家里有许多人定居美国。她于1949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在波士顿一家医院工作。她的爱人周廷冲，在一位国际著名的生物化学教授手下从事生化的实验研究。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应该说是十分优越和富足的。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震撼着祖国大地，也强烈地呼唤着海外赤子的心。周廷冲和黄翠芬商定：回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服务！

当他们把这个打算提出后，几乎遭到了所有亲属的反对，劝他们放弃这危险的打算，中国可没有这样的条件供他们搞科研。这对年轻夫妇毫不动摇，迅速向移民局提出了回国的要求。并收拾了家当，筹足了路费，用余款还买了部分仪器设备，准备带回祖国。移民局先是要走了两千美元的税款，然后，又借口不能回中国拒绝签证。黄翠芬想到自己有个舅舅在香港，便来到英国驻旧金山领事馆交

涉，谁知美国移民局已给英国领事馆打了招呼，领事馆不理睬他们的申请。

事情已到这种地步，他们暗暗下决心，就是偷渡，也要回到祖国。

一天，黄翠芬打听到有一艘货船要去中国，便喜出望外地前去交涉。船主望着这位黄皮肤的中国人说，货船是不能带人的。随即又狡黠地小声说：要走也可以，先交一千美元吧！天哪，这是普通船票的三倍！没办法，黄翠芬只好认了。临上船前，船主又说：你们是非法离境，一旦被官方查出来，将终生流放在荒岛上，到时可别后悔呀！

为了不被查出，黄翠芬两口只好蜷缩在密不透风的舱底，担惊受怕，忍饥挨饿，还要忍受那令人难耐的晕船呕吐和海浪的袭击，燃油的熏烤。就这样，整整在海上飘泊了56天，他们不知道到达过多少国家的港口，只有晚上才能到甲板上透透风，这是充满恐怖的56天！两个人憔悴得几乎变了形。1950年4月的一天，当他们在天津大沽口登上祖国的大地时，激动得再也难以自制，热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

啊，美国！美国！黄翟芬心里一阵隐隐的悸动。

曾几何时，在国内你是个多么可怕的名词啊！他们一家人因为和“美国”沾边，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从肉体到精神上，遭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啊！先是批斗，后是抄家，接着是被赶出北京。他们已是伟大长城的一员，神圣的军人也解脱不了这场厄运。周廷冲教授被赶到宁夏荒无人烟的贺兰山去放羊。低矮的“干打垒”房间里，盘着一个小小的土炕，上面铺着一块脏臭的羊皮。白天，他身披羊皮、手握羊鞭，游荡在草滩山岭，寒风吹裂了他的皮肤——这就是他的形象，一个颇有造诣的研究员的形象。

他们的四个孩子，两个下放到贺兰山去劳动，一个到河南农村去插

队，另一个年龄太小，留在北京投亲靠友。而黄翠芬本人则被下放豫西灵宝的一个山沟里去“抓革命，促生产”，一“抓”就是十年！他一家人被搞得七零八散，她一颗心被割得四分五裂。3650个日日夜夜，她写不完的信，鼓励丈夫，安抚子女：我们要相信党的领导，相信广大革命群众，总有一天我们一家会团聚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呀，美国！

“美国”，成为她厄运的代名词。

在悲愤交加中，她也曾恨过：美国，美国，你害得我一家好苦啊！

她刚平反不久，还未来得及回顾一下往事的时候；当他一家人刚从四面八方落实政策团聚北京、还没有来得及安置妥当的时候，她又迫不及待地向曾给她带来不幸和厄运的美国飞去，为什么，为什么呀？

难道你忘了身上的疼，心上的伤？

“不，我没有忘记，我是为了祖国，为了事业，我必须去！”

事业？祖国？她出国护照上不是明明写着出国探亲嘛？！

## 以探亲的名义

飞机掠过华盛顿上空，徐徐向市郊的机场飘落。从机上鸟瞰市容，街道仍是当年那样整齐划一，从东向西是22条大街，从南向北也是22条大街；高楼林立，绿草如茵，雕塑，纪念碑，国会大厦雄踞市中；波托马克河和阿纳斯科希亚河像两条蓝色的绸带……。

飞机在停机坪停住了。

黄翠芬和前来接她的姐姐黄翠薇在机场相会了。

比她大两岁的姐姐，眼里含着泪花瞅着已呈老态的妹妹。31年前回国时，她还是青春年华，现在一晃就是花甲之年了。

黄翠芬更是感激姐姐，她这次来美的费用大都是姐姐资助的。

到了姐姐家，黄翠芬把自己的打

算从头到尾向姐姐学说了一遍。

……当黄翠芬一家人陆续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解脱出来，重新团聚后，她没时间去找人诉说这十几年的委屈，也没有精力去追究那些给她一家人以磨难的造反英雄，她唯一的紧迫感是，快把科研抓起来，为四化做贡献！

领导上理解她的心情，把组建我军第一个分子遗传学研究室的任务交给了她。

黄翠芬虽年近花甲，却有着小伙子般的劲头。她把抽调的一班人马召集起来，作了一个动员，既含有沉痛，也不乏激情：

“同志们！看看我们国家被破坏成这个样子，看看科技战线的落后局面，谁能不心痛！谁能不心急！我们中国人并不笨！我们要向现代化靠拢，把分子遗传学研究抓起来，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同志们，咱们一起干吧，我这把老骨头算是豁出去了！”

他们把被幼儿园弃之不用的、大跃进时建的一座破楼房打扫了一下，便在里面摆开了摊子。

搞科研，条件简陋黄翠芬倒不在乎，自己创嘛！唯使她不能忍受的是信息的闭塞。

分子遗传学是近期才在世界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学科，它有许多情况是我们这些刚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的科学工作者所不熟悉的。作为开展这项研究的第一步，是应该走出去熟悉情况，了解信息。

在这项研究中走在前面的，是曾使她倒过霉的美国，能去吗？她一咬牙：去！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可是，按惯例，要申请到人家那里去学习，自己首先要有这方面的成果才行，而我们呢……她感到惭愧。

而且国家百废待兴，出国的名额有限……

心里忽然一亮：自己在美国不是有许多姐妹、亲友吗。



以个人名义出国探亲，去完成考察学习！

在华盛顿的姐姐听说她要来探亲，高兴地提出：愿资助旅费。

她又给周廷冲当年在美国的一位老朋友、美国科学院院士斯达曼夫人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愿望，求她帮助给联系一个学习的单位。

热情的斯达曼夫人经过一番奔波斡旋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肿瘤研究所分子遗传研究室同意她去考察学习。于是，黄翠芬才有了这次美国之行。

听了妹妹的一番苦衷，姐姐说：

“翠芬，那个‘文化大革命’，给你们全家造成了那么多痛苦和磨难，我们在外国一直替你们捏着一把汗。现在你们一家刚团聚，你又为公家的事这么奔波，值得吗？”

黄翠芬笑笑说：“姐姐，我们都是中华子孙，在我遭受磨难时，祖国也在遭受磨难。为祖国我决不计较个人的恩怨。31年前我从美国回国时是这样想的，如今我这个信念更坚强了！”

姐姐擦着热泪直点头。她深深被妹妹懂大义、不挟私的品德感动了。

## 不合拍的时间表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是一个具有世界一流设备和研究人员的科研机构。这里集中了许多医学科学界的名流，拿出了不少尖端的成果，真可谓人才荟萃，果实累累。它在分子遗传方面的研究，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世人瞩目的科学殿堂。

分子遗传研究室主任哥达斯曼教授，是一位讲求效率、热情好客的人。他以科学家特有的眼力，看出黄翠芬是位事业心很强的人，给了这位中国女学者以热忱的欢迎和工作上的方便。

这里每周只工作五天，每天上班不足七个小时。对黄翠芬来讲，感到太“浪费”了。

研究室是每天9点上班，她不到7点就从家里出发，8点钟进实验室，清仪器，找资料，查菌种，作记录……12点钟，是吃饭的时间，她不去餐厅，那里花费太大，只是在院子里找一块草地坐下来，喘喘气，掏出从家里带来的食品袋，取出两片面包、香肠、一个水果填进肚子。

不到一点钟，她又第一个走进实验室，直到七点钟才匆匆离开，还要跑步奔向汽车站。在这里，坐不上公共汽车可要吃苦头，三四十里路不说，要是夜间碰到抢劫、绑架之类的事，可就倒大霉了。

一天，研究室主任哥达斯曼早早告诉她：“教授，你太紧张了，礼拜六礼拜天，都是我们的休息日，欢迎你到我家作客！”

黄翠芬客气地说：“谢谢！时间对我来说太宝贵了。我要按我们的习惯，明天继续工作！”

每到美国公民的公休日，许多人都忙着度周末，购食品。但黄翠芬仍早早来到实验室，把自己关在里边。这里成了她生命中最快乐的世界。

姐姐对这个妹妹的倔强劲也无可奈何，31年前就领教过了。

在美国，个人的小汽车多如牛毛，普通工人上下班几乎都有自己的小汽车。可是，我们的黄教授，一个有成就的高级知识分子，却不得不每天挤公共汽车。她在这里没有任何经济收入，没钱雇小车。姐姐两口子都是已经退休的老人，姐姐原是一名护士，姐夫是药剂师，家里也并不富裕。再加上年纪大了，不可能每天用车接送她。他们只能拿出自己有限的积蓄供给她起码的伙食费，每周再花十几元美元为她购卖一张乘车证（不是月票，而是周票）。这样每天挤公共汽车，仅路上就要占去两个小时。黄翠芬心疼时间，只好早出晚归，用比别人多付出一倍的汗水和辛劳，去获得相等的成果。

也许正因为美国的小汽车多，所以公共汽车就特别少，有时半天等不

来一辆，要是碰上闹罢工，干脆就不来了。

有一次，她站在站牌下又等起来，一个小时过去了，仍未见有车到来。她失望了，下决心迈开双脚往前赶，三十多里路呢！她走走歇歇，歇歇走走。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奔波，她才大汗淋漓地回到姐姐家。

美国是一个物质丰富和高消费的国家，城市生活费的开销是很大的。这对仅靠亲友资助来坚持研究学习的黄翠芬来说，简直是“冒险”。为了减轻姐姐的负担，她尽量省吃俭用，不进餐馆，也很少食用精美的营养品。住在那样一个物质丰富的国家，半年下来她的体重竟比过去下降了许多。

我们仿佛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另一位著名的女科学家、被世人称为“镭的母亲”的居里夫人的影子。80多年前，当她不顾贫病交加、经过千辛万苦，从400吨铀沥青矿、1000吨化学药品和800吨水中提炼出微乎其微的一克纯镭时，体重一下掉了14斤。

## 异国风光难道对她毫无吸引

一天，黄翠芬收到住在芝加哥城的妹妹黄翠仪的来信，邀请她去芝加哥城旅行游玩，并热情寄来了旅费。是啊，算起来她在美国各地有近十个亲人，既然是探亲来了，就应该到各地都走走。尤其这个芝加哥，美国的第二大城市，那里曾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中心，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三八”妇女节的发祥地，有许多独特的名胜和纪念地，吸引着各国的不少游人，要不去可太遗憾了。

在此前后，分住在其它城市的姐妹和亲友，也不断来信来电，相邀黄翠芬前去游玩。

啊，多么难得的机会！多么有魅力的邀请！

君不见，当那曾使不少人闻之变

## 回国时带点什么

色的“海外关系”的“紧箍咒”被破除以后，当那紧紧密封的国门对外开放以后，在政界、知识界、经济界，顷刻间不是又形成了一股“出国热”吗？不少人找着各种借口，甚至诱逼对方发出“邀请”，然后挂起类似“考察”、“见学”之类的招牌，千方百计钻进各种“代表团”里去，到国外去开洋荤、看洋景、发洋财吗！

可是，现在已置身国外的黄翠芬，对如此美好的机遇却毫不动心，不要说去华盛顿之外的各个城市游览了，就连华盛顿本身的老胜也还没有涉足呢。

难道这里没有值得一顾的地方？不。这里许多世界有名的建筑曾使不少人留连忘返。甚至叫人惊叹、折服！

可是，黄翠芬却用事业二字，紧紧关住了“感情”的闸门，用力摒弃这些美好的诱惑，心里重复复这样一句话：事业，事业重于一切，祖国重于一切！这种享受对我来说显得太奢侈了。文学家往往把游览作为积累生活素材的重要途径，科学家却要在实验室里通过扎扎实实、反反复复的试验，来验证每一项具体的数据。她给妹妹去了一封信，对她的感情表示感谢，但却不能从命。因为她要工作。

此刻她正在专心致志地进行着从细菌中提取DNA重组的实验。这项工作需要精力高度集中，不能漏数，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在科学研究工作上，有天才的人物，但科研成果却绝不会从天上自己掉下来。美国发明家爱迪生的格言是：天才便是百分之九十八的汗水加上百分之二的灵感。黄翠芬以中国妇女特有的勤奋，每天十几个小时地站在实验台前，重复地做着这种繁琐的枯燥的工作，一周、两周、三周，……一连做了四个星期，选出了24个菌株，从中发现了一个个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现象，使这项研究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同室的美国同行和哥达斯曼主任竖起大拇指称赞她。

不知什么时候起，人们把出国看成了“捞一把”的同义语。见到从国外归来的人就问：“带回什么来了，大彩电还是电冰箱？”谁如不从国外带回点“洋货”，会被认为是大傻冒。

黄翠芬虽然自己没有外汇，但只要她张一张口，亲友姐妹们的馈赠品会压得她拿不动的。

但黄翠芬不是拜金佬，她是胸怀祖国的科学家。她非常欣赏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美学家莱辛的一句话：“生活中最没有用的东西是财产，最有用的东西是才智。”她一次又一次地谢绝了亲友的馈赠。

哥达斯曼教授很赞赏这位事业心很强的中国同行在研究学习期间所取得的突出成绩，他准备把一部分只有科学家才能掂量出其分量的仪器设备，赠送给这位女学者，作为对她的奖赏。其他一些好友也送给她一些实验室不可缺少的药物试剂。这些东西合起来，价值在一万美元以上。

黄翠芬一下子成了富翁。她一件一件抚摸着，端详着，像当年得了宝贝儿子一样高兴。

“真是不虚此行啊！”黄翠芬高兴的感叹着。

“可是……”她忽然两眼凝神不动了，自己带的是探亲护照，又是个单身的老妇人，这些仪器设备怎么运回国去呢？

她想找中国大使馆的同志帮忙！

她找到了大使馆的武官处。

黄翠芬将自己的身份和情况作了介绍后，提出请大使馆帮她把这部分仪器想办法运回国去。

武官处的同志深为她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但又说：“这是从来没有先例的事，让我们研究一下再定吧！”

之后黄翠芬又往大使馆跑了两次，展开了积极的“宣传攻势”：

“同志呀，十年内乱使我们与先进国家科学技术的距离拉大了。是中

华子孙谁能不着急？谁能甘心落后？睁眼看看，在美国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中，中国血统的占了不少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赶到前面去，为我们中华的崛起而出力效劳……”

她的宣传工作大见成效，武官处的同志痛快地答应她：破一次例。

九月中旬，黄翠芬准备起程回国。亲友们都赶来送她，不少人还好言挽留她。

上飞机了，她手里仅提着一只小盒子。这盒里装的是什？金银首饰，还是玉石古玩？

在主人的眼里，也许它要比金银玉石贵重得多！是实验用的菌种。

为了把这些菌种安全地带回祖国，黄翠芬一路上吃不好，睡不好，把心全操在了它身上。

途中，飞机因故障停在洛杉矶，而且还要停五天。这可把黄翠芬急坏了：30多度的地面高温，使菌种面临毁灭的危险。怎么办？

黄翠芬突然想起此地有她的一个熟人，就手提菌盒，打听找上门去，说明情况，把菌种暂时存在人家的低温冰箱里。接着，又同主人一起开车到街上去买干冰。

飞机到香港后不再走了，黄翠芬从这里将改乘火车去深圳回国。九月的南国犹如一座火炉，烫的人透不过气来。黄翠芬提着菌种，急匆匆地来到罗湖桥畔。在这里，每一个人境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海关检查。

随着旅客的人流，黄翠芬排队来到检查台前，递上了手中的东西。检查站的同志莫名其妙地打量着这个盒子，问：“这是什么东西？”

“菌种。就是细菌……”

“什么，细菌？”海关人员看着这个古怪的老妇人，其它什么东西都没带，偏偏带着一盒细菌回国来了。

黄翠芬怕发生麻烦，少不得又解释一番。她如此这般地说了半天，海关人员大概看出她不像个坏人，又有正常的手续，就叫她写了一份证明留下，放她进站了。

到了广州近 40 度的高温，烤得黄翠芬头昏脑胀，心里直发慌。但她想到高温同样威胁着宝贵的菌种，就顾不上自己的难受了。气喘吁吁地跑呀、跑呀，跑了一条街又去一条街，问了一个商店又一个商店。老天总算有眼，最后她终于在市西郊找到一个冰厂，买回了需要的干冰。

这一盒菌种，分量并不重，连盒带冰也超不过十斤。但当黄翠芬把它带回北京后，却累得腰酸腿疼，比背回一个几百斤重的电冰箱还累人。

她一路上把心劲全用在这盒菌种上了。



△ 黄翠芬的全家福

## 不应断线的友谊

黄翠芬回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后，那些仪器设备也由大使馆运到了。这些东西人家虽然是赠送给她个人的，她却全部献给了公家，装备和充实了全军第一个分子遗传研究室。

“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这是谁的话？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的。

国外之行，使黄翠芬开阔了眼界，熟悉了情况，掌握了信息，结交了好朋友。回国后她带领自己的一班人马，有板有眼地干了起来。成绩总是植根于辛勤耕耘之中。不久，他们就在遗传工程研究方面创立了 20 几项新技术和新方法。他们开始摘取医学科研桂冠的明珠了——在国内首次搞成功了乙型肝炎 adw 亚型病毒基因的无性繁殖；首次取得应用遗传工程技术制备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的成功。

成功，渗透着黄翠芬和同伴们的

汗水，也凝结着友谊和支持的力量。

美国分子遗传研究室主任哥达斯曼教授，一直关心着黄翠芬回国后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不断给她寄来一些新的资料和试剂。有一天，他竟顺着这条友谊的纽带，从华盛顿飞到了北京。黄翠芬高兴地把他请到自己的单位，请他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哥达斯曼教授参观了他们简陋的工作室，他没想到这些中国同行竟在这样的“陋室”中，取得了如此可观的成绩。高兴得眯起碧蓝的眼睛，连连夸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们搞出令人佩服的成绩，真了不起，了不起！”

说到友谊，我们更不能忘记那位热心的科学院士斯达曼夫人。自从黄翠芬回国后，这位高龄的美国女科学家，不顾年高体弱，已几次飘洋跨海来中国进行访问。每次来，她都手提一大包药品和试剂，往黄翠芬面前一放说：“教授，这是给你的。不够用就说话，我下次再带！我这个人你知道，不讲客套！”

是的，斯达曼夫人是位有威望的

科学家，也是位乐于助人的善良人。

一次，黄翠芬带领研究室的同事在进行有关尿激酶基因克隆的实验时，发现缺少一个重要的器具——基因探针。

别看这东西不大，少了它实验就难以进行下去。他们把求援的手伸到国内有关单位，没有。无奈中黄翠芬想起了斯达曼夫人，一封求援信飞到了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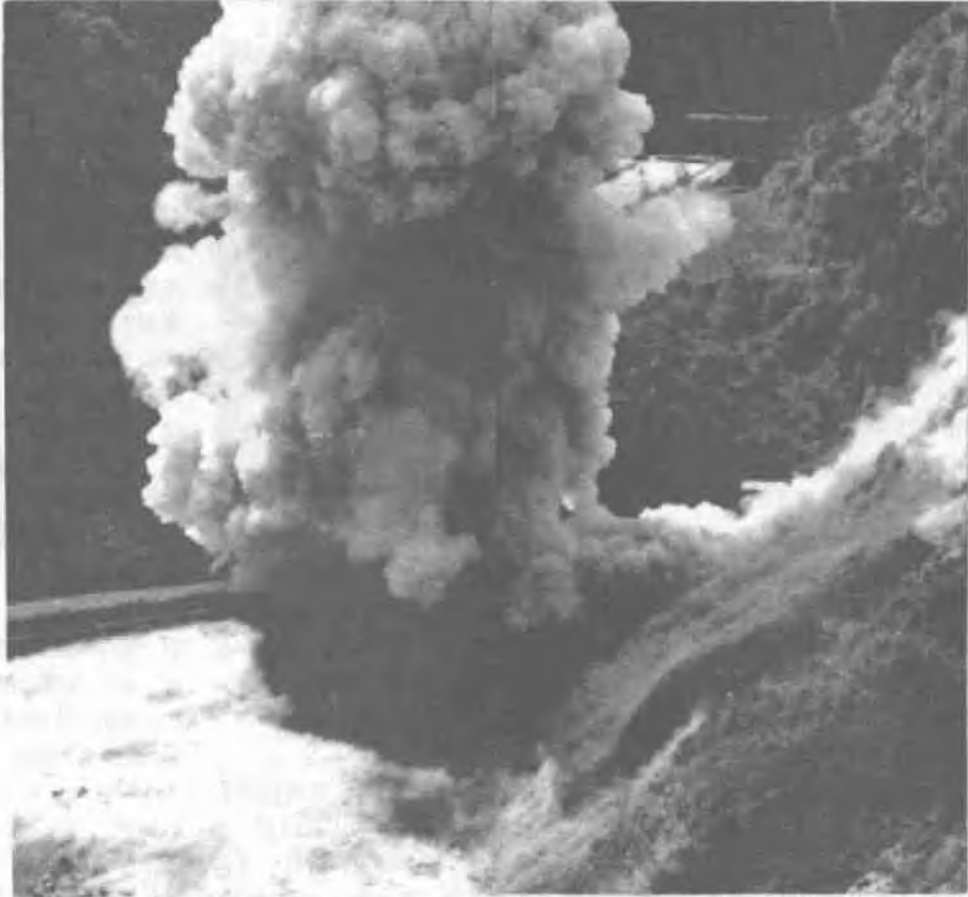
接到黄翠芬的信后，斯达曼夫人立即行动起来，到处去为她找这个探针，费了很大周折，还是没有着落。于是，她一个电话打到意大利，那里的朋友“闻风而动”，终于找到了黄翠芬需要的基因探针，并立即飘洋过海地给她寄了来。

黄翠芬拿着这种“探针”，心里感到暖烘烘的。为了人类共同的科学进步，科学家进行了怎样的努力啊！他们把友谊的彩练抛向了美洲，抛向了欧洲，抛向了全世界！

“讲到名声、荣誉、快乐、财富这些东西，如果同友情相比，它们都是尘土。”

# 『爆炸大王』李正华

吴宗慈



1965年初春，24岁的李正华从中南矿冶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第二天就去214研究室上班。五十年代留学苏联归来的室主任李青云一见面就问他：“你学的什么外语？”“我学的俄语、英语。”李青云说：“我们室研究超导，这是我国刚刚起步的新学科，多懂点外语，及时掌握国外的研究动态，是很重要的。”李正华领悟了。他暗暗高兴：在业务型领导手下工作，该不会像在大学时代那样，说我“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了。

“超导”研究，就是要研制出一种在一定条件下电阻极小极小、以至等于0的导电材料，以节约电能，最大限度的满足国防等尖端科学领域生产部门的需要。这在国外也是个新领域，国内从1964年才开始组织班子。年轻的李正华无暇观赏故宫的辉煌和北海的春光，却纵身跃入科学的

瀚海，夜以继日地“泡”在实验室里和资料堆中，阅读、思考、试验、探索。

研究室讨论“如何把铜包到超导材料上去”，众说纷纭，了无定论。李正华提出方案：“先把铜管套上去，然后再加固。”他的组长硬是不同意。李正华想：“不同意我也要试验，做给你看。”于是，自己找铜管，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加班做试验。第一晚，失败了。第二晚，他加大功率。正干得起劲的时候，组长发现了，关了机，不准他“擅自”做试验。但是，组长前脚走，他后脚进实验室接着干，终于试验成功，解决了超导研究中的一个难题。

李正华不但勤于思考、勇于实践，而且不怕吃苦、忘我工作。研究中，他想设计一种轧辊，在孔型轧机上轧超导，这种轧管，只有冶金机械厂能做，而这个厂远在京郊昌平区。有一天，李正华忙于搞试验，下班晚了，出了厂门，满天星斗，郊区末班

车早已过去。厂里人劝他留一宿，明日再走，他想：“明天我还要回研究室上班，有许多工作等着，不回去咋行？”于是，他谢绝主人的好意，徒步孤身沿着漆黑荒凉的京郊公路走回城，足足走了40华里！到宿舍，已经夜静更深。他草草休息一下，天刚亮，又照常上班。

1966年初，李正华怀着建设三线，加速国防现代化的豪情，化五角钱买了个纸箱子装书和资料，带着简朴的行装，满腔热情地来到秦岭脚下，渭水河畔，大山褶皱里刚刚兴建的国家重点企业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参加创业者的行列，继续从事超导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研究基础、取得某些探索成果的李正华，假如继续在这个领域开拓前进，成功的希望是指日可待的，然而，一项全新的更为艰巨的研究课题在期待着他，李正华又面临着一次人生抉择和考验。

1966年3月的一天，比他先来数日的他在北京时的老领导、厂科研

科副科长李青云找他谈话，动员他改变研究方向，改搞金属爆炸加工。这是一项年轻的尖端科研项目，国内的试验刚刚开始，国外的研究和加工也仅只几年。而且，厂里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必需的人力、物力，更为困难的是爆炸加工涉及到十几门学科，与李正华所学的专业对不上口，他必须从头学起。抛开自己熟悉的有希望突破和成功的超导试验，转行从事生疏毫无把握、白手起家、甚至要冒很大风险的新课题，为填补这块空白，赶上突飞猛进的世界科学水平，那怕千难万险，也要拼力攻克。

李正华勇敢地接下这个硬任务，立志终生为之奋斗。

## 二

没有资料，没有信息，不知从何下手，怎么办？1966年4月，李正华一接下任务，片刻不敢停留，就单枪匹马、风尘仆仆只身赴京，找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科研办副主任威斯来，向他讨教。威斯来让他到中科院力学所去了解爆炸成型的动态，接着他又到北航去找一位研究爆炸成型的老教授。四处奔波，登门求教，但是却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他有点儿泄气了，这时，威斯来勉励他说：“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年轻人干出来的，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使年方25岁的李正华深受鼓舞，他下决心继续到全国各地接触这个研究领域的科研部门和厂家取经，了解第一手信息，即使踏破铁鞋跑断了腿，也在所不惜。

李正华一气跑了哈尔滨、沈阳、大连、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成都、重庆、武汉……。当时，正是“文革”初期，红卫兵大串连，火车十分拥挤，他站在人声嘈杂、几无插足之地的拥挤车厢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日日夜夜，站肿了双腿，熬红了双眼，累瘦了身子。跑了大半个中国，他终于掌握了大爆炸加工领域的全局

状况和最新信息：全国搞爆炸成型的有近百个单位，由于工艺没解决，研究深入不下去，无配套设备，甚至经常出事故和死人等原因，纷纷下马、改行，剩下的仅几家，且滞留于试验阶段，全国范围内爆炸成型的试验处于低潮期。

回厂后，李正华一面刻苦地钻研有关爆炸加工的各方面的知识，一面以更大的热情进行试验。他备齐了各种爆炸材料，自做了试验用的工具和设备，一个人不吭不响钻进人迹罕见的大山里，用石头砸，用火烧，摔雷管，点炸药，一次又一次地试验，不断地修正方案，调整数据，改变配料，然后再爆炸，再试验。每当他披着一身尘土、挟带着爆炸的硝烟，“完好无缺”地活着回到试验室时，同事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1968年，当爆炸成型的试验经过多次实践终于取得初步成效后，他立即把主攻方向转向更复杂、更艰难、更有前途、国内尚是一片空白的钛钢爆炸复合的研制。

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是全国规模最大、设备先进的钛材生产、加工厂，而稀有金属钛是继钢、铁之后影响人类物质文明进程的“第三金属”。它质坚、品优，比重小，耐高温，抗腐蚀，拒酸碱，是飞机、卫星、核潜艇及化工企业等必需之罕材，被誉为

“航天工业的宠儿”。但钛金属名贵，成本高，价格昂贵，若将薄薄的钛板与钢板紧密粘合成钛钢复合板，用在航天工业、特别是化学工业上，不是既能充分发挥两种金属之所长、又可节约钛而大大降低成本的两全其美之事吗？但钛钢复合技术难度高，风险大，国内有人曾想研制，迄未成功；国际上虽然早在50年代末开始研制，但也仅在少数几个国家（美、英、苏、日）获得初步的成功。李正华面对的正是如此艰巨的科学伟业！

当时，李正华的爆炸小组仅有三人。他们攻理论、查资料，算数据，做实验，然后扛着金属板、带着雷管，炸药进山。“爆炸”，对局外人来说，是讨人嫌的煞星，它不仅不能勾起中、老年人对战争的恐怖回忆，而且那“轰隆”、“轰隆”的猛烈爆炸声震得人头脑昏昏，鸡飞狗叫。他们不得不打一枪，换一炮，爆一次，跑一地，于是，秦岭山间，渭水河畔，幽谷深峡，荒漠旷野，到处留下他们的足迹。

一年除夕，鸡峰山上的农户家家洒扫除尘，贴上新窗户纸，购买年货，一派欢乐融融的节日气氛。正在这个时候，李正华和他的伙伴们冒着严寒、肩扛手抬上百斤重的金属板材又进山了。隆隆炮声在鸡峰山谷回荡，打破了山中的沉寂，却惹恼了欢



△ 李正华给研究生讲课

欢喜喜准备过年的山民。窗户震破了，新房震裂了，一个大嫂怒冲冲指着李正华：“你把我家的母鸡震得不下蛋，母猪震得不下崽，猪崽震得不吃食了！”……

李正华面对愤怒群众深表歉意：“震坏的，我们照价赔偿。”

村民们不依。任你怎么说，反正过年不吉利，他们一心要把李正华一伙撵走。

材料设备好不容易从山外抬来，试验又刚有了点成果，而且寒冬腊月的，往哪儿转移？李正华和他的战友们想来想去，还是硬着头皮继续做试验，这就更激怒了村民们，第二天，一群村民举着锄头、耙子、木棍，团团围住了爆炸现场，威逼李正华马上撤离。空气凝固了，双方虎视眈眈，一场流血械斗眼看就要发生。此刻，李正华不顾旁人劝阻，挺身走到对方面前：“我放炮不是为个人，是为工厂，为国家。我不怕，你们要打就打，要拼就拼！”他豁出命了。纯朴的山民在李正华一身正气的威慑下，反而缓和下来，发了慈悲，七嘴八舌地发了些牢骚，逐渐散去。潮退了。

那隆隆爆炸声依然震得人心烦意乱，村民们不得不改变了斗争手段，他们从山上往下扔石头，偷拿试验材料……总之，千方百计进行不断骚扰。李正华和他的同伴们最终还是被逼走了，搬到更远、更深的太白山中。“太白积雪六月天”，那里实在太荒凉偏僻了，前不沾村，后不靠店，他们干着复杂而繁重的脑力、体力劳动，饿吃干粮，渴饮河沟里的泥水，风霜雨雪，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他们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全部热情、精力和爱心奉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

为了取得更准确的数据和观测爆炸刹那的情景，为了测定爆炸对人体的影响程度，李正华决定亲自做近距离观测的爆炸试验，这是十分危险的。同事们苦口婆心地劝阻，他不听，执意要做。他要像保尔和吴运铎那样不惜用生命和鲜血去殉事业。他



△李正华接待来参观的外国专家

让大家在安全处，自己在爆炸场附近选一处勉强容身的地方，坚决果敢地扳动起爆器。“轰隆”一声，地动山摇，飞沙走石，硝烟弥漫，平地卷起巨大的烟尘柱，金属复合板被抛向空中，砸下又弹起，发出沉闷的巨响。李正华的耳朵被震得巨痛，心脏像要从口腔里冲出，一阵恶心，但他亲眼目睹了无比壮观的爆炸情景，灵魂为之颤栗。就在同一刹那，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飞射而来，他躲避不及，被击中腰部，猝然倒下。他感到一阵疼痛，几欲昏厥，心想：“这下完了！”停顿片刻，他慢慢抬起麻木的胳膊，揭开毛背心，只见腰间一片红肿，像个馒头，他暗暗庆幸石头打偏了。他强忍痛楚站起身来，拍掉身上的尘土，满面笑容地向人们描述观测到的现场情况。

还有一次试验，起爆器拉了，就是不响。是雷管出了故障，他掩蔽好同伴，自己冲上去，冒着生命危险检查引爆炸物，迅速排除了故障。

在试验中，他曾被砸掉了指甲，脚指骨被砸成骨折，每次，他都强忍痛楚忍着坚持继续干。同伴们无奈，赐了他一个雅号：“拼命三郎”。

1969年“5·1”前夕，李正华经数百次试验后，已取得初步成功，他试制成了1×1.5米的不锈钢和钢的复合板。

但是，钛钢的复合技术更复杂，人们称之为“复合之王”。它是国防、

化工等尖端科研、生产部门之最急需，攻关任务刻不容缓。这期间，冶金部、中国科学院、上海科委等单位共同组织了攻关组，拨款数千万，在鞍钢试验，为建造核潜艇爆炸难度尚不及钛钢的白铜与钢的复合板，结果以失败告终。当时，冶金学界弥漫着悲观情绪，对钛钢复合丧失信心。

鉴于钛钢复合困难重重，特别是国家攻关组的失败，周围的同事劝李正华“还是搞超导吧。”李正华毫不动摇，一如既往，更频繁地实验。

1970年初，一个新的任务、新的考验摆到了李正华面前：中央军委总后勤部要在湖南创建一座工厂，生产涤纶、的确凉为部队换装，其中一个设备需用钛钢复合板（1.1米×2.6米）。解决的办法是：一从日本进口，价格高昂，让人家卡你的脖子；二是自己生产。总后勤部企业部听说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搞这项试验，就派了两人前来洽谈。革委会负责人找来李正华，问他：“敢不敢干？”李正华思量：这是军工任务，时间太紧（要求八月份完成），很难，但是，如果不接，我们的钛钢复合就没有出路，接了，有生产任务逼压，就能拼出成果，“任务”本身也是科研的目标和支撑点。权衡利弊，他决定：“干！”毅然接下这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厂里又给他配备了三个人。一支八个人的科研队伍，雄心勃勃地向新的目的地进发了。

### 三

当时，上海某厂也在搞钛钢复合试验，李正华决定去取经，一行三人风尘仆仆赶到上海。当他们满怀希望地找到这家工厂时，谁知，人家连大门都不让进，说：“为了保密，谢绝参观。”他们千说万说，好不容易才在厂门口的接待室里见到了负责这项试验的工程师。工程师不耐烦地说：“这个试验我们也搞不下去了，你们要看样品，这不，就在那儿扔着！”李正华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但见一块桶底大小的金属板，盖在一个下水道口上。他抢着步走去伸手想拿，却被那位工程师拦住了，随即下逐客令。李正华一行败兴。回到宝鸡，决心卧薪尝胆，自力更生。

一次试验就增一分经验，添一组数据，试爆较大面积的钛钢复合板终于有几分眉目和成功把握了。

1970年的7、8月份，总后勤部企业部又派人来，请李正华他们到大连去爆炸钛钢复合板。组内有人不同意，认为把握还不太大，再做一两个月试验再去不迟。李正华考虑到工程急需，决定如期应约前往。

在大连三个月，是没日没夜的连轴转。清晨，他们顶着星星、拉着板材、背着雷管和炸药出发，穿过市郊金县到荒漠的海滩做爆炸试验；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踏着月色回到住宿地，顾不上洗脸、吃饭、休息、连夜讨论试爆情况，计算数据，分析问题，修改方案，第二天又接着试验。李正华和他的同伴们没有作息时间表，没有节假日，更没有娱乐，他们只有一个心愿：一定要制造出合格的钛钢复合板，决不让日本商人卡我们的脖子！有一次搬钢板，李正华被削掉了半个手指头，十指连心，疼痛难忍、血流如注。他咬紧牙关，强忍巨痛，只用纱布包了包，又继续干活，一分钟也不休息。他心急如焚，怕误工期，恨不得一天干它24小

时！

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国庆节期间——10月2日，1.1米×2.6米的钛钢复合板终于爆炸成功了。大连市的超声探伤专家亲自来检查质量，结果是质量标准高达98%（95%即合乎标准）。这是国内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的第一块钛钢复合板，它打破了日本等国的垄断地位，标志着中国的爆炸加工技术已进入世界先进国家之林。

任务完成后，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总后企业部热情邀他们到北京小憩。特派霍子耕局长去车站接他们，在企业部招待所里给他们安排了舒适的房间，按高级专家规格接待。可是服务员一看到他们衣着肮脏、须发芜杂、活像刚释放的劳改犯，势利心理作怪，就自作主张把他们赶到了大统间……

美丽的洞庭湖畔，矗立起高接云天的氧化塔。这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用国产的高级材料——钛钢复合板制造的摩天之塔啊！它威武气派，坚固光亮，巍然屹立，象征着我们民族和人民的恢宏气魄和精神。李正华去了，看到自己耕耘数载的第一茬收获，不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欣慰、激动、喜悦之余，又一个新的设想和计划在他脑海中孕育、萌动、诞生：要使科研更快地转化为生产力，必须全力提高爆炸复合板的质量和增加产品品种，解决现存的技术难题，把牌子打出去，打到全国，打向世界。

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谈何容易！他们设备很简陋，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国内无任何成功经验可资借鉴；办公室、实验室是破旧的简易房，尽管如此，李正华在李青云的支持、鼓励下，又马不停蹄，奔走在渭水河畔，秦岭山脉，长江两岸，开始新的试验。

那轰然巨响、地动山摇的爆炸声到处不为群众所欢迎。李正华在秦岭山中爆炸时被山民撵得到处跑的烦恼历史，1970年在大连海滨试验因震

坏了附近工厂的锅炉房玻璃而被公安局传讯的尴尬场面，又在这儿重演。他们在长江边上不过炸了几炮，就被附近呼啦啦、黑压压的一大群农民围了起来，老头儿、老太太们躺在地上，有的高喊“我的小孙子吓傻了”；有的唧唧“我那媳妇吓流产了”；有几个老头干脆指着自己的耳朵诉苦：“我的耳朵被震聋了”……妇女们、孩子们指手划脚，叽叽喳喳，吵吵嚷嚷，高低不让炸！火爆性子的李正华出奇的耐心，磨破嘴皮子求情说好话，并作了经济赔偿。

1972年到1974年，李正华和他的同事们毫不懈怠，一面不断提高已试验成功的复合板质量，增加复合板品种；一面接受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厂家的少量订货，让科研密切服务于生产。因为没有固定的爆炸场地，他们仍然推着架子车，成年累月奔走在荒山野谷中。

### 四

长期以来，我国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化肥，花费大笔外汇。1974年的广交会上，外商乘虚而入，攻我弱点，几倍几十倍地抬高化肥价格，牟取超额利润。若要不受制于人，我们这个泱泱农业大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化肥工业，而要发展现代化的化肥工业，必须得有先进的设备。国务院研究决定，从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荷兰进口十三套大化肥设备，装备我们的化肥工业；周总理又特地责成有关部门自己研制、生产出一套设备，装备一座年产24万吨尿素的化肥厂。这套设备的关键装置是二氧化碳气提塔。塔的关键部件是碟形管板和封头，用什么材料和工艺生产这高精部件，就成了这套设备能否制成的关键。为此，1975年元月，一机部、化工部、冶金部与上海科委，联合在上海科学会堂召开有500多位专家参加的攻关会。

李正华那年刚35岁，技术员，

是与会代表中年龄较轻、职称较低的一个。他聆听大家的发言，捕捉最新信息，第四天会上，他要求发言，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从各个角度进行论证和分析，提出用爆炸复合的办法解决这一难题，即用爆炸复合的方法制造钛钢复合的碟形管板，同样，用爆炸复合的方法研制国内迄今尚未出现过而可能成功的8平方米的钛钢复合板制造封头。这是个新颖、大胆、充满独创精神的建议。有人在会上提出一连串疑问，表露出某种担心：“照你的办法干，钛板和钢板在高压脉冲猛烈撞击下，边缘被炸毁，能天衣无缝地复合在一起吗？”“两板之间有空气，妨碍两种金属的原子结合，你如何排除这个障碍？”……李正华胸有成竹，以自己九年来的潜心研究和风里雨里、出生入死的千百次试验的经验，有条不紊、镇定自若地回答了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位年轻人是那么热情洋溢、充满信心，方案又是那么的细致周密、合情合理，尊重科学的专家们终于信服了。大会一致决定采用李正华的方案，并且把研制大型钛钢复合板的艰巨任务交给了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要求在1975年年底完成。

这副担子实在太重了！但李正华是进攻型性格，乐意在巨大压力下磨炼自己，何况，这又是关系到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的大事。会议一结束，李正华来不及等卧铺票，坐上硬座往回赶，进了厂门不回家，直奔厂部找领导汇报。

厂领导支持他接下这项任务。可千钧重担却压在李正华和他的同伴们身上。过去，他们试爆的都是较小面积的钛钢复合板，这次复合板面积竟要达到8平方米！大面积的爆炸复合，带来一系列难度极大的技术问题，特别是爆炸大型碟形件，工艺更是复杂。李正华率领全组人员夜以继日，一个方案拿出来，细细推敲，发现疑点，推翻再设计再修改，再讨论，再否定。如此往复，经过两百多

次的摹拟试验，终于制定出一个缜密可行的试制方案。

恰恰这时，李正华突然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废寝忘食、全部身心扑在事业上的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位慈母殷殷盼归的爱儿！他心情沉重，焦虑万分。但当前研究任务迫在眉睫，寸阴寸金，怎么办好？这位在千难万险面前毫不畏惧、刚强果断的男子，此时，心乱如麻，苦恼万分！经过再三权衡，他最终以大局为重，强忍思亲之痛，写信安慰老母，继续艰难的试验。

1975年7月，在数百次试验和测定中取得了丰富经验和准确数据的李正华，几经反复，最后终于爆炸出高质量的8平方米的钛钢复合板和直径2米的碟型复合板，他们又成功了！兴高彩烈的李正华与他的战友们又连续作战，一直干到12月份，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国家重点攻关任务。

爆炸成功后，西德和瑞典的代表团来哈尔滨参观钛钢碟形部件和封头，他们惊奇、感叹、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你们做了我们想做还没有做到的事！”

经一机部等十多个单位共同鉴定，李正华小组研制和加工的这个巨型钛钢复合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冶金部给这个科研项目颁发了奖章。

成功的喜讯飞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许多用户来人订购钛钢复合材料，李正华有求必应，他们上天津，跑湖南，去南京，奔武汉，跑到哪里，炸到哪里。他们满足了各厂家不同需要和更多样更高的要求。

消息也传到了上海某厂。这个厂自李正华他们来参观被拒绝后，几年来，在金属爆炸加工技术上一直没有突破。李正华的成功震撼了他们，他们组织了一个六人参观团来宝鸡参观学习。李正华不记前嫌，热情接待，带领他们参观实验室，毫无保留地介绍研究情况和积累的资料。

1980年，他终于在秦岭脚下建起固定的爆炸场。

李正华很强调集体主义。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相信集体主义，搞科研，开发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离不开集体。”他非常重视集体的力量，多次对人说：“我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与领导重视、群众支持、群策群力是分不开的。”他满怀敬意地谈到现任厂长兼研究院院长李青云对他的支持，充满感情地列举了研究室副主任裴大荣、研究室书记王时政与他的亲密合作，以及青年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所作出的贡献，他恳切地声明：“我的事业成功有他们的功劳、他们的心血，不然我一个人能干什么？！”近几年，英国、泰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想聘请他去任职，他都毫不犹豫地婉言谢绝：“离开宝鸡，我最多能赚点钱，我的事业不会成功。我们所以能取得成绩，是集体主义战胜分散主义。”

五年摸索，十年创业，十年发展，李正华在爆炸加工的科技领域内披荆斩棘，辛勤拓荒，艰苦奋斗了25年，在荒山野岭间建起一座举世瞩目的科学大厦。他的研究成果已堂堂正正地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1980年获一机部重大科技成果奖；1982年获冶金部二等科技成果奖；1984年获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二等科研成果奖；1986年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全国钛应用推广奖；1989年获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1991年在第二届北京国际博览会上，白铜钢的复合板又获金奖。他研制、生产的金属复合材料不仅誉满神州，而且行销海外，进入国际市场。

李正华二十多年来，写出了数十篇科学论文和论著。还被评为宝鸡市劳模、陕西省劳模，1991年又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科技专家。

现在，李正华领导的研究室已发展到60多人，研究人员有32人。他有1200平米的实验楼，有了6000多平米的实验场。

(责任编辑：仲文)



# 丰都鬼城悠悠情

肖岚



世上本无鬼，四川省丰都县却有一座“鬼城”。

“鬼城”是在丰都县城后的一座山上，这座山叫平都山，俗称名山，真是山不在高，有鬼则名。此山不过288米，却因“仙都”、“鬼城”之故，名声很大，以至名传海外，不少华人老外都知道，丰都果然有座“地狱”。

此山从西周开始，即是当时巴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西汉的王方平和东汉的阴长生两位神仙家来此山修炼，传说这两位最后炼成正果飞升而去。其后，道教和佛教在此山兴盛一千多年，香火极旺，仅山上和山麓就有道观和佛寺48座，加上城内27座民间宗教庙宇，竟达75座。庙观中有有名有姓的神仙和菩萨就有400多个，大大小小的鬼神塑像，据不完全的统计，不下一万，在这些精美的塑像中，包括金属铸像，木雕、石雕、泥塑和浮雕。

尽管省文物主管部门和县人民政府曾多次发布公告，明令保护文物古

迹，但在大炼钢铁和“文革”劫难中，这些据说曾超度亡魂、能救世人于苦难中的神仙和菩萨，自己的下场却是“毁尸灭迹”。

一座名播海内外的“天下名山”，就这样荒芜了。可人们总是忘不了丰都的鬼城。

## 来了个不怕鬼的县委副书记

经历过一场接一场政治运动像做了一个接一个恶梦的人们，终于醒来碰上了阳光明媚的早晨，

1979年，丰都县从外县调来了一个貌不惊人的县委副书记，此公姓刘名大祥，分管文卫大口，虽然他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却是个干一行爱一行的角色，既然分管文、教、卫生事业，就先摸摸情况，这一摸不打紧，竟让他摸出了一个烫手的“宝贝”，这就是“鬼城”。

那时，中共丰都县委的党校设在

平都山上，因此，才完好地保存了主庙和“奈何桥”、“鬼门关”等鬼城风物。

一次，他上山去党校，看见鬼城庙观的残败景象，心中十分叹惜，难道这就是他从孩提时代就曾听说过的那个神奇的地方？尽管山上一片青翠，可那些很有文物价值的神像，他一个也没见着，他在摸情况时得知，明代用铁合金铸造的“阴天子”和铜铸的“玉皇大帝”两座神像，每尊高达七米，重万多斤，也全被毁了。

“败家子！”他暗骂了一句。

一次，在县领导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恢复“鬼城”。

天哪！共产党的县委副书记竟然爱起“鬼”来了，这成什么体统！

一石激起千重浪，议论纷纷，纷纷议论。有人私下问他：“你不怕‘鬼’？”

他说：“共产党人本来就不怕鬼！”

又问：“恢复鬼城，是不是恢复封建迷信？”

他坦然地说：“当然，那些庙观里头有封建迷信，但也不全是封建迷信，那里头有历史，有文化。”

留着个农民模样平头的刘大祥，竟然文绉绉地说出这么一番精粹的话，对方不再问了。

其实，这不是刘大祥个人的看法，他知道，1958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踏勘三峡路过丰都时，就曾发过话。

那年3月4日下午2时，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在省委书记阎红彦的陪同下，登上了传说中的“鬼城”。

阎红彦同志当时身有小疾，上山走得很慢，总理向他开玩笑说：“老阎啊，你趁此机会，就在丰都报到吧！”

阎红彦也风趣地回答“我才不哩，我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

总理关心地说“走不动，你就不走了”。

阎红彦说：“走慢点，没关系。”

那时，“鬼城”大体完好，主要的殿宇和神像都还没有被破坏，总理一行经“奈何桥”、“三十三重天”、“鬼门关”、“天子殿”来到“上关殿”内关羽像前。这时的关羽像有半边泥面脱落，露出了乌黑的胎底，总理指着关羽像说：“你们看，关羽成了个半边红半边黑的样子，菩萨露了真象了。”他又指着“上关殿”的扁额“千古一人”说：“关羽历来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死了还这个样，我们共产党人永远不要学他，要引以为戒！”

参观罢“鬼城”，总理一行回到“江峡”轮，听取了丰都县委领导同志的汇报，汇报到丰都县在汉朝叫“平都县”，隋朝改名“丰都”县，明朝才加上“邑”成了“酆都县”时，周总理说：“既然酆都连年丰收，就改成丰收的丰吧！”

谈到“名山”，李先念向阎红彦问道：“老阎，名山今天看了，怎么样？拆吗？人民以后知道了，不好，不弄（维修），烂糟糟的，还是不好。”



√ 鬼门关 / 何家吉摄

## 这扇窗户首先向日本人打开

持反对意见的人，并非对刘大祥本人有什么过不去。主要是害怕犯错误，谈“鬼”色变了。

可是在县委常委中，他还是得到了支持，当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后任县委宣传部部长的范明吉尤为卖力。这位爱好文学的中年人，在文革中吃过苦头，被打成“丰都三家村”的成员之一。他常常为刘大祥提供材料，因此，刘大祥才有根有据，说起“鬼城”如数家珍。

1980年6月，成立了“名山管理委员会”，刘大祥亲自出任主任，他决心要恢复丰都在世人心目中的知名度，开发旅游业，为丰都的经济建设服务，为丰都人民造福。

正当他带领一班人白手起家的時候，日本名人佐田雅志先生和我国中央电视台准备合作拍摄《话说长江》大型电视片，丰都被选为一个拍摄点。

当年10月3日，佐田雅志领着一行20余人，乘专船抵达丰都，刘大祥自然被派为接待的组织者。他很兴奋，这叫出师有利，老百姓叫开张大吉。尽管那时的名山还很不成样子，但丰都人还是热情迎接了第一批外国客人。



△鬼城路引 / 郑瑞耀摄

经过研究决定，总理指示维修。先念同志又对阎红彦说，老阎，省上拿点钱，支持支持。

事后省上拨了专款，对“上关殿”“报恩殿”作了维修。

往事如烟。

刘大祥站在平都山顶，浮想连翩，这时他想的是，修复鬼城到底有什么意义？要说服别人，这是关键的关键啊！

可天公不作美，那几天丰都的天空阴云密布，有时还细雨绵绵，秋风秋雨的季节，大街上是一片泥泞。

可日本人说：“好极了，就要这样的天气，烟雨朦胧，缥缥缈缈，‘鬼城’才显得神秘莫测！”

日本人也真能吃苦，在泥泞的山道上，他们亲自搬运拍摄器材上山，从未雇用搬运工，他们害怕中国的搬运工损坏了他们的器材。虽是秋风秋雨，一天上下两次，背着、扛着那些器材，也真够他们吃的。

丰都全城轰动了。日本人虽不是高鼻子，但毕竟是外国人啊！人们在议论日本人的同时，禁不住也赞叹起刘大祥来：“哈哈，这个共产党的县委副书记可真还有点板眼，竟把日本人也逗到丰都来了！”

日本人在丰都整整搞了三天。为了保证他们拍片不受干扰，公安局出动了警察，暂时不准无关人员登山。

最后一天，日本人公干完毕，他们三三俩俩走街串巷了。这时，丰都人才看清，为什么中国人过去骂日本人是“小日本”，除了日本国土不大，原来他们都是些“矮子”。

他们在丰都大街上大摇大摆观市容，逛商店，小孩子们追着看，大人们接到通知，不准围观外国人，要有礼貌。因此，他们只好站在自家门前，看着这些日本人潇潇洒洒，扬长而去。

大街上有个茶馆，一位七十多岁的刘大爷，正坐在茶馆品茶，见日本人走在大街上，不禁骂了起来：“妈的，这些日本鬼子！”

邻座一位杨大爷赶忙制止：“老哥，骂不得，人家是客人，上面要求要有礼貌哟！”

老人一听，更加来气：“礼貌？他们有礼貌？你晓不晓得，日本人炸死了我的堂客和儿子啊！”

事情虽然已过去39年了，但老人记忆犹新。1941年8月23日，天色晴朗，他做小吃生意，早早出了摊。谁知上午10点，山上的警报响

了，全城一片混乱，人们四面出城躲避，都记不清这是多少次了。

侵华日军进攻到三峡，不敢向四川进攻，被阻在三峡之外。地上来不了，就从空中侵犯。日本人的目标是重庆，丰都处于飞机去重庆往来的必经之地，往往因为重庆山城大雾，日本人丢不出去的炸弹，就被“处理”在沿途各县。那时，丰都人都很迷信，认为有名山上的神仙和菩萨保佑，日本人的炸弹炸不中丰都。可是，炸弹不怕“鬼”，还是炸中了丰都城。从那以后，只要警报一响，全城百姓扶老携幼，背娃带仔都拼命向城外跑，看来神仙靠不住，还是靠自己跑警报才能保命。惨哪，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解除警报，饿得路都走不动……

正当刘大爷收拾好摊子要往家走，警报又响了。街上行人奉命一律不准再走动。

不一会，日寇的轰炸机来了，十几架，排成三角形，就像一群只会给人带来恶运的黑乌鸦。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飞机“下蛋”了，令人胆寒的“噼里啪啦”声和地动山摇的爆炸声响成一片……

炸弹响的地方，正是刘大爷家那儿。他急得几乎发疯，但被警戒人员

拦住了。

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什么都完了，那里已被夷为平地，三岁的儿子躺在血泊中，婆娘的身子不见了，只有穿着绣花鞋的腿在瓦砾中……

杨大爷听了老哥的叙述，哑然良久，最后长叹一声：“唉！想开些，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如今这些日本人，又不是过去那些鬼子。”又拍了拍他的肩道：“老哥，看远些，友情为重，友情为重！”

中国是礼仪之邦，古老文化的熏陶，使老百姓生性善良。

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人合作拍片，不正是为了友好么！老人说得好，看远些，友情为重。

日本人在丰都忙乎了三天，后来《话说长江》播出丰都的镜头就那么分把两分钟。

可别小看这分把两分钟，丰都人都为这分把两分钟感到自豪呢！那时，电视机在丰都还是个稀罕玩意，播出那天，有电视机的人家坐满了三朋四友，递烟倒茶把主人忙得个不亦乐乎！

那天，刘大祥坐在电视机前，他不抽烟，泡了一杯香茶，有滋有味地看了这分把两分钟。他很感谢佐田雅

▽ 紫浩坛拜谒祖庙





△日本《话说长江》剧组曾两拍鬼城 郑瑞顺摄

志先生，是日本人揭开了“鬼城”旅游的序幕。“鬼城”这扇窗口首先向日本人打开后，外国人陆续地来了，到如今，五大洲 30 多个国家的朋友光顾过丰都。每年有那么多人来“鬼城”报到，平均每天有 30 多人吧！

## 台胞来鬼城拜谒他们的祖庙

刘大祥后来调到地区任职去了。他虽然走了，国内外游客却直线上升。到 1988 年，国内游客当年达 52 万多人，每年大体都稳定在 50 万。港、澳、台地区和外国游客如今每年已突破两万人。

1989 年 8 月 27 日，台湾省台中县沙鹿镇紫浩坛组团来丰都拜谒祖庙，再次轰动丰都城。这天，阳光灿

烂，晴空万里，从重庆开来的“岷江”号气垫船，在丰都趸船码头很快靠了岸。从趸船上走下来排列整齐、着装一色的 23 个男女，前导打着几面道教紫浩坛的旗帜，黑底金字在阳光下更加醒目，上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广法天尊台中县沙鹿镇大同街紫浩坛”等字样。

在县台湾同胞接待办公室主任吴陶禄的热情引导下，他们不愿休息，不顾炎炎赤日，一行直抵“鬼城”人口牌楼前，唰地一声，整齐地跪了下来，虔诚地行跪拜礼。旁观的人群先是吃惊，接着便是窃窃私语赞叹，这种行跪拜大礼的场面，他们已三十多年不见了。人们心中仿佛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激动。血毕竟浓于水啊！

丰都人感动了，两岸同胞是手足，我们同是龙的传人，有共同的文

化，有从古至今同源的宗教信仰传承，我们口中说的是一种语言……。

中国道教，由张道陵草创于四川鹤鸣山，那已是 1800 多年前的事。后来道教在丰都（当时称平都县）设平都治，是统管川东的传教中心。后来道教“北帝派”兴起，传道教最高神元始天尊派北阴大帝下凡收鬼于“丰都洞”，人间才得太平。北阴大帝为了使妖魔鬼怪不至于再作乱人间，向元始天尊请命，自告奋勇留在“丰都山”镇守“丰都鬼洞”，于是人间得以永享安乐。后来佛教在丰都大兴，佛教徒把镇守“丰都山”的北阴大帝变成了“洋神”“阎罗王”。因此，丰都“天子殿”中的“阎罗天子”便成了道、佛两家共奉的尊神。

紫浩坛来拜谒祖庙“天子殿”，自然是信奉道教的“阴天子”，即“北阴大帝”，或称“丰都大帝”。

这 23 个男女，有老有少，个个虔诚。据“广法天尊四川丰都曜灵宫进香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瑞宗先生介绍，早在乙丑年（1985 年）便给他们信奉的广法天尊金身修好了新宇，奠基安座落成，但碍于政令不符，到己巳年（1989 年），才得以成行。

他们盼得很苦。其实，早在 1936 年（民国 25 年），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和他的夫人宋美龄女士就先后来过丰都“鬼城”。

那年 3 月，宋美龄女士在川军 21 军代表邱丙乙陪同下乘“永游”、“民主”两只轮船从汉口出发，9 日上午抵丰，雇一乘小轿登山直达“天子殿”前。30 多岁的宋女士身着阴丹士林长旗袍，头盖黑纱巾，优雅大方地步入大殿中，来到天子娘娘神像前静静地默祷了很长时间。随后出殿来仁立于“望乡台”上眺望远方。

两个月后，蒋介石带着参谋团也来到了丰都。地方政府要给蒋公准备轿子，可蒋公谢绝了，健步上山而去。这可把瘾君子丰都县长孙醉白累得吭哧吭哧直喘粗气。蒋公观看了名山主要庙观，不时对历史事迹提些问

题，由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林梅荪一一回答。不知这个林梅荪怎么搞的，忽发奇想，竟大胆陈言，提议破除迷信，打掉泥菩萨办学堂。蒋公瞪了他一眼，他再也不敢开腔。林某也许对蒋公的家事知之甚少，蒋公是个孝子，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蒋公本人也是皈依了耶稣基督的。瞪这一眼，林某吓得差点进了鬼城地府！

仅仅过了13年，蒋公偕夫人离大陆竟一去不返。蒋公作古，夫人远走他乡异国。不知尚健在的蒋夫人还记不记得这段往事？

蒋公这一别不要紧，大陆和台湾就被“政令不符”阻隔了30多年。

紫浩坛的“广法天尊”金身已安座4年，不请来祖庙香火，紫浩坛如何进行开光大典呢！

紫浩坛为什么又偏偏选定丰都鬼城“天子殿”为他们的祖庙呢？传闻，他们曾请有巫术者“游梦”，还说，这位有巫术者根本不知道大陆有“丰都”这么个地方。可她在“游梦”中一锤定音：紫浩坛祖庙在丰都！

这种传闻只能是现代神话传说。按道教神系解释，“阴天子”“丰都大帝”是“道教七个级中第七级中心“神”，是道教的最高执法神。“广法天尊”应属“丰都大帝”的下属，自然，祖庙就是丰都“天子殿”了。

于是，紫浩坛坛主萧溥桢先生忙了起来，隆重地组成了进香委员会。他们盼哪盼，盼了四年，终于实现了来大陆朝拜祖庙、进香请火的愿望。

他们沿着平都山石级路，经过“奈何桥”、“鬼门关”来到了他们的祖庙“天子殿”。他们显得更加庄重虔诚，全体成员双膝跪在阴天子塑像前，王瑶宗先生代表全团善男信女，宣读《紫浩坛广法天尊祖庙进香吉祥文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其词切切，其意殷殷。

进香团的善男信女，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心理上也达到了最大的平衡。上可对列祖列宗，下可对紫浩坛众信徒和他们的子孙了。他们请回去

的“香火”，是神州大地上真正的圣火啊！

史载，紫浩坛的祖先们，于明朝初叶就迁移去了台湾，拓荒开垦，备受艰苦。但衍习汉族古礼宗式，祭天、祀地、敬奉神祇却代代相传不息。哪怕日本人占领台湾数十年后又相隔30多年，几近百年，但他们祖先的根是在大陆。海水隔不断骨肉情，时空分不开相思意！

这次，他们进香启程前，举行了隆重的启程欢送仪式。进香成功，代表团凯旋，信徒们举行了更为隆重的欢迎仪式，鞭炮震天，群情欢腾，紫浩坛的信徒们把沙鹿镇搞了个天翻地覆。

回台后，紫浩坛刊印了《丰都文事堂志》创刊号。王瑶先生在《丰都祖庙进香感言》中写道：“……这次祖庙进香意义深远，非比寻常，不能以民俗庙会而论，耿直启示拨晦见晴，惕醒领悟出善与恶之真理、忠孝节义之精华、功与果之真谛。……更须一提的是历史留存之古迹，在平都山曜灵殿展现无遗，令我深深感动，万分敬仰慕先贤的伟大，与民族之精华，及民间传统治世的严肃精灵真理……”

虽然信仰不尽相同，但丰都县政府人士热情款待了他们，这不仅是台湾同胞第一次组团来丰都观光，而且是来拜谒祖庙，意义重大，非同一般。

到底有什么重大意义？丰都人至今都还在品个中滋味。

## 法国华人老妈妈 离人世时的心愿

李远国，这位研究道教的专家，看上去只不过30多岁，别看他这么年轻，他的著作颇丰，已出版了数百万字的著作，曾出访日本、法国等国。

他曾两次来丰都考察，写了好几篇有关丰都鬼城的文章。从他谈话中

得知，他不仅对丰都大感兴趣，而且充满深情。

他带着朴实的笑容说：“你们丰都人没有更好地宣传自己，丰都道家文化渊源之深，峨眉山、泰山都望尘莫及，丰都的特色举世无双！”

他很激动地向我讲了下面这个动人故事，那是他出访法国时听到的一件真事。

法国有位华人老妈妈，她临终前就是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儿女们见母亲辞世前那痛苦的表情，人人心痛如绞，跪在母亲病榻前深情地问：“母亲，你老人家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心的，就向我们姐妹说吧！”

老妈妈睁开双眼，望着她的儿女们，他们都已成家立业，她似乎又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她向儿女们说：“我要一张丰都‘路引’……”

老人很虚弱了，声音很小，儿女们没有听得清。老人又重新说了一遍。

“丰都‘路引’？”儿女们没有听说过。因为他们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

儿女们为了满足母亲的最后心愿，连忙去华人社会了解，才知道“丰都路引”是张大约三尺长二尺宽的一张纸，上面印着很多木板刻印的汉字，盖有阴曹地府的官印。相当于外国人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护照”，或是我国人常说的“通行证”。

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丰都路引”，才看清那些汉字的内容包括：批谕神的官衔；持证人性名、籍贯、生或死的时间；正文有告诫沿途关津渡口验证放行，不得阻碍，违者受惩等语；发证年月；盖有阴天子印、城隍印、界官印（旧时丰都县政府大印）。

这种“路引”是过去来丰都朝山进香的香客必买之物，有的一买就是几张。他们有了这个“通行证”，死后去阴间就不会遇到麻烦，认为再转人世就保了险。

好在有复印机，儿女们蒙住原“路引”上的人名等，复印了一张，再填上老妈妈的姓名等等内容。他们拿到病榻前展示给老妈妈看，谁知，老妈妈眨了眨眼，艰难地摇了摇头，说：“不是真的，不起作用……”

这可把儿女们难住了，他们到哪儿去找没有填过姓名的正宗“丰都路引”呢？

不见真“路引”，老妈妈就是不闭眼怎么办？儿女们商量后，决定派人乘飞机去香港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香港找到了原版的丰都“路引”。代价虽高，可这是作儿女应尽的孝心啊！

还请法师为母亲作了法事，又连忙飞返法国。

老妈妈见儿女们如此尽孝道，弥

留之际显得很安祥。见了真“丰都路引”，她要求儿女们当着她的面焚化。接着老妈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才溘然逝去……

“这个故事听起来似乎有些……”李远国先生沉浸在一种意境里，一时没有找到一個很确切的词来表达，“可这是华人，在国外的华人的一片真情啊！在我看来，也是人的观念与意识的反映，折射着人类社会的一个精神侧面。”李远国继续说道：“丰都鬼城文化不仅仅只属于丰都、四川，它的影响源远流长，几千年来潜移默化，作为一种文化的基因，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时至今日，在全世界的华人社会中，丰都仍然具有中国其它名山无法取代的地位，成为这个地球上炎黄子孙崇祖爱国的一个凝聚

点。”

听了这些话，我沉思了很久。

鬼城文化在华人社会中为什么有如此深的影响呢？过去，华人大量劳工远走他乡，求衣求食，但对祖国的思念之情，梦牵魂绕，有多少海外赤子客死他乡，终生不得再见祖国母亲，只好寄情于宗教信仰。他们迷信死了要回国来丰都城报到的，我们何不理解为，他们离开人世后，也要魂归故里的爱国爱乡之情呢！中国人身上毕竟流的是中国人的血，祖国是他们的根，丰都是他们最后的归宿之地。

(责任编辑：仲文)



△ 谈判桌

## 重庆林园逸事

杨永革 范继河

四川重庆的林园，以她独特的风姿吸引着无数中外游人。

早年间，这儿乃是丛林滋生、荒蒿遍地，人烟罕至。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于11月26日下午抵达重庆办公。1940

年9月6日，国民党“明定重庆为陪都”。随着首脑机关迁入，各显贵大员也云集于此。1938年11月18日，蒋介石驱车来到这里，一见钟情，立刻建造“总裁官邸”。据分析，当时，日寇正对重庆实施轰炸。蒋介石选择这里修官邸主要考虑这里

群山起伏，树木葱郁，远离城市，东依成渝公路，西靠白市驿机场，交通方便且隐蔽。1939年夏，全部工程完毕，国府主席林森驾临致庆。在蒋介石亲伴漫游之时，林森对这里山水园景连声赞叹不已。蒋介石亦看出林森的爱慕之意，就“忍痛割爱”，将这座园林别墅送给了他。由于林森居住，官邸主楼就被称为“林森公馆”，这块园林之地，也就被称为“林园”了。

林森，福建闽侯人，字子超，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和国会非常会议副会长，1924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是国民党中最有威望的元老之一，1932年起任国民政府主席。这位一国之尊，却无实权，名义上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上司，蒋却不把林放在眼里，但表面上还得毕恭毕敬。这也是蒋介石为什么会把心爱的别墅送给林森的原因所在。

那时候，蒋介石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叫《新生活运动》。他要求行人、

车辆一律要靠道路的左侧行走，违者将受到惩罚。有谁知，正是这一奇特的规定，断送了林森的性命。

1943年5月12日清晨7时许，林森从林园坐车进城，准备接受加拿大驻华大使呈递国书。车到山洞九拐转弯处，不料迎面一辆美国军车驶来。两车司机同时紧急刹车。林森的副官张凤鸣和卫士立即跳下车，记下美国车车号，命令他们不得鲁莽，赶快离开。两车虽未相撞，但林森已是76岁高龄，被车急刹引起的猛烈震荡导致严重的脑溢血，在渝中外名医纷往治疗，但效果甚微，终于在1943年8月1日19时4分病逝于他的公馆一楼正房里。

在林森病重期间，我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曾前往林园林森官邸看望他，当面肯定了他对日态度强硬。为了确保林森在舒适、优雅、安静的环境里养病，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蒋介石命令把成渝公路从林森公馆附近（今林森墓前）改道石岗子东侧。

林森病逝第一天，国民政府把林森遗体先后安放在林园官邸大客厅、官邸大礼堂进行小殓和大殓。小殓时，林森遗体用白绸和黄绸裹了七层，身穿蓝袍、黑马褂，黑色丝织鞋袜等礼服，身上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参加小殓者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各院部首领，国民政府官员等。大殓时，也由蒋介石率国民党党、政、军副部长（次长）和重庆参政会代表等参加。11月7日，林森追悼会分别在林园和城内夫子池举行。1943年8月28日，国民政府决定修建林森墓。该墓解放以后被列为四川省一级保护文物。“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被一些群众连棺带尸全部烧掉，用雷管将墓炸平。1979年至1980年3月，林森墓修复。墓碑刻有“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之墓”，碑后有墓志铭，由国民党元老吴敬恒篆额，居正书丹，叶楚伦撰文。一些原国民党人士及林森亲属来到这里，看

见该墓如此完美，抚今忆昔，感慨万千。四号楼东侧的石岗子中部，树木葱郁、翠竹拥簇，小路隐现，怪石突起，一直径约93公分、高约90公分的混凝土圆桌，像一枚硕大的蘑菇，镶嵌在石涛之中。这便是当年毛泽东、蒋介石揭开著名的“重庆谈判”序幕的地方，人称“谈判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连续3次电邀中共主席毛泽东赴渝谈判。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由赫尔利、张治中陪同飞抵重庆。当晚8时，中共代表在林园参加蒋介石的招待宴会。会上，双方频频举杯致意。是夜，中共代表驻宿林园。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园中散步与蒋介石巧遇林荫深处的石圆桌旁。两人彼此请坐，谨慎商谈。当晚，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长时间交谈后和毛泽东仍宿林园。30日上午，两方代表继续在林园接触，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等实质问题。紧接着毛泽东主动登门拜访在园内西山坡居住的国民党重要人物戴季陶、陈立夫、于右任等，坦诚和意，向他们表明我党谈判意图。

10月10日谈判结束后，双方代表在市内上清寺桂园签署了著名的《双十协定》。签字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由蒋介石等陪同乘车直抵林园，参加告别宴会。是夜，中共代表仍住原处。11日上午8点半，中共代表由国民党军政部长陈诚以及张治中、张群等陪同，分乘三部小汽车离开林园到达九龙坡机场。9时45分，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登机飞往延安。林园的一号楼，又叫中正楼，因是蒋介石的住宅而得名。它建于1944年。中正楼在造型上采取了欧洲小洋楼和中国古代园林庙宇相结合的造型结构。楼上四周均有“散心走廊”，而且互不干扰，各在一边。色调上均为深黄、淡黄、浅黄几色相互照映，在一片绿林中，更觉醒目、雅观。从远处看，神秘莫测，走近再

观，顿生一种独傲群阁之感。

在中正楼的右侧，是美龄楼，是蒋介石专为宋美龄修的。楼上楼下均有通道，与中正楼类似。宋美龄不在时，该楼就作为蒋介石的“国宾招待所”。有时蒋经国也在此居住。1945年8月，毛泽东、王若飞等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于8月28日、29日和10月10日在该楼居住。毛泽东住底层东屋，王若飞住底层西屋，警卫科长龙飞虎和秘书陈龙住在底层会客室里的沙发上。

马歇尔公馆，也叫三号楼。原是蒋介石用于召开重要会议的地方。形体宽大，走廊回环，乳白色的墙壁，大红色的屋檐，青瓦盖顶、圆窗窥月，洋溢着古典美，大有世外桃源之韵味。当年周恩来同志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与部长陈诚亦在此办公。

194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渝下榻该楼，住楼上南端第一门。蒋介石与马歇尔的会谈就在楼上会议厅进行，会谈时，仅蒋介石的翻译就有6人之多。会谈后的记录都整理两次，最后以缮正本为准。

#### √ 作者在林森墓前留影



# 我爱《炎黄春秋》

## ——读刊一年札记

思 忖

《炎黄春秋》是一本我每期必读、读必终卷的刊物。我注意到，这并非我个人的偏爱。从文化水准一般的读者到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都同样受到《炎黄春秋》的吸引。对于每一个身上流淌着炎黄血脉的人来说，那些记颂中华民族历代英杰、描绘神州人文风貌、回顾民族发展历程、展示炎黄文化成果的选题，那些介绍炎黄子孙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伟大创造和各种风尚习俗、古迹名胜、服饰器皿、典章礼仪的文章，都是亲近的。加上多色多味的栏目设置，图文并茂的编排装帧，百花竞放、不拘一格、生动活泼、雅俗并存的文体，构成了它的惹人注目的丰富色彩和魅力，使每个读者都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需求和兴味的精神佳肴。难怪它在文化市场上有那么强的竞争力。

### 英杰谱令我热血沸腾

我深深被《炎黄春秋》吸引的，首先是《英杰谱》、《殒星篇》、《神州光》、《人海浪》、《时代风》、《同心结》、《赤子心》这些栏目，因为它们经常刊登的是我所敬佩崇拜的中华民族先哲后贤们的事迹，他们为振兴中华和人类进步事业所做出的每一项成就和贡献，都能使我热血沸腾，增强民族的自豪感，成为鞭策我努力工作加倍奉献的永不衰竭的动力。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编辑部选题时那种宏阔的视野、强烈的现代意识和面向最大多数读者的眼光，使我们能够读到一些在别处不容易见到的极其珍贵的文史资料。譬如，在现代中国政坛与学坛上享有很高声誉的爱国老人马相伯，如今年龄在60岁以下的中国人对他已非常陌生。《炎黄春秋》的一篇《百岁青年马相伯》，却拭去历史的尘埃，还原其人品、学问、才具、胆识、贡献的光辉，让我们了解在旧中国那种风雨如磐的恶劣环境下，马相伯怎样寻求改变国家的闭锁和落后，怎样希图改革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怎样创办震旦大学和复旦公学，怎样年逾九旬还在为全民族的团结御侮而奔走呼号，对于正处在新的发展机遇的炎黄子孙来说，马相伯难道不依然是鲜活的学习榜样吗？又譬如，五四运动曾造就了一大批声震中外名垂史

册的显赫人物，但其中也有贡献卓特而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像领头冲进赵家楼、点燃五四烈火第一根火柴的匡互生，就是一位被历史遗忘了的无名英雄。《五四英雄匡互生》把这位足踏实地埋头苦干而英年早逝的实干家的生平事迹公诸于世，可说是填补了现代史的缺页。凡是为我们民族的进步事业出过大力的人，历史终究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这就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千古英雄郑成功》、《震撼清王朝的第一枪》、《永不忘却的纪念》、《板门店的隐形巨人》、所记载的史迹，永远会受到后来者崇仰注目的缘故。

毛泽东是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发展方向和进程起了特别巨大作用的历史巨人。《炎黄春秋》创刊以来每一期都有一篇以上文章介绍这位巨人革命生涯中的一部分史迹。对于读者了解中国现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趋向是很有帮助的。李锐的《青年毛泽东的心路历程》，用精炼的语言、确凿的史料对毛泽东在早期革命实践活动中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如何从中国国情出发对外来文化进行重构整合，做了相当精辟的阐释。李锐的《毛泽东的老师与岳父——杨昌济》，田松发的《教毛泽东古文的“袁大胡子”》，则从师承关系上介绍了毛泽东怎样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吸收有益的养份。黄允升的《毛泽东结交绿林落脚井冈山记》和张素华的《三失兵权：毛泽东受屈》，记述毛泽东寻找不同于苏联十月革命方式的中国革命道路的一段特别艰险的历程。师哲的《毛泽东同“远方”秘密交往实录》，披露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共相互关系中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对于毛泽东始终坚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在党际和国际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等原则有很生动具体的描述。首次披露的汪东兴日记，记录了1965年5月下旬毛泽东上井冈山起居作息会见谈话，其中毛泽东关于38年前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回忆谈话堪称这段史实的最切近最权威的“第一手材料”。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们在探索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问题上的创造还很多，如第6期刊载的阴法唐的《邓小平与和平解放西藏》，就是从政治上正确处理民主改革与民族关系的光辉范例。至于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领导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所做的重要决策和建树，也许是《炎黄春秋》今后将陆续披露和研讨的选题，我相信这也是读者们翘首期待的。

毕竟当代读者最关心的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种种变革。《炎黄春秋》介绍的《京城大厦里白领小姐》怎样在“外企”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海峡两岸海员奏响“团圆交响曲”时是怎样的心态，“洋插队”的日子怎么过，都是人们感兴趣的。而王之任怎样由女八路成长为“长征三号”大型火箭总设计师，邓景阳博士怎样因太谷核不育研究荣获劳力士雄才伟略奖，姚美良怎样因发展实业与弘扬中华文化而进入《世界有成就的领先人物名人录》等，更是人们所倾慕的。总计创刊一年来介绍的有卓越成就的当代科学家、实业家、作家、艺术家已不下一百名。其中，集小说家、散文家、语言家、字典编纂家于一身，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著名学者林语堂，我是读了创刊号上刊载的他女儿林太乙的平易近人的叙述，才对他的经历、业绩、道德风貌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的。实业家吴庆星是怎样在家乡泉州市山边村创建集教育、科研、生产、商贸于一体的“仰恩工程”，怎样兴办我国第一座独资支撑的高等学府，我这个泉州人也是读了《赤子心》专栏才对这位“现代陈嘉庚”的事迹知道得较为翔实的。在众多介绍著名作家沈从文埋头文物研究三十余年的特写报告中，《英杰谱》专栏刊载的挚友胡戟的文章，是最能完满传达沈先生深山大泽般的学识蕴藏和豁达执著的人格力量的一篇。我所知道的当代海峡两岸的所有作家艺术家中，作品产量最丰富的大概应首推台湾青年漫画家蔡志忠，近20年来他已有300多本漫画书问世，印行数之多竟占台湾同期漫画书总印行量的3/4。同期书籍总印行量的1/9。他的古籍漫画系列在大陆累计已印行700万册。他的书还风靡香港、新加坡、泰国、美国、日本、马来西亚、南朝鲜等国家，以致现在世界上每天至少有15部机器在印蔡志忠的作品。《同心结》刊登的陈斌那篇《漫画家的非漫画之路》从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把他成功的奥秘——“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到能力的极致”——十分传神地传递出来。这其实也是所有对人类有重大贡献者获得成功共同秘诀。先后在《炎黄春秋》里做过介绍的郭沫若、巴金、冰心、夏衍、钱钟书、刘海粟、肖乾、于右任、陈诚、李立三、聂绀弩、沈醉、陈强、新风霞、李雪健、姚迪雄、三毛、谌容、施光南、姚美良、赵以雄、许戈辉等人，上自年届大耋之年的一代宗师，下至只有十多年的新星新秀，哪一个人的成功和奉献，不是做到能力的极至的呢？使我特别感触良深的是，中华民族历来不乏忠心报国、舍身求法的贤能俊杰，所缺乏的是充分保障尊重知识保护人才的制度措施。一遇执掌权柄者出点毛病，便有“长使英雄

泪沾襟”、“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之虞。倘使张学良不遭蒋介石幽禁几十年将多给民族伟业增添多少建树；倘使李大钊、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瞿秋白等烈士不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他们每个人将会有多少倍于已成的贡献。同样的或更使人痛心的是，如果张家口市委书记胡开明当年实事求是反映农村经济实况和提出包产到组的建议受到采纳而不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国家将会早富20年，如果王实味、聂绀弩、王方名、郭肇唐、李立三、师哲、田家英等众多学问家不因不白之冤而被剥夺几十年的宝贵年华乃至整个生命，他们都将为中国革命建设和诸多学术领域多做出多少出色的贡献。正因为有这样的感慨，我在阅读《少帅美国行》、《胡开明并非“胡”开明》、《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留苏幸存者的故事》、《秦城监狱里的6601号犯人》、《追思逻辑学家王方名》、《杂文大家聂绀弩的坎坷路》、《李立三轶事》、《嗜书爱字的田家英》等文章所记颂的主人公的奋斗史时，于格外崇敬怀念之余，也时常陷入对民族负面现象的深深思索之中。

## 也要注意逆现象逆存在

的确，世间万事万物都在矛盾统一的对立运动之中前进。一个民族的兴盛和进步，既要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表彰那些对民族做出重要奉献和牺牲的优秀人物，也要注意那些有害民族团结进步、使民族衰颓沉沦的逆现象逆存在，并给予深入的揭露和剖析，以唤起全民族革旧图新的热情。所以《天京事变始末》所写的农民革命队伍大分裂的惨剧，《百颗赃官头，一桩奇贪案》、《马关条约的签订内幕》、《奇耻大辱：克林德碑的由来和变迁》所写的清政府的腐败，《十里洋场的怪胎：杜月笙》所写的大流氓，《末代皇帝“寓居”天津始末》所写的复辟梦，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依然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何况历史已证明，任何先进的政党集团都不可能不犯错误，就象任何伟大的人物不可能没有缺点一样。在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能让康生这类祸国殃民的奸贼横行一时？是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反省的。社会生活中有黑暗丑恶的一面，是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们拒绝承认它而化为乌有。对黑暗丑恶采取熟视无睹、文过饰非的态度，只会姑息养奸，纵恶贻患；只有诊出真症候，才能引起疗救的注意。《炎黄春秋》作为一本以振兴中华为其宗旨的文史博物类刊物，真实性和现实性应当是它必须具备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品格。人们有理由要求它在披露一些真实的历史教训的同时，也注意揭露一些真实的现实的反面典型。直截了当地说，人们需要《我所知道的康生》、

《博物馆里的忧思和警报》、《台独之路行不通》这样的文章，对于提高善良人们的识辨能力，使公开和暗藏的坏人难售其奸，避免那些有害于民族的黑暗且恶的现象滋生蔓延来说，这是别的文章所无法取代的。

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这样的文章如此之少？即按毛泽东关于光明与黑暗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著名比喻来衡量，《炎黄春秋》也已经用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篇幅来记颂我们民族中那些值得骄傲的事物，剩下百分之零点一的篇幅来使某些污点劣迹曝光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做那么多的删节？这里以《我所知道的康生》这篇文章为例。延安的“抢救运动”我无幸参加，文革中的“清理阶级”我是亲身经历了的。那时我在福州军区政治部，从主任到各部部长、科长、干事中的三分之二人员都被打成“5.16”分子。基本方法是，把不是5.16分子的人送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边让被“打”者念贴在墙上的“最高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严禁逼供信。”一边即对被“打”者施行拳打脚踢，“车轮战”、“喷气式”、“群众专政”等，全然不要注意政策，严禁逼供信的“最高指示”放在眼里。供不出几个“5·16分子”的，便是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人被逼死逼疯还说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军区政治委员刘培善被逼得悬梁自尽后更有了“顺藤摸瓜大抓一小撮”的绝妙借口。我不知道康生与这场清查5.16的运动关系如何，但对照《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所记的“抢救运动”的基本做法，文革中除老谱的袭用外显然又有“创造性的发展”。如果康生的“抢救运动”的丑恶面目能早30年充分揭露，我想便不至于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规模这样惨痛的大悲剧。如果揭露黑暗面不曾被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抢救运动”的丑恶面目我估计早有人会揭露出来，引起全党警戒，这使我想一条并不深奥复杂的道理：不准人们揭露黑暗面并且屡次给讲真话的人加上“揭露黑暗面”的罪名，对黑暗的人物，黑暗的主张，黑暗的力量最有利，而正大光明的主张，正大光明的人是无需害怕揭露黑暗和面对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因为这是认识现实，改造现实，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前提。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真诚希望《炎黄春秋》今后在面对现实，针砭时弊上，思想更解放些，胆子更大些，以对加快改革开放发挥更大的助力。

## 有赖于编、撰、读共同努力

刊物的真实性品格有赖于编者、作者和读者共同努力。考虑到每个撰稿人观察事物的立场，角度和占有材料的不同，对于同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难免会有不同

的看法，刊物上出现了内容有某些错讹的文章也不算什么失面子的事情。重要的是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炎黄春秋》“大量删节”了《我所知道的康生》后，又发表了“被删节部分的补正”，发表了《郑超麟和中国托派》之后，又刊载了《郑超麟先生的更正》，发表了《蒋纬国的仕途与婚恋》之后，又刊登了《程英嘉先生的致本刊信》，就不失为一项兼听则明，减少错讹的补救措施。此外，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党派分亲疏，亲者不讳过、不溢美。疏者不隐功，不增丑，客观公正天然本色，都是确保真实性的重要条件，水静的《周恩来的另一个世界》、《老总教我种兰花》，尹家民的《黄镇和西柏坡的领袖们》因写出伟人身上的普通人的情怀而使人倍感亲切。朱亮的《陈立夫惠书大陆丹阳》就这位92岁高龄的国民党元老多次题词褒扬正则绣的发明者，浙江丹阳爱国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吕凤子先生一事，对陈立夫先生的有益举动给予热情的表彰，也堪称两岸同胞共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一段佳话。

《神州光》、《九州景》、《文荟园》也是我很爱读的栏目，王兆麟的《三秦大地文物荟萃》，刘宏伟的《文房二题》，刘作忠的《叶公超护国宝》，孙振宇的《闽南土圆楼》，叶大宾的《温州三灯》，陶立璠的《花桥凉亭石板路，侗山侗水侗乡情》都写得短小活泼，生趣盎然，《炎黄春秋》作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刊物，我希望能增加介绍炎黄文化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的文章，包括文史博物类的出版信息、书评、文摘，每一期都能有一两篇比较有深度的论述炎黄文化的专题文章。就前6期论，《李瑞环等谈中华炎黄文化》，李政道的《辉煌的历史，光明的未来》，肖克的《在闽台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唐文权的《人口忧思百年录》：常征的《汉族与支那、华夏、中华民族》，姜国柱的《孔夫子悠然走向世界》，韩素音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的未来》都是很扎实的。希望今后在扩大信息量的基础上，能更增强些理论色彩和学术深度。

《炎黄春秋》创刊才一年，它已发表了多少篇有影响的文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一份以硕大无朋的炎黄文化为本体对象的刊物，它的选题丰富无比，永远不会枯竭。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团结中外炎黄子孙，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是它的基本宗旨，爱国主义是它的神圣旗帜，民族大义是它的共同语词。所以它能获得别的刊物不能比拟的庞大的读者队伍和作者队伍最有效力的支持，加上它的主办者编辑者有很高的责任心和工作热情，愈办愈好将是它的必然趋势，对此我坚信不疑。



# 张灵甫 死之谜

张凤笋

国民党师长张灵甫之死，40多年来，竟在海峡两岸引起团团迷雾。本篇是用第一手材料写成。广大读者将从中判断这段历史的正误。

经过激战，七十四师被压到以孟良崮为中心的几座大山。弹药已经不多，又缺水，连机枪都不响了。整个大山全是大石头。无法挖工事，炮弹打到石头上，弹片和碎石全都伤人，山沟里积尸累累。

包围七十四师的十几万人处境也十分危急，几十万敌军的大包围网快要合拢了。现在，到了决战阶段！

华野六纵司令员皮定均和何凤山举起望远镜。孟良崮，一座奇峰霎时推近了。所谓“崮”即是有着蘑菇状山顶的大石。皮定均说：“你的第一步，打下孟良崮底下那个山头，有个立足点。第二步，从那里往上打，这会很困难。最后打到山顶，直捣七十四师指挥所，活捉张灵甫。”

何凤山的六纵特务团多是技术兵种，只有一个警卫营、三个连。何凤山带上警卫营，首先占领了孟良崮山脚下的小山包。从那里仰攻。山光秃且陡峻，部队运动缓慢，敌人的侧射火力很强，为了减少伤亡，他采取前轻后重的战术。所谓“前轻后重”，是前面放小部队，迫使敌人火力点暴露，然后再去消灭它。这样虽然时间稍长，但能保证白天进攻，又不削弱战斗力。

戎马数十年的张灵甫，此时此刻

他还召开了军事会议，《孟良崮》一书记载说：

指挥所在炮弹惨叫的声响中还召开着最后军事会议，会议是异常的紧张、严肃。指挥所里有师长张灵甫将军、副师长蔡仁杰将军、五八旅旅长卢醒将军、五七旅旅长陈嘘雪将军，参谋长魏振铎将军、副参谋长李远良将军……经过一小时会议后，研讨作战失败原因。互相痛哭流涕。泣血锥心的呼吁，接着还进行着最后的成仁殉国的紧急会报，个个抱定成仁之决心，誓愿自裁殉国，决定刘参谋处长立梓为成仁殉国的最后执行者。同时，刘参谋处长在会议中更承受了师长的谕命，通令各级官长至临难时一律自裁殉国。

会议结束后，师长便立刻拟具电文发给主席，电文是这样写着，但终没有发出去。

主席蒋钧鉴：被围六昼夜，仅负伤高级将领及卫士且粮尽弹竭援军不至，匪军

已有九个纵队（二十七个师）重围且继续驰援来犯，今职等誓愿成仁殉国，恳祈赐予家属抚恤以终。

以上这段文字，据说是被俘虏的一个发报机电讯员获释后为《孟良崮》一书提供的材料。

《孟良崮》一书中还影印着张灵甫给他妻子的绝命书：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捷，决以最后之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灵甫绝笔，五月十六日孟良崮。

这份绝命书，字迹工整，魏碑体，颇具书法功力。据说也是获释的俘虏带回去的。

张灵甫决心杀身成仁的消息，皮定均从电台上收到了。张灵甫和二十五师参谋长有如下对话：

“我们决心成仁了……成仁了，请转总部！”

“我们师长在前面督战，快解你们围了，界碑快拿下了，快拿下了。”

“两小时之内，你们能替我们解

围。本师全体官兵向贵师致敬……”

何凤山已经快接近山顶。这时，他把战斗队形由“前轻后重”变为“前重后轻”。这是最后一锤子。

偏偏这个节骨眼上，从崮顶冲下一支队伍，与特务团混在一起了。一直目送特务团上崮的皮定均忙把望远镜交给警卫员：“你来看怎么回事。”警卫员接过望远镜，看了一会，报告：“特务团把俘虏押下来了！”

这股俘虏里，有七十四师参谋长魏振铎。魏振铎告诉何凤山，张灵甫在山洞里。

蘑菇状的崮顶，给他造成很大困难。他组织战士搭人梯，从战士的双肩上开辟通向最后胜利的道路。

皮定均又从警卫员手里接过望远镜。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与峭壁齐高的人梯。一个战士上去了！又一个战士上去了！他背后的电台又响起张灵甫的声音：

“南京，蒋先生！”

“你是谁？”这是蒋介石的浙江口音。

“我是张灵甫。黄百韬不援助我，七军不援助我，我已到了尽忠报国的时候。”

在指挥所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张灵甫与蒋介石最后的对话。报话机沉默了。

就在这个时候副师长蔡仁杰、五十八旅旅长卢醒拿出老婆孩子的照片，相向而哭，不肯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颅扳动板机。七十四师副参谋长李运良向洞口跑去，在洞口向腮帮子上擦着皮打了一枪，弄得满脸血污，横在洞口装死。但经过这样一闹，大都不想死。而且，集体成仁的机会已经失去，洞外的手榴弹、子弹已经打进山洞。

“你们不要打了，我们师长都被你们打死了！”洞里喊话的是发报机电讯员。

枪声停了。但继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声响！忽然之间阴云四布，暴雨骤至，万窍怒号，山？欲裂。这是百年

不遇的暴风雨。

对于这场暴风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

国民党人说：“此时忽天云惨暗，狂风走石，雨雹骤降，若为我师忠贞不屈，全部惨烈激昂之战斗牺牲同悲泣者，上天垂象斯亦异矣。”

老百姓不这样看。多年以后，沂蒙山人还在谈论那场暴风雨。认为那场暴风雨是天意！倘若暴风雨提前几天降临，七十四师不致断水，不致机枪打不响。

何凤山没有进洞。进洞的是三连指导员。

“这是我们师长。”发报机电讯员指着一具尸体说。

那具尸体俯卧在电台旁边。电台架在折叠桌上。战士翻转过尸体。取下胸符。上写中将张灵甫。张灵甫左腕戴着手表。还在滴滴答答地走，指明是五点零二分。

至此，震惊中外的一场大战结束了。

蒋介石没有想到他的御林军会这样快被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这实在出乎他的预料。

毛泽东也没有想到！

蒋介石痛心疾首。说了这样几句话：“若其不惜牺牲一己。以策全局之安危，牺牲本军，以赴友军之急难，而确能致死不屈，舍身取义，为我陆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全体官兵，在最近鲁南一役之壮烈殉职者，实为国军剿匪以来，最悲壮光辉之史诗。”

何凤山结束山洞里的战斗，在暴风雨中下山时，遇到纵队的一位参谋，叫他把张灵甫送到司令部去，何凤山给闹楞了。“谁说把张灵甫抓住了？”“七十四师参谋长魏振铎。”何凤山没有机会与魏振铎对质，弄清此翁何以说他活捉了张灵甫。只能做这样的推测：魏振铎对张灵甫的集体成仁并不相信，认为结果自然是与他的命运一样。过了好几年，何凤山到高等军事学院学习，老师中便有他在孟良崮战役中俘虏的魏振铎和在豫东战役

中俘虏的区寿年。他心里极不舒服。说哪有败军之将当胜利之师老师的道理呢？同样也当学生的皮定均批评了他，说，这种师生关系也是世上一种规律。那时，何凤山自然更不好和教官争辩孟良崮战役的陈年旧事。总之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何凤山枪毙了已经投降的张灵甫。甚至凿凿有据地说是在下山时从背后开的枪。所以那子弹是从后脑打进从下颞射出。弹迹是顺着山势斜着向下的。伤口确实如此。但最后一个看到张灵甫尸体倒在石洞里的人证实这是杜撰的，此人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洪家德将军，洪家德无意中向笔者扯起孟良崮的山洞。当时，他是华东野战军机关排级干部。枪炮刚停，他忒忒地跑到山洞里看光景。他看到折叠桌子旁边一块石头上卧着一具尸体，一个战士告诉他，这是张灵甫。雷电闪烁中，他发现尸体旁边有个发亮的东西。拣起来一看，是颗红色半透明的图章，上面刻的字他看不懂。他顺手装在口袋里。几天后，他请一位刻字先生为他刻印。刻字先生说这是一方十分珍贵的图章。梅花篆字，是张灵甫的私章。刻字先生劝他不要磨掉。妥为保存，摇头晃脑地说这是一件宝贝。洪家德那时哪里会懂得它的价值呢？硬要刻字先生磨去篆字，刻上自己的名字，进军福建时，这颗图章随着后运物资一起翻进闽北山沟里。张灵甫的印是失落了。但拾印者却证实了他战死在山洞里，证实了他倒下后的位置和姿式。最权威的历史见证是七十四师随参谋杨占春。杨占春目击了在山洞里发生的一切：杀身成仁会议、蔡仁杰和卢醒对着老婆孩子照片不肯自裁、李运良的假自杀以及最后张杨卢等人的被击毙。

应该说，皮定均选择的攻击路线为六纵队特务团争得了消灭七十四师指挥部、击毙张灵甫这份特殊荣誉。皮定均从战士当起。经历了从连长到军长的每一个台阶，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有着独具的慧眼。一直到今

天，何凤山还清晰地记得，皮定均向他下达进攻命令时肩头挨着肩头望远镜靠着望远镜的画面。

狂风暴雨中，野战军主力带着七十四师精良的美械装备。押着二万俘虏，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浩浩荡荡的队伍里有一副担架，抬的是张灵甫的尸体。抬担架的是特务团的几个战士。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走起来腿杆子格外有劲。他们一气走了两天，到了沂水县一个叫野猪旺的村庄。担架放下了，抬了两天，那尸体已经有点味了，经向上面请示，决定把张灵甫埋在野猪旺的村边上。

皮定均遵照上级指示，要政治部买一口好棺材，给张灵甫穿上新军装。找不到国民党的将军服。就穿解放军的服装。要把他的脸擦洗得干干净净。战死沙场的将军，应该得到一个军人的荣誉。政治部照办了。

掩埋张灵甫以前，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向皮定均请示一件事：六纵队俘虏的一个少将旅长和八个上校要求最后看一眼他们的师长张灵甫。皮定均觉得，他们跟着张灵甫出生入死。现在都当了俘虏了，还要看看他的遗容，这种感情是难能可贵的。他同意了。

这个场面，是谢胜坤主持的。皮定均也到了现场。

一棵古老的松树下，没有挖坑。放着一口半人高的大棺材。棺材是从一个地主家里买来的，花了400元钱的大价，十分华贵。棺材旁边停放着张灵甫尸体，已经为他穿好簇新的军装，洗过脸，额部位的伤口也整饰过了。张灵甫身材高大，四方脸，眉毛很重，颇有一派将军相貌。相形之下，担架显得小了点。九个将校走到担架旁边，围成半月形，跪下，全都哭了。风从松树梢头刮过去，发出呜呜的响声，伴着压着嗓子的哭泣。皮定均和谢胜坤默默地看着他们沉痛地哀悼。他们哭了一会，收住眼泪，站

起来。

皮定均说话了。

“这就是你们师长的下场……。他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说要三个月消灭共产党。他一路追我们，从淮阴到涟水，从涟水到山东。结果，被消灭的不是我们，是七十四师，是张灵甫本人。你们师长如此下场，是什么原因？”说到这里，皮定均把话稍稍一顿。

此时此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确实发人深省。张灵甫在战死前也曾提出这个问题。眼前站着九个将校中就有人经历了那个会议。五大主力中的主力整编七十四师。赫赫有名的张灵甫，在抗日战争中为挽救民族危亡曾打了那么多好仗，突然之间在孟良崮之巔殒灭，那原因可以列出许多条。

蒋介石不会打仗，这是国民党撤到台湾以后，人们说的一句埋怨话。不尽然。东征、北伐、抗日战争后期的确曾叱咤风云，只是当他把矛头对着共产党时，他才显得捉襟见肘。

是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玩忽职守。故意暴露七十四师右翼，造成七十四师被围？当然这是事实。事后不久，李天霞被撤职押解徐州“剿总”军法处审判，他花了几十根金条得以解脱，但后来到了台湾，据说又把他抓起来，还在追究他在孟良崮战役中的渎职。不过，即使李天霞不故意暴露七十四师的右翼，就能保住张灵甫不被包围吗？张灵甫的左翼整编二十五师倒是十分卖力，二十五师师长亲自到第一线督战。但还是被隔断了。

是张灵甫轻敌冒进，这当然也对，张灵甫占领两淮后致友人的书信云：“我孤军深入匪区，扫荡数百里，血战淮阴，耀兵淮安，匪巢既破，匪胆已寒，国军苟能乘胜长驱，则立马中原，直捣延安，可计日而待也。”他十分欣赏“孤军深入”“乘胜长驱”。他那时就为自己钉上了第一颗棺材钉。

这次，他“深入”了仅仅几公里，就被紧紧抓住，再也缩不回去。

……所有这些原因，这九个成为俘虏的将校都有切肤的感受。但皮定均没有谈这些。

“你们应该记取。”皮定均说道。“我们是代表人民的。”皮定均用手往旁边一指：“你们看，我们的民工有多少哇！”

乡间土路上，民工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抬伤员，运战利品，一个个走起来很有精神。

“你们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跑光。你们为扫清射界拆毁民房。你们拿老百姓的门板做工事。你们走到哪里就把哪里搞得不像个样子。”

眼前这幅图景，雄辩地说明了皮定均所说的道理。九个俘虏全都连连称“是”。皮定均接着说：“你们的出路有两条：一条是回去，到蒋介石那里，再反共，一条，留在解放区。”

这九个将校，真如皮定均所说，有的走了，有的留下了。但七十四师的广大士兵，基本上补进解放军部队。纵队机关有一个排，大部成员来自七十四师。后来经略中原，这个排为农村工作队担任警卫，被800还乡团包围，30人的小队伍激战一天，最终把还乡团打跑了。当这个排归队时，皮定均和谢胜坤一起去看望他们。

棺材盖打开了。里边铺着军被。两个战士把张灵甫的尸体放在棺材里。松树下很快出现一座半间房高的坟。坟前树起一起块木牌。上写：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将军之墓。尾追的国民党军队很快就要到达这里，会把张灵甫的尸体运走的。果不其然。两年后打下石头城，皮定均漫步玄武湖畔。看到一座高冢，墓碑上刻着同样的文字。

(责任编辑：刘家驹)

# “黄埔同学会”

## 在延安

邵文彬

1941年6月，在革命圣地延安诞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延安黄埔同学会。

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皖南事变后，使内战和投降的危机空前加重。为了有效地贯彻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积极开展团结友军的工作。

当时，仅出身于国民党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原黄埔军校）及其分校在延安工作和学习的即有近百人，分散在敌后各军区工作的人数更多。至于出身于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以及四川、云南各地方军队的军官学校的人数，合计起来就更多了。这确是一支可以将党的政策在友军中宣传贯彻的巨大力量。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延安黄埔同学会便于1941年6月黄埔军校建校日前夕，经徐向前、陶铸、郭化若等同志进行筹备后，在延安北门外中央军委总政部军人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参加成立大会的来宾中，有当年的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黄埔军校队长陈奇涵，以及国民党军令部驻八路军总部联络参谋、黄埔校友陈宏谟，中共中央统战部代表刘澜波，总政治部代表胡耀邦、肖向荣、八路军留守兵团代表曹里怀、莫文骅等。出席大会的校友有徐向前、陶铸、郭化若、周士第、许光达、宋时轮、陈伯钧、李逸民、吴溉之、曾涌泉、黄霖、常乾坤、张学思、王智、贾克等近百人。会议由郭化若同志主持。徐向前同志报告成立延安黄埔同学会的意义、任务、同学会筹备经过及由筹备会议提出的同学会、理事会理事和学会秘书等候选人名单，请大会审议，最后进行表决。随即请叶剑英同志讲话。叶剑英讲了建校校史，建校时

间、地点、校名、校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等主要领导是谁，以及开办经费、武器来源，并列出了第五期学生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中的重要将领的名字，指出在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中黄埔同学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卓越贡献。也指出在1927年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武装反共后黄埔同学在相当长时期被分成敌对的两个方面，形同水火，令人痛心。叶剑英说：“延安黄埔同学会的成立，标志着在国共两方部队中工作的黄埔校友，又有一座友谊交往大桥。衷心希望通过这座大桥，两方众多校友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抗战到底，抗日战争一定能最后胜利。”

在叶剑英同志讲话后，会议主持人随即请军令部驻八军总部联络参谋、黄埔校友陈宏谟少将讲话，他表示愿意把今天的盛况向重庆的黄埔同学会报告，愿意今后在两会之间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加强两边校友和同学会的联系。

相继在会上讲话的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代表刘澜波，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埔校友陶铸。

讲话后，大会进行同学会理事和秘书的选举，选出了理事成员和以徐向前、郭化若为延安黄埔同学会正副理事长，邵文彬为同学会秘书。

延安黄埔同学会成立后，重庆黄埔同学会发来贺信祝贺。

同学会在徐向前、郭化若同志领导和校友们的支持关心下积极开展工作。组织他们向全国各友军与自己有一定关系的校友开展交朋友活动，着重宣传我党的政策，做好团结抗战工作。

到了1943年，美军观察组进驻学会地址军人俱乐部。延安黄埔同学会至此遂中止活动。

# 震惊台湾的

# 麦当劳爆炸案始末

崔绍珍  
于祖范



△累犯陈希杰、潘哲明落网

台北市的麦当劳速食店总公司，生意兴隆，在台湾一直独领风骚，短短几年，就从资本额 100 万元美金发展到目前的年营业额 40 亿台币。

1992 年 4 月 28 日 12 时 10 分，公司总机台上的蜂鸣器响起。总机小姐甜甜地：“您好！请要哪里？”“告诉你们经理，我已在你们公司分店里安放了炸弹，请准备好 600 万元现钞。”粗暴的恫吓之后，未等小姐回话，便挂掉了电话。

40 分钟后，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话筒里传来的又是那个男性的声音，“炸弹我真已放好，详情见地下室停车场放置的一只康贝特内的纸条，

如不马上照付 600 万元，放在麦当劳分店的一枚威力很强的炸弹很快就会引爆！”看来不像是开玩笑了，预感情况严重的速食店总公司，迅即向辖区内台北市警向大安分局报了案。

大安分局接报后，局长马上派员前往该公司的地下室勘察，果不其然，这里真有一只康贝特饮料瓶，瓶内确有纸条。纸条上用电脑打出的是：目的很简单，我们要台币 600 万元（千元旧钞），一文也不能少，今晚 10 点前将钱用布质面粉袋装妥，10 点到 12 点我们会以同样方法通知你们如何交钱。

切记：“第一，一人前往交易。第二，每一步都必顺按照我们指定的时限完成；第三，一路上不得有任何异样。以上若不能完全配合，则取消交易，决不折扣，届时现有炸弹对你们造成之伤害将由你们自行承担，而且以后我们将加倍索款及采取更激烈之手段。是否该让警方介入，你们自己衡量。若顺利于时限内完成交易，我们会在 20 分钟内告诉你们各炸弹的位置及如何安全拆除。”

在另一张纸条上，则注明他们在麦当劳几个分店已安放了 6 枚炸弹，其中两枚是定时炸弹，4 枚为水银开

▽台湾警方在引爆前先管制交通



关炸弹，线条上还特别提及：“在麦当劳男厕所的天花板上已放一颗水银开关炸弹，千万不要动，除非有我指示。在松仁路世贸大楼的电线杆附近有一颗，无电源，警方可前往拆拿，就知不是假的。”

刑事警察局特殊处理第一队的防爆组台北组组长李东平，率组赶到民生店男厕现场。在天花板内侧，果然发现了一个高约35公分的茶叶罐，上面写有“勿动炸弹”。

经研究，此物确实是水银炸弹，该店马上暂停营业，紧急疏散客人及职员。现场封锁后，防爆人员开始除爆作业。身穿防爆衣，头戴防爆头盔面罩的杨季章说，厕所内太窄，你们先退出去，我上去先用绳宗套住它再拉开。”李东平与另外的两名警员撤出“禁区”。晚7点5分，杨季章爬上天花板，准备把炸弹移到防爆筒内，谁知，他伸手刚刚接触到茶叶罐，就发生“轰”的一声巨响，霎时，整个民生店内烟雾弥漫，从梯子上摔下来的杨季章双手两腕部被炸断，鲜血满身，再也没有睁开双眼。

防爆衣不防爆，莫非是冒牌货，据说是花费巨大外汇购置美国杜邦厂家生产的世界名牌货，它的防弹纤维耐震力应是钢的5倍，5月1日某美国厂商致电台湾刑事警察局，检举杨季章所穿戴的防爆盔罩是冒牌货。早就传闻警方在购买防弹衣有作弊之嫌，这次一位立法委员，要求警方尽快说明采购防爆衣的实情是否确有，“人谋不减。”

民生店发生爆炸后，当日深夜警方人员在北市松红路东北角一电线杆旁的草丛中发现了同样是用茶叶罐装的爆炸物，并发现了一勒索信函：“今天晚上10时前，若未备妥600万元，将执行极端报复。”

按歹徒所言，6颗炸弹当中的2颗已知下落，其余4颗至今不知在何处，据分析，另外4颗可能也在麦当劳下属的分店里，于是麦当劳总公司于4月29日下午通知所有分店全

面进行安全检查。

下午2时许，台北县永和麦当劳分店二楼厕所的天花板上发现了又一个“茶叶罐”。大概是该店的人员还不知道这“茶叶罐”的厉害，两名店员竟像戳鸟窝一样用一根长竹竿去拨弄它，岂料刚一接触即发生爆炸，两人都被炸成重伤倒地，另外两名在店里就餐的幼童也受轻伤。

40分钟后，麦当劳在林森北路的分店，一女服务员在二楼男厕所的天花板上也发现了“茶叶罐”。对这个“茶叶罐”不但该店的店员不敢触碰它，而且防爆人员也不敢轻视。

中心分局20多名警员在正副局长的率领下赶赴现场，吃过苦头的防爆人员如临大敌，处处小心，连清除炸弹的“机器人”也用防爆车载至现场，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勘察研究，最后决定使用安全系数较大的“水炮引爆”法，即防爆人员保持在安全距离上，先用强大的水柱把茶叶罐冲倒，然后再用水冲罐子引爆，数辆消防车，救护车全赶到现场定位待命，分店周围已实行戒严，一切准备就绪后，于下午6时15分，开始用水炮引爆，几秒钟后，这个茶叶罐被引爆成功。

虽说这个茶叶罐是消除了，但尚有2颗仍不知下落，为了店员和顾客的生命安全，4月29日下午4时，麦当劳总公司董事长孙大伟不得不宣布，台湾地区57家麦当劳汉堡店全部停止营业。

以往歹徒布置的炸弹大都是以鞭炮火药为主的土制品，而这次炸弹则是以火箭推进器助燃剂与氢化剂，看来这个歹徒不是等闲之辈，至少是个具有化工专业知识者，刑事警察局鉴识科化学组的警员经连夜对未爆炸茶叶罐，进行拆卸分解研究后发现，每颗炸弹上都有外接线，经验不足的防爆人员在拆卸时，往往会误认为只要剪断电线就可化险为夷，其实这是歹徒用险恶企图在误导防爆人员。

炸弹一颗颗爆炸，致使一些人一

见“茶叶罐”就惊恐万状。为此引起了台湾各界人士的震惊和议论。

对近几年来台湾治安不断恶化表示极大不满的台湾政大社会系谢高桥教授说，台湾的勒索恐吓案件，自1980年以来，破案率一直下降，间接地助长了冒险犯罪之风，其次，台湾虽然号称低失业率，但是一项被忽略的事实是——15岁至29岁的年轻人，失业人口中最大比例，这批失学又失业的年轻人在做什么却很少有人去研究，而根据资料，在台湾此一年令层的所得偏低，一旦他们想花钱却又没钱花时，犯罪之路就很难避免。

此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社会各阶层都在谈钱，用钱解决问题，连政治，政党都一样。这种情况下，金钱成为第一理性，慢慢腐蚀了“法”与“情”。以往恐吓勒索行为已经存在，有些用钱就解决了，现在一旦无法得逞，很可能就采用更激烈的手段，例如利用爆炸物等，犯罪手段自然升高。

对防爆人员专业知识不熟表示忧虑的台湾中央警官学校李震山教授说，从这次拆除人员不幸罹难来看，警政署的防爆专业知识实在有待加强，无论是设备及人员素质都严重不足，例如这次就是因为机器人无法进入天花板，而使得拆除人员必须以身试险而不幸罹难，因此，未来警政署除了应添购设备以克服种种技术问题外，警方更应该跳脱本位主义，积极向军方爆破专家学习观摩。

对爆炸案的动因似乎与政治有关，而且很可能与台湾的301条有关。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张黎驹报道说，4月29日晚8时50分许，一名声音与28日打电话到麦当劳总公司的歹徒极为相似的男子，打电话给本报请转告庄亨岱，如果美国一天不停止301条款，爆炸案将不断上演，明天不停止301条款，就要炸另一家“连锁店”。随即挂断电话。

对于此次爆炸案，不但引起台湾



社会的广泛震惊，而且也引起了台行政院的重视。4月29日下午，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召集有关人员听取了报告，并指示警方要设法尽快破案。同时新闻局局长也呼吁人们积极配合警方尽快缉拿罪犯。警政署署长庄亨岱召集了408专案组人员训话，誓言动用一切警力破案。同时，警政署发布了检举破案奖金为1000万元新台币，麦当劳公司也悬赏1200万元，三者相加高达2700万元新台币。

爆炸案发后的第七天——5月4日凌晨一时许，一名秘密知情人乘夜色只身悄悄来到了刑事警察局。

据了解，家住中和景平路681巷1号3楼的陈希杰，就是麦当劳爆炸案中的罪魁——。

专案人员立即着手调出了陈希杰的档案资料，核对其指纹，

结果出来了，与警方采自歹徒所留在恫吓信上的两枚指纹完全吻合，数日一直处于紧张之中的专案人员，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陈希杰，1985年加入海军，服役于舰艇，退伍后曾是幸慧贸易公司北区业务经理，目前无职业，最近偶而替人卖卖茶叶。

将陈列为重嫌之后，专案人员在探知陈正躲在家中，马上于5月4日上午派员到陈住处外对其进行监控。

下午2时许，专案人员对陈宅包围部署完毕，即敲门欲进门进行搜索，但房主则以警方无搜查证而据绝开门，双方僵持达半小时后，台北地检署的检查官赶到现场，才开门进行搜索，但搜遍房间的所有角落也未见陈的踪影，只有陈母，陈弟及菲律宾的女友罗莎。

煮熟的鸭子怎么飞了？原来在警方敲门行动前，曾有一电信局的便衣

收费员，去按陈宅的门铃，早就如坐针毡，草木皆兵的陈希杰，一听铃响误以为是警方在行动，便慌忙从其母卧室与邻居家打通的洞隙中钻出而逃，致使埋伏的警方竟一无所知。

失算的警方在这里虽然没有查获任何重大证据，但在另一处却发现了陈制作炸弹的工作室，并在现场搜查到了火药，茶叶罐及一些化学方面的书籍。

搜查完毕后，专案人员一方面将陈弟及其女友带回作临检查证讯问，一方面对陈用传真发布了通缉令，尤其是根据陈在1989年曾4次赴菲律宾的背景，为严防其潜逃出境，警方在机场作了严密布网。

哪知，一家麦当劳分店，竟然还有恫吓电话响起。

5月4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位于台北忠孝东四段的一家麦当劳分店忽然接到一恫吓电话，此店被安放一枚爆炸物。

已患炸弹恐惧症的店员，接获电话后不假思索地便立即告知店内的警察及保安人员。这爆炸物会不会又是在男厕所的天花板处，但没有搜查，警方便在店内进行地毯式的全面检查，仍无所获。

这个恫吓电话很可能是个凑热闹的恶作剧。不但警方这样判断，而且麦当劳总公司在刚开始就怀疑在实行如此严密的安全措施下，继续有人安放炸弹的可能性很小，但又不敢存有任何侥幸心理，检查一遍后虽未发现异样，但仍不放心，3时左右，又进行了第二次搜查，仍未发现情况，才以虚惊一场而松了口气。

据侦察，1991年8月间，与陈一起承揽松山机场工程的潘哲明有掩护包庇陈之嫌，随后专案小组对其进

行全天候的监控，同时声东出西制造假像迷惑陈、潘放松警觉，明知潘驾驶的计程车是蓝色的，警方对外界却透露，陈有一朋友可能会驾驶一白色福特车去接应他；据分析可能会藏匿在新店山区，但电视台，广播电台却报道称警方正在桃园地区组织围捕。

5月15日下午，监控人员发现潘哲明驾驶租来的一蓝色计程车，在新店市区兜了一个大圈子后，向永店山区方向驶去，由于途中有一地段地窄人稀，开车跟踪极易暴露身份，所以跟踪警员当机立断，爬到一民宅五楼上，从高处用望远镜进行监视。

狡猾的狐狸难斗好猎手，自以为行动诡秘的陈、潘两人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的一举一动，已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之中。

潘哲明于下午5时驾车入山，将陈弄上车后座后用几张大报纸盖死，然后急速驶出山区，驶至中和景平路家门口一连绕了四圈，自以为没有跟踪者时才停下，两人慌忙钻入家中。

警方调兵遣将，经过一番精心组织，于5月16日凌晨50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撬开潘哲明的家门，直冲房内，将睡眼惺忪的陈，潘两人双双逮捕。

经过审讯，使警方人员大惑不解的是，这两个被警方起初高看一筹的“具有化工知识的专业人员”。原来是制造这次安放的几枚炸弹，才现学现卖的“门外汉”。

台湾麦当劳爆炸案之所以能迅速破案，2700万元台币的巨额赏金之作用不能小视，从1984年开始，台湾警方多次使用“治乱世，用重赏”的古老办法，先后数次悬赏通缉要犯，大多数案子都很快破获。

# 龚自珍兴王论中的改革观

## ——纪念龚自珍诞生 200 周年

郑超麟

本文为 92 高龄的郑超麟先生为本刊写的，年届 88 的老作家兼编辑家楼适夷先生又亲自为其校订编改。两位老人对本刊如此支持，反映了他们对广大读者的拳拳之心，我们谨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与谢意。——编者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的序言中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近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

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近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武嬉。这一切情况是容易被清朝中叶的明眼人看到的，在此情势下，士大夫中的敏感而有责任心的人很容易想到改朝换代。特别是世代官家子弟，生来聪明而好学的，容易产生这个思想。中国的士大夫有一种传统的思想，喜欢做“王者师”，辅佐君主打江山或为新朝订立新制度。如汉朝的萧何、曹参，唐朝的房玄龄、杜如晦，明朝的刘基、宋濂，等等。

作者近影

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近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我们中国从“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开端”比欧洲晚了几个世纪，人家发生在 14 世纪，我们发生在 19 世纪。但在我们自己的“过渡”时期中，也出现了一个大人物，他就是诞生于 1792 年的龚自珍。

中国这一类知识分子，从来不敢想自己做新朝的君主，只要做王佐。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不是要自创新朝以取代周朝。只是要辅佐齐王，将分立的战国统一起来。当时“无土不王”的思想深入人心，那些游说之士是不敢想自己做王的。周室正值衰微，游说之士可以公开宣传“兴王思想”。后世就不同了，旧朝尚有势力时，“兴王思想”是不能暴露的，否则，不是斧钺相加，便是舆论所不容。所以我们要在龚自珍自己的议论中和别人关于龚自珍的议论中，发现和引证他的兴王思想是很不容易的。

拿中国的龚自珍和欧洲的但丁相比，两人都是承前启后的人物，都有中世纪思想的特征，又有近代思想的特征。但龚自珍却是个多方面的人物，他是思想家，经学家，历史家，地理家，散文家，诗人，词人。一百多年以来研究龚自珍的人很多，作为一位思想家，早被多数人所忽视，研究他的兴王思想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了。

龚自珍很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他敢于在大庭广众中游说，而且还写成文章散布，这是惊世骇俗的。那时文字狱才过去不久，大家心有余悸，好友魏源写信警告他：“近闻兄酒席谈论尚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庭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深恐有违。”

### 龚自珍的兴王思想

所谓“兴王思想”，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改朝换代”的思想。中国的君主专制统治，同其它各国一样，都不是“万世一系”的，一个皇朝建立起来，总有一天要被另一个皇朝所代替。大家这样想，却不这样说。统治者禁止别人这样说，自己则宣传：本朝要永久统治下去。秦始皇说，他的子孙将二世，三世，以至千万世统治下去。龚自珍所处时代，清皇朝已经由盛而衰了，农民反抗，边境骚动，外则北方有俄国侵略，东南有西洋强国窥视等等。皇帝和大臣束手无策，中下层官吏文恬

魏源不过是朋友规劝而已，王芑孙则近乎谩骂。此人是前辈而有文名的。当龚自珍把自己的诗文各抄一册呈送他时，他回信说，“诗中伤时之作，骂坐之语，涉目皆是，此大不可也。”又说：“不宜立异自高。凡立异未有能异，自高未有能高于人者，甚至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足下将持是安归乎？足下病一世人乐为乡愿，夫乡愿不可为，怪魁亦不可为也。乡愿犹足以自存，怪魁将何以自处？”又说：“况读书力行，原不在乎高谈。海内高谈之士，如仲瞿、子居，皆颠沛

而死。仆素俾近，未至如仲瞿，子居之惊世骇俗，已不为一世所取，坐老荒江老屋中，足下不可不鉴戒，而况纵其心以驾于仲瞿，子居之上乎？”

按王芑孙此信，足以代表当时只求“修身慎言，远罪寡过”的士大夫对龚自珍的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反应。由此信可知，当时作这种“高谈”的不只龚自珍一人，信中指出王昙（仲瞿）和恽敬（子居）二人皆颠沛至死。龚自珍也不得意。他的“高谈”显然居二人之上。

但当时士大夫中也有不反对“高谈”的，例如梁章钜。他也是一个文人，又官至巡抚，同龚自珍也有交谊。他在《师友集》中说龚自珍同他会饮于吴葆晋家，曾作一文给他饯行，他将此文刻入《宣南赠言》中；有人读了此文，说“其语多触忌”。梁章钜说：“此井蛙之见耳”。可见，梁章钜并不反对龚自珍的“高谈”。据梁章钜说，同席程春海认为龚自珍此文写得很好，特别用“精楷”代抄一本赠给梁章钜。

总之，有龚自珍大胆“高谈”批评政治和社会，以前那种“万马齐喑”的风气渐渐改变了。经过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以后，敢议论政治和揭露社会的人多起来了。

## 衰世说和改革观

龚自珍批评政治和批评社会议论的几篇文章，现在他的集中。他把他当时的时世称为“衰世”。他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一文中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这大概是龚自珍自创的三世论，为了专论衰世，此文并不议论“治世”和“乱世”。

龚自珍说：“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龚自珍是站在士大夫中少数有才者的立场来看世界，他不知道衰世是专制淫威钳制人才的后果。清朝初年的高压政策，使人不敢露才，使人谨小慎微以求免祸。现在，国势虽衰，但余威犹在，说话，著书，做事，都要先考虑是否“触忌”。不仅害怕文字狱和其它罪名的制裁，而且害怕当时的“舆论”。

比这个“万马齐喑”的局面更可怕的还是：“当彼其世了，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在此形势下，有才者应如何自处？难道坐以待毙么？

“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

得，悻悻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悻且悻，且黯然而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问矣，端之以伦繇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从这个结论可以知道，龚自珍虽不明说，却认为衰世不如乱世，衰世终必入于乱世，那么他的所谓“三世”就是治世，衰世，乱世了。文中说“求治”是陪衬的，着重在“求乱”。才者处于衰世，为了免于见戮，只有求乱。

“求乱”的话是不好说的。只能说“改革”。龚自珍有自己的改革观。他在《上大学士书》中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如此将改革看作正常的，必然的。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中，则将改革同改朝换代联系起来讨论。夏商周三代相继都是后代改前代之弊政。“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即总是要改朝换代的。“一祖之法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如此看来，龚自珍是主张本朝自己改革的，但他的集中又有“夫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的话，就是说他还认为本朝改革不好，需要换一个朝代来改革才行。他说的“自改革”是陪衬，“来者改革”才是本意。

在“万马齐喑”的衰世，没有风雷，没有生气，没有才者。如果出现一才者，则百不才要督之，缚之，戮之，怎么能够“自改革”呢？那只有等待新朝的人来改革。

## 《尊隐》

龚自珍自许为少年高文的《尊隐》，是用隐蔽的手法写出他的“改朝换代”思想。

文章标出，“京师”和“山中”两个对立的“极”。“京师”象征本朝统治的力量，“山中”象征反抗本朝统治的力量。文章又将一个朝代的始终比作一个白昼，有早晨，有中午，有黄昏。在早晨时候，国势强盛，人心归附，此时的“君子”也住在“京师”，在“山中”只有鄙夫皂隶居住。在中午时候，国势也是强盛的，人心也归附，“君子”也居住在“京师”，但已稍逊于早晨的时候了。居住在“山中”的不仅有鄙夫皂隶，也有“宦士”，即不得意的士大夫。这早晨和中午两个时候是写出来作陪衬的，文章着重在黄昏时候。“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此时，“君子”就不住到“京师”去，因为“京师”不欢迎。于是“京师”只能依靠任用那些丑类窳劣，那些诈伪不材，以此惹得人民怨恨，人就都逃到“山中”去了。于是“京师”之气泄，“山中”之气盛，“京师”贫，“山中”富，“京师”贱，“山中”贵了。朝士寡助失亲。则山中之民，一啸百吟，一呻百问疾矣。朝士倚焉偷息，简焉偷话，侧焉惶惶商去留，则山中之岁月足矣。最后，“山中”之民有大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以后怎么样？龚自珍不说，也用不着说了。

这哪里是说“隐居”？这说的是造反！

这是“纵之隐”。那么所谓一般的隐士就是“横之隐”了。龚自珍把“横之隐”又分为二类。龚集中也有一文写其中的“山中之瘁民”一类，题为《记王隐君》。

他在外祖父段玉裁的遗物中发现了一首诗，不知何人所写，久不能忘。后来，他在西湖一个和尚的经箱中看见一本《心经》，虫蛀了将近一半，笔迹同外祖父所藏诗一样，更不能忘。春天，他坐轿去西湖。出螺蛳门，过一片荒冢，轿夫戚猫告诉他，这荒冢背后有一户人家，外公来杭州时每次都去拜访这家的主人，外公回来从不向人提起此事。龚自珍心动，便下轿走过那荒冢去，过桥见一个老头子，约90岁，坐在路旁晒太阳。龚自珍假装问路，老头子指着耳朵示意他是聋子。龚自珍向他作揖说：“先生真隐者。”老头子回答说：“我没有印章。”因为“隐者”和“印章”音近。当时，时间不早了，戚猫促上轿，龚自珍只好离去。次年冬，何布衣来，谈起碑帖，何布衣说，他得到宋拓的李斯《郎邪石》。有一次他生了一场怪病，群医束手。忽然有个老头子从城外来，说他能医此病。果真，两帖药就把病治好了。老头子自己动手把那个拓本拿了去。说他就是为此而来的。以后，另一个朋友马太常来，龚自珍说起何布衣的遭遇。马太常想了一下说：“对了。”他的外甥锁成一次出游，误入一人家，从这人家的后门走出去，忽然走进一个屋子，满地都是松化石。听到室内有人读书，便走进去。室内四壁有古锦囊。囊中贮金石文字，桌上放着《谢朓集》。锁成要借《谢朓集》。主人不肯。说可以抄一本给他。一个月后，锁成再去，书已抄好了，字很漂亮，像虞世南。锁成问：“您雇人替您抄的么？”主人说：“没有雇人，是他给我抄的。”说时，指着窗外一个给他锄地的汉子。锁成出门，见门外一株梅树正在开花。他走时取了一块松化石带回家来。两个朋友都不知道这老头子姓什么。吴轿夫说，似乎姓王。西湖和尚的徒弟拿那本《心经》来，说是“王老者写的”。由此可见姓王无疑。只是不知道那个锄地的汉子姓什么。

这故事中的主人就是龚自珍所说的“山中的瘁民”，即不同统治者合作，但也不是一事不干，安度晚年，而是潜心研究古代文化。他身边也团结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

由此可见，龚自珍虽然也说：“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何若“自改革”一类的话，但他的希望还是寄托于“来者”。他虽然向大学士，向礼部堂官提出种种改革建议，也知道他们不会接受的，即使接受也不会彻底施行的。他所提的，也不过是一些小建议。

龚自珍隐蔽地说了“故夫宾也者生于本朝，仕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古史钩沉论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异姓之卿”（“宾”）即非本朝宗室，虽然生在某一朝代，而且在这个朝代做官，但他不

必死心塌地为这个朝代“卖命”。更明白地说就是：这个人如果看见这个朝代已经腐朽而不可救药了，他就应当起来为推翻这个朝代，创立新的朝代而努力。这就是他的“兴王思想”。

他为此受到旧时有类似思想的朋友所重视。他的集中可考的是他和王昙的友谊。王昙是前辈，年纪比他大得多，但很重视他，二人谈得很投机，王昙是有名的怪人，不容于当时的士大夫。龚自珍的思想一定受了他的许多影响，而且从他那里学会了“掌心雷”。他死后，龚自珍写了一篇《墓表铭》，很动人。他们二人结交始末，文中也写了。原来乾隆年间北京李铁拐斜街住着一位“矮道人”，有人说已经300多岁了，他面色如童子，臂膀能举千钧重物。王昙去访他，跪在他面前。他不说话。王昙不敢起来，跪了很久，再请求指示。道人才说：“北京有一位奇士，不是你设想的那种奇士，你去求他罢。夜里，你看天空有一种光，同六等星那样亮，有青环环绕光的周围，下面就是那个奇士的家。”王昙以为道人戏弄他，不着意。嘉庆14年，王昙在门楼胡同西首龚家看见自珍。那时自珍只有18岁。王昙忽然感叹，自言自语说：“师父，师父，原来你把我托付给这位奇士了！”从此王昙同龚自珍交了朋友。《墓表铭》的“铭”说：“生昙者天也，宥昙者帝也，仇昙者海内士，识昙者四百岁之道人，18龄之童子！”

龚自珍还结交侠客，其中一位名叫刘钟汶（字方水），是他很重视的朋友。曾作一诗送刘钟汶远行，诗以《赠刘三》为题：“刘三今义士，愧杀读书人。风雪衔杯罢，关山仗剑行。英年须阅历，侠骨岂沉沦？亦有思仇讫，期君共一身。”诗中末二句表现了龚自珍对于这位侠客的期待，原诗题下有一序，其序曰：“方水从吾游久矣，而气益浮，中益浅，吾虑其出门而悔吝多也。然吾方托以大事，倚仗之如右手；以其人质直无可疑者，特不学无术耳，爰竝以一诗，送其行。”

由此可见，所谓“侠士”，就是有武艺，能搏斗之人。龚自珍要干“大事”，当然需要这种人，只要他忠实可靠，即使不学无术，也是可以信赖的。

龚自珍还结交了许多士大夫所远避的人物。他的《古风》有句说：“朝从屠沽游，夕拉骑卒饮”不但诗中这样说，也这样做。缪荃孙的《羽岭山民逸事》说：“定庵交游最杂，宗室贵人，名士缙流，侗佣博徒，无不往来”。结交宗室，贵人，名士，是正常的；结交缙流，也不奇怪；但侗佣博徒，则一般士大夫是不交游的。

## 《汉朝儒生行》

评论家论及龚自珍的改朝换代的思想之外，也论及他的兴汉灭满的思想。我认为他没有这种种族主义思

想。他的攻击矛头直对着当时的统治集团，而当时统治集团是“异族”（满人），因之也是对着满人的。如果说他有排满的思想，那也是他的兴王思想的一个“副产品”。我们从他的著作中找不出“夷夏之辨”的思想。

章炳麟在其《与刘揆一书》中说：“如仆所知，公羊春秋之学，近世甄明之者自刘逢禄。逢禄祖纶，仕满洲为执政，家世受豢，忘其宗国，横取公羊言进吴楚者，以傅会引弓之帝。魏源，龚自珍继之，谀好功名，求仕进，学术粗糲，尤素附丽，诸所陈述，佞谀万端，晚不得据要路，复以微文姗说。”

章炳麟如此对待学术问题的讨论，是不能令人心服的。照他的话说来，经今文学是不讲夷夏之辨的，要讲夷夏之辨。只能求助于经古文学。

一般人认为龚自珍也讲排满，他们总要引用他的《汉朝儒生行》长诗作证。其实，此诗反对的是“种族歧视”。

《汉朝儒生行》长诗，写的差不多是二千年以前一个朝代的事情，借当时一个儒生的口吻写出来的，儒生知道一件秘事，即当时有一位将军，立了功，掌握了兵权，只因他属于“南军系统”，“北军系统”的人妒忌他。“北军似姑南似嫂。嫂疏姑戚群僮窥。”婆婆总是袒护自己儿女的，嫂子和姑娘争斗时，嫂子方面失败的成分居多。家里的仆人和丫头看出后又从中挑拨，嫂子更无胜诉的可能，只好忍气吞声陪笑脸，处处让姑娘占便宜。《汉朝儒生行》的核心思想不过如此。

无论写得怎样巧妙，明眼人是容易看出的。戊戌维新失败后，群趋于“革命”，即排满，一般人都能看出此诗的立意，因之附会为站在汉族的立场反对满族的诗。有争论的只是：诗中的“将军”究竟是影射岳钟琪，还是影射杨芳？诗中的“儒生”是否龚自珍“夫子自道”？其实龚自珍写的不过是一种典型，满族人关后在军事上不能不用汉人为将军，同时又要防备汉人将军“造反”。在龚自珍以前，不仅有岳钟琪，有杨芳，还有其他的汉族将军遭受这种命运，不过没有此二人知名而已。在龚自珍以后，太平天国起来造反，满族将军已经没有能力了，还是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一类汉族将军才能镇压下去的。从此，《汉朝儒生行》的故事就不会重演了，但结果还是汉族将军袁世凯逼得清帝退位。

除《汉朝儒生行》以外，龚集中的《杭大宗逸事状》一文，也常被人引来证明龚自珍有排满思想。杭州人杭世骏乾隆年间以翰林应试，在试卷上写了如下的话：“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这话一出，不得了，立即下狱，定死罪。大臣营救，说这个人是书呆子，说话不检点。皇帝于是免他死罪，放归乡里。某年，皇帝南巡，至杭州，杭世骏迎驾。皇帝还召见他，同他谈话。以后皇帝又南巡，杭世骏又去迎驾。

皇帝问左右：“杭世骏还没有死么？”这天夜里杭世骏就死了。

根据别的记载，后一次南巡时，皇帝还是召见他，问他：“你的思想改了么？”他回答：“我老了，改不了。”皇帝说：“你老了，为什么不死！”这天夜里他就死了。此说如果是可信的，那么这位皇帝始终没有忘记杭世骏试卷中那句话，又为他最后的答话激恼，可能将他处死。

这个故事，以及龚自珍这篇记载，也不过是要求消除种族歧视而已，并非排满。

龚集中有一首七律，也常常被人引来证明排满思想。此诗题为《泳史》，作于道光五年龚自珍34岁时。这年，他在家为母亲居丧。十月丧满，住在昆山他父亲的别业，即此后称为“羽岭山馆”的地方。这几年他在东南，熟悉东南的生活，有不少见闻和感慨。于是作了这首七言律诗。诗的原文如下：“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这首诗表现了龚自珍的愤慨。他在丁夏三年看见东南这个六朝金粉的地方，朝廷对于“名流”（即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的精英”）只有两种办法对待：一是把他们当作娼优，玩弄他们，他们也甘受玩弄，那就施恩他们，给他们做大官发大财；二是他们不甘受玩弄，那就迫害他们，重则在他们的著作中找岔子，兴“文字狱”，轻则不给他们饭吃。他们只能著作那些足以卖钱买米的书文。无论施恩招怨，其对象都是“名流”。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则是号召那些反抗朝廷的人切勿停止反抗，投降是没有好处的。汉高祖平定海内之后，田横团结了五百壮士盘踞一个海岛，不肯归顺。汉高祖强迫田横投降，田横来到半路上自杀了，五百壮士闻讯，也都在海岛自杀。龚自珍此诗就是鼓励反抗到底。

## 龚自珍的晚年

《龚自珍全集》中那些揭露衰世，主张改革，鼓励反抗的诗文，都是少年时代写的，那首《泳史》也是34岁时写的，以后就没有或少有这一类诗文了。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说，龚自珍“中年以后，博弈，好饮酒，诸事俱废，是亦学人之通病也。”

龚自珍喜欢赌钱，他书亦有记载。《己亥杂诗》有一首“电笑何妨再一回……”今本《全集》此诗下引别本注云：“此定公无博进而作也，魏藩室云”。缪荃孙说他辛辛苦苦积聚的一点安度晚年的家产，也在赌场上输光了。有人记载他的一个笑话，即他常常自命为赌法最精，人家问他：“那么你怎么会常常输钱呢？”他回答道：“那是财神不照顾我。”

“好饮酒”，意为好色。不必去说丁香花公案，仅从《己亥杂诗》就可看出他晚年的好色是反常的。试想灵箫不过是运河码头上一个卖淫的妓女，无论怎样可爱，也不值得他那样倾倒和歌颂，直至于写出“绿色呼他心未安”的诗句。

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说他“诸事俱废”。我们可以从《己亥杂诗》看出龚自珍那时的心态。龚自珍并不害怕暴露自己的心态。他说：“少年衰艳杂雄奇，暮气颓唐不自知”。这是说，他现在已没有少年时那种“朝气”了。他初离北京是说“先生宦后雄谈减，悄向龙泉祝一回”。意思是：他做官久了，不像以前那样高谈阔论了。他又有一首诗说：“绝业名山幸早成，更何方法遣今生？从兹礼佛烧香罢，整顿全神注定卿。”意思是：他已经著了一百卷的书，目的达到了，事业完成了，除了“礼佛”和爱女人以外，从此无事可做。在这个心态之下，龚自珍早把少年时批评精神和改革雄心抛弃于九霄云外了。

关于龚自珍之死，异说很多，但从上面所分析的心态看来，他的死期接近了。这种心态就是肉体走向死亡的反映。

可是，我们还应当知道，龚自珍晚年的颓废仍是要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负责任的。这就是他在早年论述过的那篇文章中说的百不才戮一才的话。

龚自珍确实是在二十多年间被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所戮的。他并未被杀头，也未被腰斩，但他的“心”他的“朝气”渐渐消失了。他讨厌同辈朋友恭维他将来出将入相（“平交百辈悠悠口，揖罢还期针相勋”）可是，他假意向灵箫：“出”好，“处”好？（商量出处到红裙）灵箫聪明，投其所好，回答说：“不再出去做官好。”于是他很得意，竟称赞灵箫“美人胸有北山文”。这也就是“声音笑貌戮之”之例。

## 龚自珍的历史地位

不管龚自珍晚年如何“暮气颓唐”，他早年那种不顾一切，大声批评政治和社会，要求改革，而且图谋改朝换代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改革家早年时朝气蓬勃，到了晚年“暮气颓唐”，虽非“通病”，也不是个别的事例。近代有个严复，早年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进中国来，一本《天演论》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影响。可是，到了晚年，严复也“诸事俱废”了，一心念佛。现在记述中国思想史的人，尽可以记述他早年的功绩，而不必提起他晚年的颓唐。严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还是有其应有的地位的。

龚自珍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保存着中国历史上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一种优良传统，——中国历代都有这样

的士大夫，人数极少，但未绝迹。他们反对专制的统治，坚持自己的主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持不同政见者”。龚自珍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他在晚年，不管如何颓唐，如何“诸事俱废”，但还是对于当时的专制统治持不合作态度，不能做“纵之隐”，也要做“横之隐”。

他的努力不是白费的。也不是对着荒漠呼喊，而是有人倾听。他死后，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二件大事，渐渐有人敢于说话了。龚自珍的诗文，诵读的人愈来愈多了。到了甲午战争以后，龚自珍开创的风气便发展为“公车上书”，不久又发展为维新运动。那就是龚自珍说的“自改革”运动。这个运动，不出龚自珍所料想的（“一姓不再产圣”），很快失败了。但“来者改革”的运动接踵而起。这个运动在辛亥年得到成功，清皇朝被推翻了，龚自珍的“兴王思想”实现了。但代替清皇朝而起的，并不是一个新的皇朝，而是一个“共和国”。这是龚自珍始料所不及的。他对于“近代”所知不多，不过开创近代中国所需要的风气。

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都是需要士大夫中一部分先知先觉者敢于批评，敢于建议的大胆说话，然后造成广大运动的。在“万马齐喑”的时世下不能有维新，更不能有革命。追根溯源，这种大胆批评和大胆建议，是龚自珍开创的。这话并不是说：如果没有龚自珍，中国就不会有维新和革命。那时总有人应时代要求来开创大胆说话的风气。但中国开创这风气的，跨越中世纪和近代的大人物恰好是龚自珍，则是历史的事实。

龚自珍的历史地位，就在这里。

1992.4.15



王安石

司马光

苏轼

## 宋代改革中的左、中、右三派

徐庆全

一间租上传下来的房子，已经残破不堪了。有三个人路过这里，一个人说道：“应当拆掉它，建一幢新的。”另一个人说：“房子还没有完全坍塌，可以修补。”第三个人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决不能动。”这三个人就是王安石、苏轼和司马光。——作者题记

编者按：早在四十年代，郭沫若曾想把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人写成一部《三人行》，郭老的大作并未问世，但这一重要线索却留给了我们。本文揭示出，王、司马、苏三人在这场政争中各自的立场、态度及其走向，使读者对当时的那场改革有更深层的了解。

北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的一天，年仅38岁的神宗皇帝赵顼告别了人世。神宗的英年早逝，在朝臣中并未引起多大的悲哀，相反，多数人却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

数天以后，这个消息传到了金陵府，一位鬓发斑白、衣着不整的老者却抚床长叹，老泪纵横。两年以后，这位老者在寂寞悲凉中离开了人间。他就是在当朝锐意改革掀起轩然大波的老相国——王安石。

当王安石依然悲痛的时候，另一位年逾花甲的老者手持诏书，神情昂然地从洛阳踏上了赴京复职的路程。这个人就是以一部《资治通鉴》为后世所称道的司马光。

与此同时，比司马光更兴高采烈的一位中年人，意外地被恢复了知州的职务。他手持诏旨，赶赴登州就职。在他刚坐上登州知府的软皮椅子时，朝廷又给了他一个更令他感到意外的职务——起居舍人。五天以后，喘息未定的他又赴朝中任职了。这个人就是以文学著称于后世的苏轼苏东坡。

现今，善良的历史学家在披阅有关这三个人的历史时，不能不含着朦胧伤感的泪水，因为当朝这三个杰出人物，本应该像他们传世的优美篇章一样，获得众口一词的称赞，然而，他们却因为一在震惊中外的变法改革中，各持政见，敌对不休，后人对他们也毁誉不一，最终被摆上了历史的祭坛。

这场改革，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1 每当太子司文书韩维将有关政治、学术、道德的书籍摆放在英宗的儿子赵顼案前的时候，这位太子的老师就自然而然地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种负担不独韩维有，包括英宗皇帝及当朝有识的廷臣们都有，因为他们都从当朝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中，看到了国力衰弱的征兆。

北宋王朝，当时外有辽国、西夏虎视眈眈，内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军队人数激增，军费开支竟占到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国家陷进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宋太祖赵匡胤立下

的百年基业，已是风雨飘摇了。平庸的英宗皇帝所恪守的守成治国的方针，已使多数朝臣深感失望。

与朝臣们把深深地失望化作忧虑的叹息不同，太子的老师韩维却把这种衰弱的国力，编进了给太子赵顼讲授治国之道的课程的教案中，力图使以后将要登上皇位的赵顼，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赵顼并没有让韩维失望，他对当朝国情的关心程度远远超过了那些枯燥的为君之道的条条框框。这使韩维很是欣喜。

熟知前朝历史的韩维还感到，一个有所作为的国君身边，应该有几个锐意进取的辅臣。但是，在英宗守成治国方针熏陶下的朝臣们，都陷进保守拘泥、亦步亦趋的泥潭之中，靠他们来改变国政似乎是无望的。韩维想到了他的好友王安石。

在赵顼出生的第7个年头，王安石便以进士第四名的好成绩而任淮南判官。此后的十多年，他宦游江南，所到之处，都进行了一些兴利除弊的改革尝试。此时，他正在朝中任掌管国家财政的三司度支判官。

王安石是个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的怪人。虽然他也眉宇轩昂，却从来不注意自己的仪表。据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衣服还要洗换。

他对饮食的基本常识也一无所知。有一天，同府的官员们与他的夫人聊天，官员们告诉她王安石爱吃鹿肉丝。胖胖的王夫人非常惊讶，她熟知王安石向来不注意吃什么的习惯，坚持认为官员们弄错了。官员们一口咬定说，他们在一起吃饭时，王安石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眼前那盘鹿肉丝吃光了。王夫人恍然大悟，吩咐官员们在下次吃饭时，把别的菜放在他面前，看看结果如何。第二天，官员们按照王夫人的吩咐，把鹿肉丝放在离王安石最远的地方，而把别的菜放到他面前。王安石只吃靠近自己的菜，竟然丝毫不知道桌上摆了鹿肉丝。

王安石这种怪异的生活习惯，在恪守传统道德的大臣们看来，是不可理喻的。苏轼的老父苏洵，在他那篇著名的《辨奸论》的文章中，把王安石攻击成一个“衣臣虏之衣，食犬彘（猪）之食”的形象。英宗皇帝对王安石的这种习惯也极为反感，他对王安石的改革“万言书”束之高阁，多少与这点有些关系。

为了使赵顼对王安石有所了解，韩维极力推荐王安石。当46岁的王安石入朝任三司度支判官时，赵顼脑中对这个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067年，神宗赵顼登上皇位，立即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将他升擢翰林之位。

正当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改革天下弊政时，本来对王安石颇抱好感的一些元老重臣，却一反常态，转而极力反对。老相富弼将离职，神宗请他推荐后任，富弼马上推荐了文彦博。神宗沉默不乐，过了一会儿，又问：“王安石如何？”富弼深知神宗的心思，便以沉默不答表示异议。老相韩琦离职时，神宗向他表示了启用王安石的想法，韩琦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

回答说：“安石做翰林学士有余，当执政官则不行！”神宗又征询老臣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却闪烁其词：“有人说王安石奸邪，这未免有点毁谤太过，说他不理事、执拗，这却是事实。”与司马光模棱两可的意见相反，当神宗向参知政事（副相）唐介征询对王安石的意见时，唐介言：“如果让他任相，恐怕将来多变更成法。”唐介的话，道破了元老重臣们对王安石参政怀有恐惧心里的原因。

元老重臣的意见，没有使神宗抹掉作太子时就在脑中留下的对王安石良好的印象，他将王安石又从翰林学士提升为参知政事，随后又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相），辅助朝政，推行变法改革措施。

山雨欲来风满楼。王安石已经预料到，变法之难将难于上青天。

就在王安石应诏赴朝任职之际，苏轼也到了京城，在判官告院任职。

比王安石小16岁的苏轼，20岁入京应试，就以精彩的文章一举成名，博得了宋朝文坛泰斗欧阳修的啧啧称赞。他对举朝称颂的王安石钦慕已久，并不认为朝臣所称颂的王安石竟是他父亲责骂的那种人。

当王安石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陈述改革国策时，苏轼在参加皇帝特设的面试中，也提出了改革时政的主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朝政因循苟且的时病，他认为大宋王朝如不处于一种流水似的运动状态，一味地因循成法，整个社会就会日趋凋蔽，最后走向灭亡。他主张对当时的社会现状采取逐步调理、对症下药的方针，先在政体本身进行调整，严格选择官吏，淘汰那些“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冗官。对于施行变法改革，他也持赞同的意见，不过他认为，只有法确实有害于民，有损于社会肌体时，则可以改变，但是，这种变革只能是采取“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不可急剧变法。否则就像对久病体弱的人施加大剂量的药一样，不但不能有助于患者恢复身体，还会将患者折腾得

元气丧尽，走向死亡。

在变法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的时候，翰林学士司马光每当见到王安石忙碌的身影时，心情颇为复杂。在王安石未赴京任职之前，他曾对这位政绩斐然、远近闻名的地方官抱有好感，甚至于将治国平天下的希望也寄托于他。当王安石赴京任三司度支判官时，在欧阳修的引见之下，两人在相见恨晚的心情支配下成了朋友。后来，司马光才知道，他看错了。

作为一个三朝之老，他恪守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尽管百年积淀下来的腐败，已足以使他忧心忡忡，但是，他却相信祖宗成法的威力，会使这些弊端趋于消失。因此，当王安石的变法改革要打破他心目中守成的条条框框时，他就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了。

历史造就了这三个杰出的人物，却没将他们按排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使他们站在了三角形的角尖上。这样，在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改革方案时，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纷争的政治漩涡。三个人惺惺相惜的友情也因此终结。

## 2

熙宁元年（1068）四月，当王安石沐浴着和煦的春风回到京师开封就职时，便顿觉心凉半截。原来，神宗所依托推行治国之策的中书省的主要长官，除了他生气勃勃外，宰相曾公亮已逾古稀之年，正是明哲保身、颐养天年的年龄；宰相富弼对推行新法抱有抵触态度，明智地称病求退；副相唐介虽然坚决反对王安石入阁，但因身有重病，难于视事；副相赵抃虽然对新法持几分赞赏的态度，但却担心工作复杂而叫苦不休。当时的人们讥讽这种时政是：“王、曾、富、唐、赵、生、老、病、死、苦。”

王安石清醒地认识到，要靠这班人领导一场艰巨的变法改革，是难以胜任的。于是，他奏请神宗，在熙宁二年二月，甩开老班子，成立了一个领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



司。选拔了一批锐意开拓前进的新人，主要有真州推官吕惠卿，大名推官苏辙（苏轼的弟弟）。王安石委任他俩人为新机构中的“检校文字”官，负责草拟新法。不久，一份综合的变法方案就摆在神宗的龙榻前。

神宗虽然决定锐意推行这些改革方案，但是，为了更好地使上意下达，他还是把这些方案分发给朝官，广泛地征求他们的意见，以求他们支持变法。谁知，事与愿违，当朝的大臣们并未把 22 岁的神宗放在眼里，大多数人对这个方案不屑一顾。反对最强烈的是老臣司马光。不久，司马光就与王安石面对面地唇枪舌剑了一番。

引发这场争论的是关于如何对待国库空虚的问题。当时，因为黄河以北地区遭到旱灾的危害，国家财政收入严重亏损，州县官请求神宗在南郊大祀的时候，不要按照惯例给群臣们赐赏钱。神宗皇帝下诏书令学士们讨论这一建议。司马光、王安石和王琦便约好前去禀见皇上，共同商议对策。这场争论便发生了。

司马光向神宗说道：“抢救灾荒，节约开支，应该先从地位尊贵的人开始。州县官的奏议应该执行。”

王安石反对说：“国家经费不够开支，节约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有一套治理国家财政的办法。”

司马光反驳说：“你所说的那套理财之道，只不过想在老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有点恼火了：“你曲解了我所倡导的变法措施。我的总原则是：善于理财的人，既应当能使国库充足而又不增加百姓捐税。”

司马光不屑一顾地说：“天下那有这样的道理？一个国家的财富有一个总量，这笔财富不是集中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的国库里。不论你推行什么政策，或给这个政策冠以什么样美丽动听的名字，你只是把百姓手里的财富拿过来交到国库罢了。”

一旁的神宗皇帝，没打断这两位他所倚重的老臣的争论。他觉得司马光的话要多几分道理。退朝以后，他命令新法暂缓推行。于是新法方案就暂时搁置起来。

到了七月，犹豫不决的神宗还是尊重了王安石的意见，签署的第一项变革方案——均输法，便首先在淮、浙等六路推行开来，随后，一大批法令便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

司马光恼怒了，他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希望神宗能幡然醒悟。他借在迹英阁给神宗皇帝讲解书时，有意引证了汉代曹参代萧何为丞相、“萧规曹随”的历史掌故。

神宗皇帝问：“假如汉朝长期保持萧何制定的法律不改变，能行吗？”

司马光回答说：“岂止汉期，假如三代的国君长期保持汤、禹、文、武的法规，就是实行到今天，也是非常合时宜的；汉武帝乱改汉高祖的规约，结果盗贼遍布半个天下，汉元帝乱改汉宣帝的成法，汉朝的大业就衰落了。由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宣宗制订的法规是不可以随意改变的。”

神宗半晌默默不语。他不明白为什么当朝这两位老臣的意见是如此地相悖。他有点困惑了。

回到寝宫，他默默地翻开了置于榻上的王安石的那份《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奏折。这份奏折是王安石在任翰林学士时，与神宗在室内密谈后所上的。奏折中剖析了宋仁宗在位 40 多年中所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朝面临的种种危机，强调摆脱这种危机的出路在于变法。祖宗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谈话的情景：

当时王安石刚落坐，他就迫不及待地问道：“要治理天下，应当首先做什么？”

王安石干脆利落地回答说：“必须首先选择一个正确的治国之策。”

神宗又问：“按唐太宗的办法治国，怎么样？”

王安石回答说：“陛下应当以尧、

舜为榜样，何必效法唐太宗呢？尧、舜治国的办法，非常简略而不流于烦琐，简明扼要不陷入迂阔，只是后世的学者不能完全了解，才认为高不可及。”

神宗说：“你这可以说用难做的事情要求君主了。朕自顾力量微薄，恐怕无法符合你的期望。况且，唐太宗有了魏征，刘备有了诸葛亮，才有所作为，青史留名。可惜，像魏征、诸葛亮这样的人才并不是世代都有的啊。”

王安石却不以为然：“有没有治世的人才关键在于陛下。陛下如果想成为尧、舜、就会有皋、夔、稷、契那样的忠臣。现今，宋朝疆土广大，百年承平无事，贤良正直的学者很多，可是陛下却还忧虑无人辅佐，这是因为您治国的方针不明，求贤还没有达到若渴的程度。这样，即使有皋、夔那样的忠臣，也将为小人所蒙蔽，最后也要归隐而去的啊！”

神宗回答说：“什么时候能没有小人呢？即使在尧、舜时代，也还有‘四凶’（指不服舜控制的四个部族首领）作乱啊！”

王安石说：“尧、舜所以成为世所景仰的贤君，就在于他们能识辨‘四凶’，及时把他们清除。如果任‘四凶’肆意进谗言诬陷忠臣，即使皋、夔那样的人也难以善始善终啊！”……

神宗回忆着当时的情景，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话语交替地在他耳边回响着。渐渐地，司马光的形象在这位年轻皇帝的脑海中，幻化成尧、舜“四凶”的影子，而王安石则成了一个活脱脱的魏征的形象了。

劝谏皇帝不成，司马光又转而劝说王安石。他连续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信中指責实行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因而引起了天下民怨沸腾，反复劝阻王安石停止新法。王安石简明扼要地回了司马光一封信，这就是至今还仍被列入中学教材的《答司马谏议书》。在这封信中，王安石对司马光罗列的罪状逐一

加以驳斥，他在信中写道：

“我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制订法令制度，经过朝廷讨论修正，这不算是侵官；替国家理财，增加收入，不算是征利；驳斥错误的言论，揭露巧言善辩的坏人，不算是拒谏……至于怨谤太多，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人们苟且偷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士大夫多半不以国事为重，反而以附会世事，讨好众人爲善。当今，皇上要割除弊端，我就不能考虑反对者多少，更不会在乎世人的诽谤啊！”

这份堪为后世有识之士效法的书信，真可谓掷地有声，司马光却愤怒了。他坚定地站到了反对新法的行列。

御史中丞吕晦首先向王安石发难，这个负责“纪检”弹劾朝中百官违法案件的官吏，给王安石罗列了10大罪状呈给神宗。不过，这件事做得太卤莽了。吕晦想让王安石下台的目的没有达到，自己反而被革职、丢掉了乌纱帽。

吕晦的发难，仅仅是一个开端。随后，对王安石的攻击接踵而来。枢密使文彦博在神宗面前牢骚满腹地说：“老祖宗的现成的法规都有案可查，何必改行新法而失掉人心呢？”皇太后曹氏也警告神宗：“祖宗成法，不应该让王安石轻易地改变。”甚至有的内侍官也跪倒在神宗面前哭诉：“现在祖宗的成法扫地无遗，愿陛下罢黜王安石。”

在四面攻击声中，王安石依旧毫无畏惧地战斗着，但是，年轻的神宗皇帝却显得有点手足无措了。当任河北安抚使的老相国韩琦，抓住育苗法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弊端，上书弹劾王安石时，神宗动摇了，他不顾王安石的劝阻，中止了育苗法。王安石寒心了，他向神宗请了病假。

神宗此时似乎又觉得司马光这一派的意见有道理。因此，在王安石请假以后，宋神宗下诏任司马光充任枢密副使。司马光不肯从命。他认为个人的官职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

是否要马上废除新政。

皇帝态度的变化，使保守派们欣喜若狂，他们当晚便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会议结束后，持中间立场的阁员曾公亮派他的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形报告了王安石，让他赶快销假，返回朝中。于是，王安石又回到相府，在反对派的阻挠中继续推行改革法案。

与此同时，司马光第9次上书神宗，要皇帝废止新法。皇帝火了，他质问司马光：“朕命你任枢密副使，你却多次拒不受命，反而随意批评朝政，这是为什么？”

司马光回答说：“我至今也未接受枢密使这一职务。我的责任仍旧是规劝皇帝留意朝中政事。”

神宗被激怒了。当司马光看到王安石销假回朝，只好带着深深的遗憾到陕西做外任官去了。次年，他愤怒地辞去了一切职务。在辞职的奏折上，他仍然怒不可遏地指责王安石在朝中所起的纷乱。而神宗皇帝对这份要挟性的辞职书反应极为冷漠，司马光无奈只得得到洛阳隐居去了。

司马光在洛阳避门不出，倾其全力继续9年前已经开始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编写工作，绝口不论政事了。

纷争并未结束，苏轼又步司马光的后尘，对新法提出了诤难。

同王安石的火爆性格相反，苏轼对王安石的新法一开始是持观望态度。他对新法的公开批评，是在司马光退居洛阳，保守派失势时开始的。

熙宁四年（1071），当王安石准备推行改变科举制度、兴办学校的法令时，神宗对前几次法令所引起的朝政纷争的局面心有余悸，因而对是否推行这项新法犹豫不决，便向朝中大臣征询意见。苏轼挥笔写下了《议学校贡举状》，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神宗对苏轼的意见很重视，他在奏仪上挥笔批道：“朕对此项法令本来就持有怀疑态度，得到你的奏议，疑窦全解了。”立即命人召见苏轼。君臣之间

坦诚相谈，苏轼毫不客气地批评神宗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他依然是以前所倡导的缓慢变革方针。

虽然皇帝对苏轼的意见极为重视，介于王安石的前车之鉴，但是，他对全面批评新法仍有顾虑。在这一年的元宵节，神宗下令减价收买浙灯4000盏。苏轼为了试探神宗能否容纳不同意见，便写了《谏买浙灯状》的奏折，请求皇帝励行节约，不可减价买灯而使百姓生怨。神宗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停止了买灯。苏轼为神宗的“改过不咎，从善如流”的做法所鼓舞，便尽自己所能，开始了对新法的批评。

为了表达他对王安石鼓励神宗独断专行的不满，他借进士考试的机会，在《国学秋试策问》中故意出了这样一道试题：在古代，国君的最大忧患是不能勤于政事，不能英明果断，不能信任大臣。但是，即使国君没有这三种忧患，也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国家平安，一种是国家混乱。他要求应考的文人做出回答。毫无疑问，这道策试题是在提醒王安石：我们的国君是英明的，国家造成混乱的局面实际上该由你负责。

在御试进士时，变革派的吕惠卿把那些批评仁宗皇帝因循守旧、歌颂神宗皇帝锐意革新的考生们擢为上第，而把批评新法的考生置于下第。苏轼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他认为，科场考试是选才的关键，被录取的人，天下引为榜样，落第的人，天下以为鉴戒。如果任意乱定录取标准，谁还相信科考呢？激于义愤，他奋笔写下了《拟进士对御试榜》的奏本。

虽然较之司马光对新法的攻击，苏轼对新法的批评可谓是温和派，但是，变法派却不容许这种不协调的声音存在。他们很快想到了使这位才子缄口不言的办法，请求皇帝任命他为开封府推官，推官是掌管决断刑狱的官吏，事务繁杂。王安石想借纷乱复杂的公务缠住他，使他没有时间对新

法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但是，苏轼头脑灵活，断案敏捷。在公务之余，他依然不放弃对新法的指责。他的两篇《上神宗皇帝书》就是在揭开封府推官时写成的。

在这两篇洋洋万言的奏折中，愤怒和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是悲伤的讽刺，有时是苛刻的批评，为文工巧而坦诚直率，言出足以动人。神宗皇帝被感动了，但是，这也同样改变不了他将被罢黜的命运。因为神宗皇帝只能容忍不伤变法总精神的谏议。

紧接着，苏轼所做的另一件事情，使他被罢黜出京的时间提前了。他在乡试策问中，出了一道名为《独断》的试题，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王安石。王安石被激怒了。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便以“莫须有”的罪名，使苏轼陷入一场纠纷之中，最后为王安石找到了罢黜他们的借口。

这场纠纷起自当时流传很久的谣言。谣言说，在英宗年间，苏轼的父亲病逝，苏氏兄弟运送父灵柩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购买家具瓷器，并极有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御史利用这段谣言，写出了弹劾他的奏本。

神宗皇帝看了奏本，对苏轼的人品产生了怀疑，他对司马光说：“苏轼人品欠佳，你对他评价过高。”这样，苏轼给贬到风景秀丽的杭州城任太守去了。

3 在苏轼携眷离开京城前后，当年仁宗、英宗年间的元老重臣——保守派们，都已经离职四散各地了。朝中只剩下以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等为首的变法派了。

朝中的平静，使神宗皇帝有时间坐下来，静静地回忆这几年来政局变化。那些以前辅助他成长的老臣们的音容笑貌，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当初，罢黜这些老臣时，他极力相信他们是奸邪小人。如今，这些老臣在他脑中的形象，却怎么也不能与尧、

舜时期的“四凶”的影子重叠起来。他心中涌起了莫名的悲伤，对着空荡的殿堂大声喊道：“你们为什么都反对我？我错在哪里？”

与此相反，王安石在这一年的新春佳节，他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他陶醉于自己的功绩，他只看到北宋王朝春风在送暖，新桃在换旧符。就在他痛饮可避瘟疫的屠苏酒时，表面如大海般平静的朝廷，却在酝酿着另一场争斗。

引发这场纷争的是老天爷。

新法推行后，正赶上连年频繁的自然灾害，首先是京东、河北地区刮起飓风，随后几个地区发生地震，接着又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旱。不久，又有慧星在东方出现。这些自然灾害的侵袭，使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们放弃了借“民怨”攻击新法的老招数，而把目光紧紧盯住了“天敌”。

首先发难的是御史中丞吕晦，他把屡见的天灾归结于王安石的新法。即将离朝的富弼向神宗说，现在各处发生地震，是因为王安石任命的多是小人，以致于天降责罚。和司马光一同做翰林学士的范镇以及御史程颢，也在奏疏中说一切灾难都是上天不满的警告。仿佛不把新法废止，就要出现天塌地陷的大劫难了。

面对保守派的攻击，王安石再三将“天变不足畏”的观点加以阐述。却无法打消神宗对天意的疑惑。作为神圣的天子，他是要维护“天”的权利的。因此，当熙宁八年十月初七至十九，慧星出现时，神宗下了一道罪己的手诏，诏中承认了灾变是对自己用政不当的惩罚，请朝臣们直言政策的过失。此时，退居洛阳的司马光，立刻应诏上疏，陈说“朝政阙失”。四散在各地的保守派官僚与司马光遥相呼应，全都在奏疏中，把慧星的出现与新法的推行联系起来，只有废除新法，才能免除天灾。神宗皇帝在一片

“替天行道”的叫嚷声中退却了。

一个命定要成大事的小人物出现了。他叫郑侠，是一个皇宫门吏。他别出心裁地画了一幅旱民困苦不堪的《流民图》呈给皇上。图上画的是带着脚镣的难民在砍树挣钱，用以付给官家的青苗贷款，并配上文字说明：只要去掉王安石，10天之间定会下雨。

神宗皇帝把画卷带回寝宫，给皇后和皇家人观看。先说话的是皇帝的祖母：“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困苦不堪，我觉得不应该擅改祖制。”

皇帝回答说：“但是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说：“我知道王安石素有奇才，但是他树敌太多，连你也卷进去。你还是暂时把他的职务中止吧。”

皇帝说：“在满朝的大臣中，也只有王安石敢于身当大任。”

站立一旁的皇帝的弟弟岐王插话道：“我认为你应当听祖母的话。”

皇帝发火了：“好！好！我不会治国，你来接。”

皇太后含着泪说：“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闯下的，你怎么办呢？”

第二天早晨，王安石被罢了相。

老天爷并不领情，天并没有下雨。

王安石离朝，神宗任用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这两个人都曾是坚定的护法者。可是，当王安石离相后，吕惠卿起了篡权的野心，他首先将曾布击溃，又与那个因给后世留下了一句“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邓绾联合起来反对韩绛。又借机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还把王安石牵连进发生在山东的一件谋反案中。韩绛识破了吕惠卿、邓绾等人借机生事的用心，他一面请求皇帝罢黜吕惠卿，起用王安石；另一方面，又派人送给王安石一密函。王安石仅七天就赶回东京。

由于负责谋反案的徐禧为王安石洗清了不白之冤，在神宗熙宁八年

(1075)二月，王安石重登相位。这时，图谋陷害王安石的邓绾。为了重获信任，决定出卖吕惠卿，揭露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缗的贪污罪行，朝廷将吕惠卿送进京师的御史台监狱中。但是邓绾此举并没有换得王安石的信任，仍被罢黜。

在御史台监狱等候审判的吕惠卿，对王安石发出了最后的一击。

在吕惠卿与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岁月里，保存了一些王安石写给他私人信件，其中有几封信上写有“无令上（皇帝）知此一帖”的字样。吕惠卿把这些信件呈交给皇帝，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皇帝得知这些信件后，第一次对这位极为信任的老相国发了脾气。王安石坚决请求罢归田里。

这年10月，神宗终于同意他辞职。元丰二年（1079），神宗皇帝又给这位老相国一个荆国公的封号，意在让他在江宁养老了。

同年，在湖州任职的苏轼被捕了。

宦游于江南的苏轼，心中的愤懑是无法抑制的，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对新法的抵触情绪，促使他写下了大量的讥讽新法的诗。这些诗不仅倾注了苏轼对朝政深深忧虑的情感，而且也讽刺了当朝执政的官吏。被骂为鸣蛙、鸣蝉、夜枭的李定、舒亶等人被深深地激怒了，他们派出官吏四处搜集这些诗，寻章摘句地累积起苏轼讥讽时政的罪状。元丰三年，苏轼在任谢恩表的奏章中，又说了几句当权派觉得有点大为不敬的话，他们终于抓住了这个报复的机会。

这年三月，苏轼被朝廷任命为湖州的长官。按照当朝的规矩，每个被朝廷任命的官吏，在赴职时，都要写一份感谢皇帝提拔的谢恩表。苏轼在表中借题发挥：“我生性愚钝，跟不上形势，所以也无法与‘新进’官吏相比。皇帝让我担任这一职务，可能是因为我老了，不会再惹是生非了，或者是因为我还能百姓做点事情。”

李定、舒亶等新进更是恼火，一个御史把这段话挑出来，弹劾他蔑视朝廷，御史台的检查官舒亶把不久前搜集的苏轼讥刺时政的诗，也呈给皇帝。接着，御史中丞李定也跟上一表，列举苏轼的四大罪状。8月18日，苏轼被送到了御史台的皇家监狱。

正当朝中是否判苏轼死刑而吵闹不休的时候，一道奏表递到了皇帝手中，这是已退隐数年的老相国王安石关于对苏轼的处理意见。奏表中规劝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子乎？”

老相国这句话，决定了他的政改的命运。

这年十二月，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结束了四个月的监禁生涯。

在此后的几年中，王安石日日徜徉在风景秀丽的钟山小路上；司马光潜心治学，把他的全部情感寄托于《资治通鉴》这部政治通史之中；苏轼在黄州勤于职守，那支惹事生非的笔虽没有闲着，但收敛多了。神宗皇帝对新、旧两派的争斗更加厌恶，乐于维持着相安无事的局面。朝政重新归于平静。

**4** 神宗皇帝的病逝，使反对新法的保守派们看到了重新入朝为政的希望，一直对新法持有敌意的皇太后、皇后更是无所顾忌了，因为登上皇位的哲宗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

这年四月初，被召回朝任门下侍郎的老臣司马光，抱病给监国执政的皇太后递上了废除新法的奏章。

五月，苏轼也被召还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相继任起居舍人、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要职。苏轼听说这种青云直上的升迁，是神宗皇帝生前的心意时，感动得潸然下泪。

他感激神宗的浩荡皇恩，更是坚持自己的改革观念。因此，当废除新法的诏令下达后，他又站出来干预

了。

促使苏轼维护一部分新法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王安石态度的转变。

在元丰七年（1084），神宗皇帝将苏轼从黄州团练副使改任为离京城较近的汝州团练副使。在赴职的途中，经过金陵，多年没有见面的苏、王二人友好地相会了。

王安石听说苏轼的前来，穿着野服，骑着毛驴来到江边，亲自迎接苏轼。

在相聚的这一段时间内，他们不仅谈诗说佛，结伴畅游，也谈及了当朝的国事。

苏轼对王安石不热衷于仕宦、甘于淡泊宁静生活态度的仰慕，并表示愿意听王安石的劝告，在是非场中激流勇退，跟从他“老于钟山下。”

金陵相会，苏轼理解了王安石，称赞王安石：“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哲宗即位后，闲居在金陵的王安石、接连收到市易法、方田法、保甲法相继废去的消息，当得知连免役法也被废除时，这位老相国已痛不欲生了，他对苍天喊道：“这是为什么呀！”元佑之年（1086）四月，这位66岁的老相国，带着深深的遗憾、悲凉地离开了人间。

在他去世前一年，司马光也带着他没有彻底废除新法的遗憾离世。

此时的苏轼，在保守派当权的朝中、仍是孤掌难鸣，还导致保守派对他极为厌恶。早先是司马光准备将他赶出朝廷，司马光死后，旧党的一些人仍继续对他进行攻击。而他又坚持罢黜当初参与王安石新政的一些专权官吏，特别是王安石死后，周种上疏主张以王安石配享神宗，苏轼又上章弹劾。这样，他既得罪了旧党，又得罪了新党。

哲宗元佑四年（1089），苏轼又一次遭贬，又回到了他熟悉的杭州任职去了。

忆秋推开窗，久久地望着天上那一轮铜锣似的明月，心又沉重起来，冰冷的泪水顺着眼角的皱纹流下来，离别40年，近15000个日日夜夜，她天天思念着他！现在，她的期待发出了绿色的嫩芽。

她和陆剑都出身于中医世家，膝下已有九个活泼可爱的儿女！白天，夫妻俩一起为病人号脉开方，夜晚和儿女们一起说说笑笑，共享天伦之乐！

一天，丈夫被佩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士兵押走了。不久传来了消息，陆剑被征用为军医，要开赴台湾，允许带一个孩子同去。她怀着一颗痛苦的心，一手牵着长子，一手搀着长女，叮嘱儿女们照顾好爸爸。她以为这只是短暂的离别，没想到一别就是40年！

虽有七个孩子在她身边，她仍然感到孤独。她强打精神治疗病人，常常睹物思人，秀美的脸上禁不住泪水涟涟。

丈夫没有回来。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她苦苦等着。好几个人向她表示了心意，她都摇摇头，她坚信他一定会回来的！

帆船如林。四海的渔船都来这里避风，她请台湾来的渔民捎信。信没有捎到，风暴铺天盖地！戴着红袖套的一伙人说她是暗藏特务，于是批斗、抄家、拆墙、推灶、翻箱。发报机和枪没有搜出来，却从夹墙中发现了一大堆线装医书！

她仍然专心干她的济世救人的职业。她含辛茹苦地养育着七个儿女。她很累，她的心之帆始终驶向他的港湾！

春潮送来了桃花汛，她得知陆剑已从军中退役，在台北开了一家诊所。他又成了家，台湾的妻子为他生育了一男一女。心中的太阳坠落了，星慢慢地隐退了。不久，那轮血一样的太阳又从她心中渐渐升起。毕竟，

# 两岸离情四十年

徐志耕

她和他相处了十多年，他的貌、他的情，还有他的根，一齐在她眼前，她忘不了！

她捎去问候，捎去柔情，陆剑没有勇气回信，他托来大陆的同乡一次次捎来回信：“我对不起你！我欠了你和孩子的债，我没有脸来见你们！”

她送去清风，送去温暖：“我不怪你，孩子们也不怪你，好在悲剧快结束了，每当看到台湾人，我总是想你，孩子们也想你，你难道不想见我们吗？”

台湾太太读着从未见过面的“姐姐”的来信，感动得泪水盈眶：“妹妹，我感谢您，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您帮助我照顾了陆剑，没有您，先生会处处不便，我欢迎您与先生一起到家里看看，我们以后能否作为姐妹一样来往？”……

月儿圆了。陆先生一下船，来不及向妻儿问候，就一下跪在妻子面前，老泪纵横：“秋，我对不起你啊！我良心上过意不去啊！”他双手紧紧地揪着胸前的衣襟，懊愧和内疚的感情

像决堤的洪水喷涌出来。

忆秋的双手抓着他的肩膀，几次扶他不起来，她的泪像断了线的珍珠，她呜咽着：“起来，起来吧……”

台湾太太一手擦拭着泪水，一手搀扶着陆剑起来。她对忆秋深深鞠了一躬，哭泣着说：“姐姐，我把陆剑给您送回来了，我没有照顾好先生，请您原谅！”

忆秋一把抱住了她。海峡两岸不同命运的两个女人，为着同一个男人，奉献了自己的爱情！

十个人围着一张圆桌举杯。三代同堂、三代人喝着同一种红葡萄酒，可每人的滋味都不一样。

诉不尽的高情别绪。夜深了，台湾太太铺好了被褥，软声软气地说：“姐阻，今天晚上你们好好谈谈。”她和大孙女合睡了一床。

天还没有亮，她就起来烧火做饭了。忆秋劝她多睡一会儿。“您辛苦了这么多年，您多睡一会儿。”她说。

矮矮胖胖的高山族的台湾太太，一连烧了七天饭。尽管忆秋和孙女儿一再劝阻。她认为这是应该的，因为这也是她的家。她和陆剑的结合，伤害了忆秋那忠贞的心，因为忆秋苦守了40年，她觉得对不起忆秋。这是同情，还是怜悯？是道歉，还是补偿？

探亲证上的返台日期临近了，陆剑给七个儿女一人送了一台彩电，只有这个潘多拉宝盒般的东西，才能展示这个纷繁的世界和世界上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陆剑给她的结发妻子忆秋套上了一条一两重的纯金项链，金灿灿的水波纹链垂上，是一颗立体的心，心上镌刻着一个正楷大字“爱”！

千金难买的爱，千金难买的心！一千根金链，一万颗金心，也还不清40年的想思债！

老兵金木土回到青山绿水的家乡时，黑漆大门像牌位一样直立着，他的发妻去世才一个月！黑瓦粉墙石台阶，白果树下清水塘，只见旧时景，不见旧时人。他年年盼、夜夜想的意

中人，竟然撒下他独自赴了黄泉！思来想去，黯然饮泣。他觉得对不起他的妻子。人生有几个40年，花容月貌的青春年华付之流水，他让她守了40年的寡！

就是为了找他的发妻他才千里迢迢赶回来的。现在，她不在了，他感到孤独，感到寂寞，感到悲凉。他想，阴间一定比人间更孤寂和凄凉。他应该去陪伴她。他欠她的情太多了，太多了……他要用他的那颗苍老而不衰的心，去温暖她、慰藉她。

于是，他关上了两扇黑漆的大门，也关闭了那扇苦恋了40年的心的窗户。血写的遗书上，只有七个字：生生死死在一起！

住在台北荣民院中的陈阿龙已经90岁了，他是得知他的妻子去世后才申请回大陆的。到家的那天正下着细雨，他把行李一放，就叫家人领着去妻子坟前扫墓。踏着弯弯山道，他踉踉跄跄地走着，嘴上喃喃地说着什么，混浊的双眼噙满了泪水。来到墓前，老人双手掩面，号啕大哭，他将香烛纸钱一一供好，然后双膝跪地，一个劲地磕头：“阿贞，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啊！”

从此，他就居住在山下的老屋中。这间老屋，是他和阿贞拜堂成亲的洞房。他将阿贞的坟墓修饰了一番，新置了石碑、石桌和石凳，墓前铺筑了石台阶。墓的四周，他亲手种上了青松和五颜六色的花。春夏秋冬，墓地五光十色。每天，他都从老屋走来，沿着弯弯的山道，走到老伴阿贞的墓前，采来一束束的野花，扎成一个色彩艳丽的花环，然后端端正正地放在墓碑前的供桌上。他静静地坐在石凳上，静静地回忆着往事。他觉得这像一场梦，人生太短暂了。叶落归根，他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回到了他心爱的人身边。虽然她走了，但他仍然可以坐在她的身边陪伴她，这比台湾荣民院里饮酒解愁空惆怅的日子要好一些。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

理枝，活着我没有带她比翼双飞，老了我要始终陪伴她！”

水泥墓旁新修了一穴寿坟，新立的墓碑上并列刻着他和她名字，只是，“陈阿龙”三个字没有描上颜色。

一年后，老兵陈阿龙合上了双眼。他和她的发妻合葬在同一个墓中，这是他的心愿，他的归宿。

## 2

弯弓似的扁担，挑着装满了鸡鸭鱼肉的两只竹箩。荣华两脚生风往回赶，他顾不得擦一下满脸的汗水。明天就要做亲郎官了。家里正在擦桌、洗碗，这一担菜，就是明天娶亲的十桌酒席！新娘是同村的美英。

翻过横马岭，就望得见长白村了。突然，路旁窜出四个黄军衣的人：“站住，不许动！”不容分说，四个兵把他推进了一间黑乎乎的小屋。亏得同村的乡亲捎了个口信，美英才在码头上见了荣华一面。那一面，使荣华刻骨铭心：美英满脸泪水地呼喊着：“阿华，阿华！我等着你！你早日回来！”船离岸好远了，荣华还听见美英那带着沙哑的呼叫声！

这声音一直伴随他40年。40年，他一直没有成家。多少好心人为他牵线，他都摇摇头。他一直记得美英从心里喊出来的那声嘶哑的叮咛：“我等着你！”

美英在等着他。她坚信她的心上人一定会回来的！她在镜子里照见了脸上的皱纹，照见了一根根白发，她到观音菩萨面前烧香，一切苦楚都化作了丝丝的甜蜜。

黝黑的荣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当他站在她的面前时，她惊呆了：这是荣华吗？这是真的吗？愣了好一会儿，她才颤抖着扑过去，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长白村喧闹了！推迟了40年的喜筵重新开宴，全村老少一齐入席！红喜红烛并蒂笑，喜泪悲泪一起流！只是一对新人变老人，满头青丝成白发！白发夫妻喜笑颜开地你搀我我扶

你，到广州、香港蜜月旅行去了。他们失去的太多了，他们应该得到补偿。一朝的恩爱，成为他们一生的奠基！

阿竹的丈夫阿满是结婚五天后被抓到台湾去的。他从士兵到排长，从排长到连长，直到住进台北的“国防部”退役军官单身宿舍，都未成家。一些好友劝他立个门户，他总是说：“我有家，我的老婆在大陆，她对我很恩爱。”

嘴上这样说，内心却极度苦闷。天天靠烟酒茶麻痹神经，他不敢到朋友家去，怕触景生情。他常常独自在家中踱步。每天一早，他就往床边的箩筐中丢一根二寸长的草棍。一年又一年，竹编的箩筐中装满了一层又一层黄黄的草棍。40年间，他的枕头中珍藏着阿竹的一件东西，想起它，他感到温馨和甜蜜。

那一年，阿满参加旅行团到了香港。一桥之隔，却像银河难渡！他躲开导游，偷偷地打了个电话给上海的表弟，话筒中的消息使他既惊喜又不安：“你的阿竹还在等你，一直帮人家做工度日，她苦啊！”

“我一定回来！我一定回来！”他哭着回答。

他终于回来了。年过花甲的阿竹早早赶到码头上去迎接了。她怕见了面不认识自己的丈夫，于是一遍又一遍地用老花镜凝视着不久前寄来的那张彩色照片。照片上的阿满西装笔挺，白衬衫外面系一根紫红色的领带，红红的方脸上眯缝着眼睛，他在笑！只有微笑的神态是她熟悉的。

还有一样东西阿竹也是熟悉的。当阿满抖索地从提包中捧出来的时候，阿竹眼睛一亮，那是她的一条短裤！红花白底，这是她洞房花烛夜穿过的。阿满一直放在枕头里，陪伴了他40年的梦！

阿竹也保存着阿满的一样东西——那是阿满穿过的一双白布袜！每当深夜思念阿满时，阿竹总要拿出来深情地看一看，然后贴在胸前嘴里

轻轻地呼唤：“阿满！阿满……”

高个子大胡子的阿满回到了阿竹的身边。靠割茅草和帮工度日的阿竹现在全身珠光宝气了，她住上了新楼房，天天给阿满吃水泡蛋。阿满搀扶着阿竹，走在暮色的夕照中。

夕阳下，一个高个子的台湾老兵提着两个大包来到台胞接待站：“先生，我叫朱启祥，我要找汤凤珠，我想她想了40年了。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求求你们帮帮忙……”感情的激流冲决了心中的闸门，他边说边跪了下来。

几个工作人员连忙扶起他。问明缘由后，在场的人都被这位远方来客的一片真情所感动，电话四处联系，开往虾盘岛的航船马上就要启航。

66岁的朱启祥又飞舟跨海来到了40年前驻守过的这个小岛。这个形似盘子的小岛上留下了他一生珍贵的东西。他是福建人，当时他在岛上的部队当连长，当连长的朱启祥偷偷爱上了23岁的小岛美女汤凤珠，他们同居了。不久部队撤到了台湾，这对难舍难分的情人只好天各一方望洋兴叹了。

朱启祥已经退役了。他孤身一人，思来想去，这世界上只有凤珠是他最亲近的人，他们向对方献出了彼此最珍贵的东西。他要去寻找她！

“你是朱……”岛上乡政府的一位老人感到很面熟。

“朱启祥。”他怯生生地回答。这个曾经熟悉的小岛已经变得陌生了。

老人大笑起来：“哈哈，你是来寻凤珠的吧？我知道，你和她是相好。当年我们打游击，与你还是对头呢！”

相逢一笑泯恩仇。老人热情地送上茶水：“阿珠等了你十多年，吃了不少苦，后来改嫁到外岛去了。”

朱启祥的脸色变了，像傻了似的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噢，她有个女儿，她是你的女儿，叫美仙，已经成了家，就在这岛上。”老人说。

台湾老兵的眼睛亮亮了：“美仙？

她今年多大了？”

“40岁。你们撤退的那年年底生的。”

“她在那儿？我能见她吗？”朱启祥急不可待。

一位健壮的中年妇女来到了乡政府。

老人站起来介绍：“美仙，这是你阿爸！”

朱启祥伸出双手，他喃喃地叫着：“美仙，美仙……”

美仙凝视着这位初次见面的老人，心中已明白了八九分。血缘的亲情使素不相识的人顷刻间心心相映。

女儿一一回答了父亲关切的询问。老兵脸上的表情像气象图一样地不断变幻着。

“我能否见见你妈？”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可以，我陪你一块儿去。”女儿很爽快。

眼前的一切，正是朱启祥40年来所企盼的，他愿他的凤珠幸福快乐，可未曾想到她为他生了一个女儿，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又一个亲人。可现实又使他的心隐隐作痛，他觉得失去了什么。

抱头痛哭后，他和她诉说了整整一夜的离情别绪。强忍着内心的苦痛，他对她说：“看到你和女儿过得挺好，我也就放心了。看来我还是回去好。以后，每年我来看你们！”

他走了，他不敢回头看她。他怕他的惆怅引起她和女儿的伤感。凤珠已不属于他了，他心中充满了酸楚。但，痛苦中有一种幸福的欣慰，这就是爱！

### 3

虹桥机场——大上海通向世界的门窗。天暗下来了，红红绿绿的信号灯和夜空中的繁星一齐闪烁。机场出口处，仍有一群一群的人在迎接空中来客。

高挑个儿的许丽珍已经在这里站立半天了。自从接到丈夫要归来的电

报，她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40个春秋，望眼欲穿的40年呀！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她刻意打扮了一番。虽然她平时也是朴素整洁的，可今天她特地去剪了发，花白的长波浪微微地弯曲着，眉眼间溢满了幸福的微笑。

她是20岁那年和赵成康结婚的。那时，日本人到处扫荡，淮安城里也不安静，她是坐一辆黄包车到他家拜堂的。她和他都是大户人家出身。赵成康还是中学生，他听了一些人的宣传，抛下新婚的妻子打日本人去了。

淮安城里的人挥动红红绿绿的小旗庆祝抗战胜利的那一年，赵成康接她到部队随军。他是连长，他们住盐店弄13号的一间平房，一斗米一月房租。他们共同生活了三年。许丽珍30岁那年的阴历3月26日，已经是黄昏了，赵成康急匆匆地赶回来：“外面消息不好，部队要撤退！”

他撤到了台湾，一去没有音讯。直到去年春天，许丽珍才接到他的信，那是一封辗转了不知多少人手才收到的信，信封已经皱巴巴了。皱巴巴的信封中有一张皱巴巴的彩色照片，他比以前瘦了！

她手拿这张照片，和侄儿并肩等候着。望着不断起落的飞机，望着鱼群般游动出来的人群，她怕找不到他，又一次高高地举起了那块写有“赵成康”三个大字的纸牌。

当白发苍苍的赵成康站在这块纸牌前的时候，许丽珍惊喜得不敢相认了，这哪是她的年轻健壮的丈夫呢？她挽着他的臂膀，她感觉他年老体弱了。

退役了的赵成康得了好几种病。他手头并不宽裕，他觉得无脸来见等待了40年的妻子。他知道妻子孤身一人，吃了40年的苦。她在这里举目无亲，全是靠帮工、洗衣和每月15元的救济金苦度光阴。一间贫寒的低屋中，满眼是黑乎乎的破烂。他觉得应该让她分享晚年的欢乐，可他

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他比不上那些经商的老板，他们有大笔的美元、港币和戒指项链。

“我是一身疾病，两袖清风。”他说。

“能平平安安地回来，我就满足了。”她说。

从此，黑乎乎的平屋里有了笑声，他们有忆不完的动荡而悲欢的一生。

每天，赵成康象说评书一样给许丽珍讲他在台湾见到听到的故事。

许丽珍手持芭蕉扇，为丈夫烧水煎药。一天两剂。他的胃病，他的气管炎，他的一声声的呻吟，都连着她的心！

#### 4

当那些孤寂的台湾老兵与离别了40年的心上人重新团聚的时候，另外一些老人却又走向了孤寂！历史给予他们一次重新选择爱情的机会，新的选择导致了心的倾斜。

当台湾老兵龚长云和他的原配夫人见面后，66岁的老太太再也不愿离开他的“阿云”了。她立即给后夫写了一封要离婚的信。她说：“那个石匠又黑又难看，喝醉了酒发酒疯，哪有阿云好！”

石匠不同意，老太太和她的阿云同居了，半年后，三个人一起上人民法院。

台湾老兵龚长云理由充分：“她是我的老婆，应当还给我。”

石匠有凭有据：“她跟了我30多年，给我生了四个小孩，你脸皮要不要？你有钱，难道不会再找一个？”

这句话把台湾老兵气坏了：“谁不要脸？你是后夫，我是原配，我就喜欢我的原配太太！”

法官问老太太：“你喜欢哪一个？”  
“我要台湾老头！”

他和她手挽手走出了法院的大门，石匠像石头般地呆立着。

感情的突变是难以承受的。现在，东岙村的林石义也成了一尊石

雕，他朝夕相处了30几载的金花这几天不理他了。他早就看出了苗头，前几年背着偷偷地与台湾老头书信来往，后来寄来钱盖房子，现在居然要来争夺他的老伴刘金花了。他台湾老头凭什么？不就是凭手上有一大叠臭钱吗？

他越想越气。终于，林老头手提一把斧头满村乱吼：“台湾老头如果把阿拉老婆抢去的话，阿拉非劈死他不可！”

金花慌了，她怕真的闹出人命来，便好言相劝：“你放心，我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我还会照顾你的。”

台湾老兵陈学水不同意：“要么跟我，要么跟他，这样糊里糊涂算什么？”

金花到乡政府要求离婚。林石义挥着斧头赶来了。经过政府耐心劝导，他的火气才渐渐平息下来。

“事情总好商量的，你把金花给我算了！”

“给我一千美元！”林石义扔下斧头说。

台湾老兵十分慷慨：“一千五！”

林老头更老了，他踉踉跄跄地到庙里烧香去了。

思绪像缭绕着的烟雾，他觉得这是一场梦。

和林老汉一样，62岁的陈满根如今也成了孤独者。他花了30年心血建成的这个家，还有家中的老婆孩子，全把他抛弃了！

全是因为那个台湾老兵。他也是老兵，说不定，他和他还打过仗。陈满根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黄军装时，礁石乡的张水友却穿上有青天白日帽徽的黄军装。两军对垒。结果，陈满根的部队胜利了，张水友的部队撤到了台湾。

为保卫祖国而当兵的陈满根驻守在岛上。祝阿琴喜欢上他了，新昌人陈满根当了上门女婿，那是1955年。后来，阿琴给他生了个儿子。

阿琴和水友没有儿子，她和他是拜了天地的。他们是同乡同村的。感

情是一个怪物，大树被锯掉了，树根上又冒出了新芽。

她知道水友还在台湾，就托人捎信去。她难忘他们之间的情爱，和那神圣的初恋。

进了荣民院的孤独的水友自然也思念他的妻子。他心动了，心随着白色的鸽子飞到了东海上的小岛。岛上传开了消息：阿琴的台湾老头要回来了！

满根不信，他也不怕：“我和阿琴结婚30多年了，我们患难与共，他想来当第三者？！”

水友真的回来了，他就住在自己的家里。正在山上看管山林的满根气呼呼地跑下山来，他一把抓住台湾老兵的衣襟：“国民党又来反攻大陆啦？他妈的，你给我滚！”

台湾老兵不敢还手，他吓得说不出话来。

妻子阿琴拉拉扯扯在中间劝架。村里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大圈，谁都分不清谁是谁非，谁也不敢多嘴多舌。

人群中有的叹气，有的摇头。

满根怒火冲天：“大家评评理，我们好端端的一户人家，半路里来了这么一个国民党，来拆我的家，简直不要脸！”他理直气壮。

“国民党”拼命辩解：“乡亲们，我水友40年前被抓去当兵，那是没有办法的呀！阿琴是我的老婆，村里人都喝过喜酒的。当今人民政府允许台湾老兵回来探亲，我不和老婆团聚和谁团聚？”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说着，本乡本土的人听着这口地道的乡音，许多人不住地点头。

“我要告，告到法院去！”满根大声说。

乡政府的人出来做双方的工作：“这是历史问题，大家好好商量，心平气和。”

满根跑到了法院，他告他的老婆祝阿琴犯重婚罪，台湾老兵破坏家庭罪。他相信共产党的法院总会保护他这个共产党员，这个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一个转业军人的利益的。



法庭似乎也拿不出办法。这个基层法院还是头一回接到这样棘手的婚姻案子。

在进行了多次协商调解后，法院不得不进行开庭调查：

“祝阿琴，你愿意和谁结婚？”

“我和水友是原配夫妻，我当然是他的人！”

“张水友，你愿意和祝阿琴结婚吗？”

“阿琴本来就是我的老婆，我们40年前就结过婚了。”

陈满根脖子上的血管一根根凸起来，他两眼血红，挥着拳头大骂：“祝阿琴，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婊子养的，我在你困难的时候帮助你，当初你说要与我白头到老，现在我头发还没有白，你就抛弃了我，你这个没良心的烂货！”

法院认为，不管怎样，祝阿琴只能嫁一个丈夫。祝阿琴被满根一顿骂后，更加坚定不移：“我要跟张水友！”

40年前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兵张水友胜利了。他以喜悦的姿态朝法官们点头致谢。40年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转业军人陈满根在法院上打了败仗。他好伤心，像失守阵地一样失去了一个妻子、一个家庭！

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的人在情场上败北了。历史对他开了一个庄严的玩笑！陈满根的脸上淌满了泪水，他用一根竹竿挑着一床被子，孤独地离开了海岛。他手中拿着台湾老兵给他的作为补偿费的5000元人民币，坐在法院门口失声痛哭：“我这35年只值5000元？”

60岁的陈满根无依无靠，只好回到他的故乡去。40年前给他戴上光荣花，敲锣打鼓送他参军的山乡还认得这个孤独的游子吗？

## 5

孤独的71岁卧病在床的李之祥却没有孤独。虽然台湾老兵宋维祥派人约他的结发妻子王招娣快去见面。可连叫三次，老伴王招娣就是不去。

他相信他和王招娣40年的患难姻缘是不可能轻易地拆散的。情义无价，他的王招娣是个重情的人。

风尘仆仆地从台湾赶来的宋维祥，却因三顾茅庐见不到结发妻子王招娣而失声痛哭了。要说义气和恩情，宋维祥是她的第一个救命恩人。

娇小清瘦的王招娣，年轻时漂亮而多情，因为家境贫困而沦落烟花。身为国民党海军的宋维祥同情她的身世，也为她的美貌吸引，于是不惜重金将她赎身而脱离火坑，他们恩恩爱爱地做了四年夫妻后，宋维祥奉命撤退到台湾去了。

美貌的王招娣孤身一人了。她没有经济来源，多年的卖笑生涯使她染上了梅毒，还由于她曾当过国民党兵的老婆而在政治上受歧视。贫病交加，世态炎凉中，拉黄包车的李之祥热心地料理她的生活。

流血流脓的梅毒，害得她周身溃烂！两只白嫩嫩的脚上烂得露出了脚趾骨！王招娣疼得哇哇叫，黄包车夫给她每天用热水擦洗，给她换药。王招娣在床上躺了三年，李之祥服侍了她三年！

王招娣在苦海边又捡回了一条命。这样的救命之恩她永生难忘。

如今，平静的湖水中掀起了波浪。那位救她出火坑的情郎回来了！40年的别离，她有千言万语要对他讲。旧情像两块石头，只要一碰，就会发出燃烧的火！她克制着，她用理智压抑着自己感情的烈焰。

侄女来叫她，她不去。车子来接她了，她也不去。居委会派人来做工作，讲了好多道理，讲得她心酸落泪。

隔壁的退休教师过来劝说了：“人家这么远的路来看你，也是一片心！夫妻一场，总是有感情的。你不去，他哭了好几次……”

她睡梦中，多少次见到这个圆脸大眼睛的男人，她难忘他的温情，她真想扑在他的怀里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何老师还在耐心的劝说：“你不要怪他，这是历史造成的悲剧。你也不要顾虑，现在政策开放了，政府欢迎台湾同胞回来，将心比心，你也应该和他见一面……”

她动心了，67岁的老太太像初恋的少女似地忸怩了一番：“一个人我不去。”

剪一头花白短发的何老师顺水推舟：“我陪你去，好不好？”

王招娣点了点头。她换了一件浅灰色的大襟衫，外套一件深蓝色的开司米背心，还将那一头灰白的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

两人终于见面了。颤抖的手握住了颤抖的手。

“招娣，我来看看你了，想煞了！我想你想煞了！”他说。

“变样了，不认得了！不认得了！”她说。

人们把他俩拥入了房间。宋维祥从食指上脱下一只金戒指，轻轻地戴在招娣的食指上：“你吃苦了！我对不起你呀！”

当招娣说到卧床三年治梅毒的苦处时，指着身上一处处的疤痕给他看。宋维祥呜咽着。他轻轻地抚摸着这一块块疮疤，他想抚平她心头的创伤。

“我也是三死三生！”他说着，呼地脱下衬衣，露出了强健发达的上身。在宽厚的胸背上，有一条条血与火留下的标记！艰辛的生活之路呀，充满着风刀霜剑！

她拥抱着他。

“我们还能在一起吗？”宋维祥问

他。她轻轻地摇摇头：“他有病，他离不开我。”

宋维祥点点头。他爱她，他尊重她的选择。

虽然，这样的选择，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是痛苦的。但，这是高尚的。



言 民

## 轰动台湾的大陆演员王路遥

两年多前，40集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在台湾播出后，大陆青年演员王路遥在宝岛一举走红。如今这部电视剧又在北京播出，王路遥便走进了首都千家万户。

1990年10月，王路遥在长春电影厂拍完《女警官》后到北京小休，有一天她去台湾电视连续剧《风华绝代》剧组看朋友，该剧导演宗华看到王路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宗华试探着对她说：“我们这个剧已拍了三个多月，主要角色都定位了，你能客串一个配角舞女珍珍吗？”路遥答应了。翌日，宗华看到试装后的路遥惊叹：“你的扮相很像年轻时的周璇。下次我拍《周璇传》时，一定请你主演，不过，我建议你改一改名字，不要让人觉得路途遥远，就取艺名陆瑶，因为你是大陆的一块宝玉。”

宗华导演慧眼识珠。这个自幼聪慧、悟性高、善歌舞的哈尔滨姑娘，12岁时就离开剧作家父亲和俄罗斯血统的歌唱家母亲，被召进了国防科工委文工团，后又调入广州战士歌舞

团，经过几年的专业训练，她已经是震动南国和台湾影坛、歌坛、荧屏的四栖明星了。她还演出过话剧《星球别传》、《失足的小男孩》等，并当过配音演员和节目主持人，现在是哈尔滨话剧院的演员。

从1986年开始，王路遥主演了《猛警神探》、《凤阳土人》、《雪野情痴》、《死刑与婚礼》、《孟姜女》等20多部影视片，她饰演的古典美人、现代女郎、侦探、恋人、护士、女学生……在塑造不同职业、不同命运的银屏形象中，都深深印进了观众的脑海。特别是她扮演的丽人，以多层次的微笑和优美舞姿，让人感到了美的流动。艺术上的千姿百态，背后是代价和付出。只要剧情需要，她可以在北风肆虐时只穿一件单衣出没在荒山野岭，又能在深秋时节咬紧牙关任喷水车从头到脚猛烈浇灌；可以在隆冬时节跳入寒气砭骨的水中游泳，还能够斗胆与武打演员交手。有一次，为拍好片中武打场面，她被人从两米多高的船头一脚踹到地上，也没吭一

声。

王路遥不仅在银屏上身价日增，在歌坛也颇有建树。一次，她随团赴新疆慰问演出，担任女声独唱的演员突然生病，为解燃眉之急，平时爱好吉它弹唱的王路遥被推上舞台，在众人的期待中，她一展歌喉，竟博得了满堂喝彩。她的嗓音委婉、纯真，具有独特的韵味。太平洋影音公司立即为她录制了专辑，初进市场就销售20万盒，紧接着《路遥歌集》、《爱我别走》、《天涯同命鸟》、《顽皮少女》等盒带也由几家音像公司相继推出，总销量超过一百万盒。

这位多才多艺，被一位摄影师称为“最上镜的小姐”，在摄影机前风姿绰约、仪态万方、一丝不苟，可在生活中她却有自己世界，她信奉佛教，身上不能离开“灵验咒”，否则她认为运气全无。“杀生”更是看不得的，鸡鸭鱼肉生吞活剥的场面她远而避之。骑自行车不会上下，就骑一辆童车……。她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成功，她说她的路在前方！

# 股票来了

刘宏伟

1986年5月，美国纽约证券公司的董事长来我国访问。小平同志会见了这位董事长，宾主进行了热情而友好的谈话。整个大厅里的气氛如同户外扑面而来的融融春意。会见结束，董事长先生向邓小平赠送了一件临别礼物：一枚金光灿灿的金钥匙。

陪同邓小平会见客人的陈慕华等人，自然知道这件礼物意味着什么。这是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所徽。董事长先生的馈赠显然有着热切的期待或邀请。

作为回赠，陈慕华行长向董事长先生赠送了一张新中国的第一张股票，是1984年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发行的。

回赠传达了我们的意愿。董事长先生自然心领神会。作为一件珍贵的礼物，也作为一条重要的信息，董事长先生将我国的这张股票郑重地收藏起来。如今，它被安置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陈列馆中最惹眼的位置上。

于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第一次开始与有着12亿人口的中国有了某种若隐若显的联系。

这，至少是我国经济改革更进一步开放的象征。

会有那么一天，我国的股票将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进那座巨型建筑物内。不再仅仅是作为馈赠的礼物，而是作为参与交易的有价证券！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发行的第一张股票，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无疑有着功不可没的历史价值。它标志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化。我们花了40多年的时间才恍然大悟。它的身上，实在不该被打上太多的“阶级烙印”。

转眼之间，距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的发行年已有8个年头了。8年，整个抗日战争的长度。新一代中国也像经历一场战争似地，经历了股票和证券市场从无到有、由冷到热的浴血奋战。

如今国人皆知深圳股市活跃健康，却很少有人知道其起步时的困

窘。

“在别人眼里，那仿佛是一场逼人跳楼的阴谋……”一位当年的股票推销员至今仍唏嘘不已。

这位推销员的感叹来自他的亲身经历。那一场推销仗打得艰苦而心酸。那是1987年5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深圳发展银行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了股票——价值：79.5万元人民币；股票种类：普通股。

掬在今天，79.5万元人民币顷刻之间就会给抢购一空。但是5年前，深圳人愣是对股票不屑一顾。

深圳人中不乏精于算计者。他们早就对股票与国库券、保值国债、融资券、社会福利券进行过认真的比较和分析。最终的结论通俗易懂：股票是一个无法预测的变数，它与企业领导人的能力成正比。可谁又能有把握说哪家领导人的能力会为自己带来可观的红利呢？若是企业倒闭，你也只能算是为自己交了学费。

这种唯恐买股票赔本的心理左右着大多数人的思想，如同如今认定股票笃定发大财的心理左右着大多数人的思想一样。

没人认它，便没人买它。没人买，便苦了股票推销员。他们手中攥着大把大把的股票上街游说。半导体喇叭里传出的声音透着底气不足的嘶哑，自个儿听着都觉得别扭。好像鼓

动人家买股票是想着法算计着人家的钱包。那时节天气已经炎热逼人，推销员们如置身烤鸭炉中，个个满脸油光通红。但是他们的这副尊容并不能感动“上帝”——围观者和过路人却无动于衷，根本不肯付出一分钱以解救他们。

然而发展银行的股票已经投入市场，即使无人购买也得悉数卖光。这东西不同于其他商品，可以搁在柜台上和仓库里让市场慢慢消化。股票不行，发行了就必须尽快卖出去。

像历史上许多抢险救灾的危急时刻一样，我们的党员、干部们又挺身而出。他们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带头认购这些别人不肯认购的股票。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是党组织的号召”。当初入党时都是宣过誓的，就是要为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现在，考验的时刻到了，履行誓言的时刻到了。何况这次不是要你身家性命，只是牺牲一点钱财而已。钱财乃身外之物，为党牺牲，值！

于是，发展银行首批 79.5 万元人民币普通股票，便在这种悲壮的气氛中卖完了。

那时节，笔者站在高楼林立的深圳大街上，却恍惚面对排排窑洞。嗓子眼儿里总在哼唱那支年代久远的歌子：“红军干部好作风……”

然而那时的心境，却决不仅仅是崇敬……

这个耐人寻味的故事直到第二年——1988 年 3 月 8 日，才有了一个出乎许多人意料的美妙大结局：

3 月 8 日，全世界女人们的节日。女人们在这一天被全体同胞注目。中国的职业妇女们还在这一天享受法定的休息日。

发展银行选中这个日子向股东们派发首次股息。每股 2 元整！

股东们惊喜交加。这就是说，他们当初以 20 元一股的价钱购买到手的股票，此时每股已增值 2 元，变成了 22 元！而时间仅仅过去了 8 个月。这就是说，发展银行股票的年利

率是 15%！

多么诱人的股票！

无人理会的丑小鸭突然变成了人人羡慕的白天鹅。股票光彩夺目！股票可亲可爱！原先将股票拒之于千里之外实在是天下最大的傻蛋！

于是，成百上千追悔莫及的市民成了热心购买股票的人。发展银行增发新股那天，证券公司门口一大早就出现了一条人的长龙。晨曦微微之中，人们翘首等待公司大门的开启，那神色近似于阿里巴巴呼唤“芝麻开门、芝麻开门”的感觉。大门才打开。人们骚动，昂扬，个个高举着钱袋涌向交易柜台。他们望着证券公司的职员们像是望着亲爱的人民币。仅仅过了两个小时，14 万元股票便销售一空！买到的人仿佛找到了金窖；没有买到的人沮丧不已。

当然大多数的人热情之中仍有理智，他们预测：还会有股票发行的。果然！

——1989 年 2 月，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发行 2800 万元普通股票。

——还是 1989 年 2 月，深圳金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发行 100 万元股票。年终股息 20% 以上。

——1989 年 12 月，深圳蛇口安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

还是 1989 年 12 月，深圳原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

至此，深圳已有五家公司发行股票，累计发行股票价额 2.7 亿元。而且次次被热情的股民抢购一空。

不仅仅是深圳，许多城市似乎都在闹“股票荒”。人们憋足了劲儿攒钱买股票。对于时下的中国人来说，操心的不是决定买那种股票的问题，而是你能否买得到股票的问题。

这种“购股热潮”自然会使股票发行顺利无阻，成交额迅速上升。国家计委财金司官员不久前透露：

从 1984 年到 1991 年底，我国已累计发行各类有价证券将近 3000 亿元。

3000 亿元不算个大数字，但，对于刚刚将股票迎进国门的中国人来说，这已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数字。

1992 年初，我国又首次在境外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行话称之为“B 种股票”，由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100 万股的 B 种股票两个月便被 230 位来自各国的投资者认购一空。这些股票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溢价发行售价 420 元，折合美金约 70 美元。上市交易后，第一天开盘价就是 72 美元。按照国际市场惯例，完全放开价格，通过电脑方式竞价交易。于是价格便一路上扬构成牛势。收盘时价格竟升至 88.5 美元。成交量高达 3400 股之多！成交额近 30 万美元！

我们还将长驱直入。据有关部门预计，我国今后 10 年上市证券量将达 10000 亿元左右。这数字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我们对股票这东西诚挚的热情——

欢迎你到这方来！

## 二

笔者查阅了《辞海》，在关于《股票》的条目上，写着如下的句子：

股票 股份公司发给股东证明其所入股份数，并有权取得股息的有价证券。它可作为买卖对象和抵押品。股票可分为记名股票与无记名股票。前者须经过一定的手续才能转移其所有权；后者则可以自由转移。

短短的一段文字，涵盖了小小股票所要经历的风风雨雨和鸟语花香。股票不同于我们过去所拥有的任何一种“值钱”的东西。它，代表着一种财富，也代表着一种险境；代表着一种拥有，也代表着一种流动……

股票收益的多少，完全取决于股份公司的经营状况。公司当年赢利多，每股所分得的红利也就随之提高；倘若公司亏损破产，股东也就无利可图或者干脆连股金也要贴进去。

股票的风险是股票所有特征中最大的特征。

这个特征很要命。

但是这个要命的特征却支撑了全世界的股票市场！正是因为股票风险性的存在，人们要在股市上取得平衡和化解。股民们在股价暴跌之所以大量抛出股票，其心理动机便是欲将风险转给他人。然而风险是一个活跃的变数，子时看似风险，午时没准便化险为夷。到了寅时还很有可能会得来个大赚大发。

股票就是这么一副令人又爱又恨、恨爱参半的模样儿！

这个模样儿很招人。

股票究竟招惹得多少人为之神魂颠倒、身心两忘，笔者一时无从查起。在这个地球上，需要发财和想发财的人实在太多、太多。聚集财富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也是人类心理的需要。财富可以使生活富裕，而富裕的生活又可以换来心理上的轻松愉快。安于贫穷指的是一种不为贫穷失节的精神境界，却并非视贫穷为人类理想的追求。

还记得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定义吗？一个重要内容便是——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

追求财富并没有什么不好，想发财也不要怕旁人指责。只要取之有道。

我们这块国土上，前些年出现过集邮热、黄金热，标志着人们投资意识的觉醒。同时也表明着：一个没有股票和股市的国家，人们的资金流动将会是多么地畸形！

现在好了，股票来了。股市开了，倘若你真想投资并且也有资可投，股市将会是你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一位曾经热衷于集邮、并且耗资巨大的北京 D 先生告诉笔者：前不久，他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西厅拍卖掉了自己心爱的若干枚邮票。他要用拍卖邮票的钱去买股票。

D 先生顺利进行了资本大转

移。如今，他已在股市上几进几出，让手中资本的位数增加了若干个。

D 先生这样评价他的战略大转移：

“我发觉股票投资更适合于我。邮票流通市场太狭窄。攥着邮票还不如攥着股票，股票可以使我在收益上既领股息，又有可能领取到证券买卖在低进高出时赚到的差价利润。假如我的股权高达一定数量，我还可以竞选公司董事呢！即使有一天我真不想要这些股票了，只需给证券经纪商打个电话，通知他将股票售出即可。几分钟之内，股票就可以按我的需要脱手卖出。”

笔者由衷地赞叹 D 先生看准方向、抢先一步，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自己赚来了可观的财富。他做了什么？他只不过是懂得了关于股票投资的若干问题，再加上一个及时的行动。

一个事实明摆着：认识股票，才有可能真正拥有股票所带来的财富。真正的“炒家”必定是经纬在胸、大智大勇的行家里手。

### 三

笔者身居尚无股市的北京。当上海、深圳以及一些外地中小城市纷纷兴起“股票热”时，北京人仿佛仍在矜持地“隔岸观火”。关于“炒股发财”的消息从四面八方频频涌进京城。北京人在羡慕、感叹之余，做了些什么呢？侃。

北京人素来理性十足。他们像一些问号不断的孩子，任什么样的东西到了手中都想拆开来看个究竟。北京人崇尚理性也依赖理性，整个京城到处可见的红墙仿佛就是那不绝于缕的京城理性光芒。

北京目前尚无股市，但是对股票与股市的求知欲却已悄然兴起。在外地人抢购股票之际，北京人却在抢购有关股票知识的书籍。那上百家书店的几万册股票入门之类的书，在极短的时间内便销售一空。

这个令人振奋的信息说明：数以万计的北京人不约而同地走进了同一所美丽动人的自修大学。

仅在一年前，我们的新闻界还在为北京人金融意识的薄弱而惋惜不已。在记者们的笔下，北京人像是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太婆，麻木而迟钝。

现在好了，北京人大步流星地赶上来了。虽说股市尚无，但是成千上万的自学成才者已在跃跃欲试。北京的报纸上出现了这样一些报道：

有些北京人已将存款提出准备随时进行股票投资；

有些北京人常去证券公司进行咨询打探；

有些北京人已经南下上海进行实地观战；

有些北京人正在以买债券来进行股票投资的模拟……

能侃的北京人此次读书不再仅仅为“侃”而读，他们当真亲自想动手尝试了。

据说大学校园是股票知识热的集中地带。当代大学生们在完成本科学业的同时，纷纷将目光盯住了“证券投资”这门学科。只要经济系在上此类内容的课程，那教室总是座无虚席。甚至通道里都站着热心听课的同学。

笔者曾在清华大学第三教学楼的大教室里目睹了这种盛况。

那天天气晴朗，清华园绿茸茸地显露着春意。第三教学楼几乎成了整个清华园的中心，人流向着那里涌动不息，最后，将这间可容纳 300 人的大教室全部塞满，实际的听课人数高达 500 人！

望着拥挤的教室和那些热切的眸子，笔者想起 12 年前的中山大学里一幕类似的情景。那时笔者正在中大中文系读书。那时正是崇尚文字与艺术的时代。某天，我们中文系的艺术课搬到阶梯教室去上了——那是当时中大最大的教室，大概可容纳近千人。

记得那天全部的座位都被坐满

了。记得那天所有的通道也都被占满了。记得那天有好几个窗户被扒烂了——因为许多同学只能站在窗外听课。

那天，是著名相声演员马季来给我们上《关于相声艺术》的课。

然而今天，同样痴狂的热情却是冲着股票知识而来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变革。

股票买卖有投机的成分，但却决不是阴沟里的交易。它是一门正儿八经的学科，它有一个庄严而体面的名称——证券投资学。

证券投资学是20世纪最为活跃、建树最多的学科之一。作为对它的一种褒奖，1990年，瑞典诺贝尔基金会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投资理论上作出的重大贡献。

我们当代的大学生及时注意到了这个学科的重要地位。清华大学的投资学课早在1988年就已正式开设。最近，他们还开办模拟股市和系列讲座，全方位地满足学生们的求知欲。

但是更多的北京人无缘走进高等学府听课。他们在手持书本之际，需要有专家随时指点迷津。可又有多少人能幸运得与专家做亲友或做邻居呢？

于是，就有几个远见卓识的北京人商量着开办一所面向社会的证券学校，让那千千万万个无缘涉足大学校园的未来股民，也有个排忧解难的去处。

于是，北京市第一所证券学校——万隆学校，便在1992年春天正式开课了。

《北京晚报》经济新闻版以一则50字的短讯，将此消息登在报纸最不起眼的左下角。第二天，护国寺大街54号骤然红火起来，数以百计的北京人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

#### 四

说上海人精明与说山东人憨厚、

北京人耿直一样，属于一种约定俗成的心理积淀，否则，上海不会成为近代中国股票市场的大本营；否则，上海不会成为新中国最早恢复股票交易的城市；否则，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不会恰好在上海开业……

上海人的精明使得今日上海滩迅速接纳了股票，并迅速喜爱上了股票。股票市场高度的容纳性，使得成千上万普通的上海人有了跻身于商业活动之中的机会。

在那花花绿绿的纸片上，究竟有多少上海人钟情于斯、寄情于斯？

香港新闻界一直对上海股市极为关注。《明报》曾在1991年初发表题为《沪百万市民成“炒家”》的报道，文章指出：目前上海有百万市民加入“炒证券”行列，其投资技巧也愈益娴熟高超。这是去年的统计数字。如今上海“炒家”的队伍究竟是在变长还是在变短？

上海本地的报纸自然最有发言权。《文汇报》在今年年初披露：最新统计表明：上海证券持有人已达二百万以上。而两年前，只有五万股民。上海“炒家”队伍几乎在以年均百万数字在增长！

因为“二百万炒家”的存在，上海已有股票、企业债券、重点建设债券、国库券、公债等有价证券近30种上市交易；

因为“二百万炒家”的存在，上海股票上市总股金已达到3.9亿元。这笔自居民手中的消费资金，它将直接成为企业生产资金。

因为“二百万炒家”的存在，企业必须向社会公开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经营者就得想方设法改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豫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销售额完成22505万元，利润完成1375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0.36%和4.83%，人均创利1万多元。

上海市首家批准成立的股份制企业——小飞乐音响公司，1990年上交税金80.2万元，实现利润88.4万

元，人均创利达2万多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豫园公司股东们在1990年获每股股息红利15%。

小飞乐音响公司的股东们在1990年可领取股息红利13.75%。扣除个人所得税金后，每股实得红利11%。

多么可观的收益，买股票真是利国利民又利己！

但若说上海股民只从股票交易中悟出这么一条理论，那又实在是上海人精明能力的“小视”。

所以，香港《明报》这样评价道：

“精明的上海人先于其他大陆居民逐渐悟出‘证券的生命在于流动，资金在流通中增值’的道理。”

这条道理的被悟出，才是上海人精明能力的真正体现！

1990年12月19日！是新一代上海股民永远难忘的节日。那天上午，天空为他们而晴朗，阳光为他们而灿烂，上海滩为他们而喜庆。这一天将载入史册。

这是上海的某条大街某栋英式楼房。楼房外聚集着500名海内外来宾和不计其数的围观市民。一记洪亮、庄重的铜锣声！那块神秘的红绸被揭下。一块锃亮的铜牌上镌刻着上海股民盼望已久的一串文字：上海证券交易所。

这铜牌将载入史册。

共同揭下那红绸的3个中国人也将会载入史册。他们是：上海市副市长黄菊、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

那记铜锣声标志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正式开业，也标志着二百万上海股民从此有了一个正规而安全的去处。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大吉。第一个月的22个营业日里，便有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股票等31种证券上市，成交7778笔，交易量逾2亿元人民币。

从此这里便不再平静。从春到秋，从冬到夏，这里每日有数不清的人摩肩接踵。人们攥紧钱袋随时等待着把现钱变成股票。每有股票上市，便有狂热的股民蜂涌而至。

尽管专家再三告诫股市风险的客观存在，但是上海股民买气十足，春风得意。他们的行话称一万元叫“一粒米”，可见投资胃口之大！事实说明：上海股市一直久居牛势！

牛势，股票市场股价上扬的局势，那情形如同一条昂首挺立的公牛。

上海股市是一个仍富个性的股市。西方的经验对它不起作用；旧上海的做法也无多少存留。有人搞“三成涨跌法”却纷纷落空；盲动者随意跟进、跟着哄抬却腰囊大鼓。

1991年9月，上海股市风云突变。

9月10日，电真空股票以638.70无开盘，较上日收盘价632.40元已涨足，一个上午成交量就破了二万大关。中午，某机构投资者开始抛售，且越抛量越大，一下抛出30655股，破了历史记录。于是，犹如多米诺骨牌，股民们上午刚欲买入，下午便急忙撤销买单。

9月11日，电真空股票继续跌至停板。延中股票、申华股票、大飞乐股票也随之下跌至停板。这一天，惊慌失措的上海股民人山人海般涌进证券交易所……

9月12日，申华股票几经搏杀，开始回升，买盘压倒卖盘，以82.30元涨停收盘。成交量为89252股。

9月16日，在申华股票的带动下，电真空、延中、大飞乐三张股票价位纷纷回升，分别为625.90元，65.30元，661.99元。

第一次经历了风险，精明的上海人很快便明白过来：股市风波周期的缩短，恰恰正是上海股市趋向成熟的可喜标志。“牛”“熊”二势交替而出的局面，正利于真正的“炒家”大显身

手！

## 五

中国人天性爱随大流，但是对于离自己的生活习惯过远的东西，还是不肯盲从。

今天，中国要进行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变革。中国人自愿或不自愿地要对从前的自己审视，然后校正，然后重新起步。

时下的股票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如火如荼，而在中国的另一一些地方却是望尘却步。

譬如修建淮淮铁路，全长115.3公里，设计概算要9930万元。

1989年，江苏省人民银行批准淮阴市发行铁路股票3000万元。人民银行对未来的股东们允诺说：你们可以参加分红一直到这条铁路报废；你们可以获得分配铁路残值的权利。你们享有铁路建成后的经营参与权。但同时，有言在先：在这条铁路建设期间，不对任何股东付利息，也不分红。而且，股东们有承担该铁路经营亏损和破产的义务。

权利是诱人的，但义务也太吓人。好比是虎口夺食，不是大喜就是大悲。

所以淮淮铁路股票的认购步履维艰。整整三年才认购了全部投资的半数——1500万元。

淮阴市政府绞尽了脑汁。他们手中没有钱，但我党光荣传统的法宝。当年深圳的情形又在淮阴出现。不过，淮阴市政府采用的是另一个光荣传统——广泛发动群众。

关于动员群众买股票的大会不知开过了多少个，甚至强行分摊到市直各单位以及各区县。但那些花花绿绿的股票毕竟不是万恶的侵略者或阶级敌人，未必一定需要将它们全部消灭干净。不买股票毕竟不是革命斗志薄弱的表现。淮海战役时这里曾经出现了百万支前大军，但是这事儿毕竟不是那激动人心的“支前”。

于是广大群众按兵不动。淮阴人第一次没有响应政府的号召。政府没辙儿了。

突然有一天上海来人了。整整10个上海人，而且个个腰缠万贯！他们乘长途汽车一路风尘而来。10个上海人一出车站便四处打听同一件事——什么地方可以买到铁路股票？

回答大同小异：“什么铁路股票？没听说过！”一双双惊诧的眼睛。

10个上海人简直要怀疑淮阴人在“欺生”。可人家脸上并无一点狡诈啊！

幸好路边一位老清洁工及时指点迷津。他宣称他知道此事，也知道那个发行铁路股票的公司地处何方。他向10个上海人指明地点后，便嘟嘟囔囔开了。他抱怨说股票这东西不是咱老百姓玩得起的，抱怨说他从来就没想过靠买股票发财，抱怨说他单位的领导软磨硬泡地要他买股票，抱怨说他情面难却脑子一晕竟然买了整整100元的铁路股票。100元，他大半个月的工资哩……

问路的10个上海人来到一所平平常常的小院儿。小院门口挂着一块同样平平常常的木牌。上书：江苏沂淮地方铁路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工作人员惊喜交加。这10个陌生的上海人是公司今天的吉星！“吉星”们慷慨解囊，出口就要下了35万元的股票。一应手续几乎转眼之间便妥。公司今天的工作效率快得惊人！最后，10个上海“大款”在一片千恩万谢之中扬长而去。

消息上了《淮阴日报》一个不起眼儿的角落里。

淮阴人有了饭桌上的热门话题。他们对10个上海大款的阔绰感叹不已，却并不眼热。

消息又上了《扬子晚报》、《解放日报》。

江苏沂淮地方铁路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院突然之间人群爆满，那外乡口音不绝于耳！

第一天，101个南京人买走了73.5万元股票；71个上海人买走了118万元股票；其他43个外乡人买走了19.5万元股票。

第二天，更多的南京人、上海人涌到淮阴，还有广州人、杭州人、天津人、济南人、江西人、广西人……几乎半个中国的省份都来了人！

第三天，股份有限总公司挂出安民告示：该公司铁路股票已售完，感谢各界各位的合作。

怎么能不感谢那些外乡人？人家几天之内就把你们在淮阴花了几年时间也没发行掉的铁路股票全部买光了！

淮阴人仍然保持矜持。只有很少一部分淮阴人被裹挟进来。而且他们大都只是小小地购上一笔，决不像外乡人那样大包大揽。

更多的淮阴人则对蜂涌而至的外乡抢购者报以善意的一笑：这些盼发财盼昏了头的外乡人哟！

不过，最后一批股票被各县区、单位的财会部门留住了。他们不肯再让有关部门的人收回去。这一年来他们第一次表示出自己对股票的热情。

沂淮铁路本是属于淮阴人的。这条铁路将在不久的将来为淮阴的父老乡亲谋求幸福。他们本该自己拥有、自己管理。但是现在，他们已将许多肥水流入外人田了。也许以后的某天淮阴人会后悔。

有位专家曾经撰文说：预计20年后约有200家公司有股票会上市。届时，如果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0-30%能投入到股票市场活动中来，中国的股票市场才算完善。假若本世纪末全国人口10%的人参与了股市活动，那将是十分理想的事情。

进股市很像是下澡堂子。任你是怎样的达官贵人或是怎样的庶民百姓，在澡堂子里都叫“浴客”。在股市上叫“股民”。世界上只有这两个地方最不势利。

不过成为股民之后又会重新排列组合。那多半儿是这样三种人：赢

家、输家、玩家。这三种人在股市上争奇斗艳，令股市活跃新鲜，惊险刺激。

赢家是股市的幸运儿。上海出了个“杨百万”。“杨百万”名叫杨怀定。他因投资股票而获百万巨款而得名。

笔者还知道有那么一小批获利远不足百万元的股民，雄心勃勃地自称是“无往而不胜的枪手”。他们凭借自己的聪明与胆识，分析行情，低进高抛，靠打“时间差”获利。

这些“枪手”因成功的光环降临，便认定股市是一个充满机会的世界，是一个春光可人的“三月”。他们鄙视保留资本，更鄙视见好就收。事实上，他们便是如今那四处疯狂抢购股票的主要分子。他们赢了还要赢！他们想一生一世当赢家。

然而输家却在股市上期待落空，理想受挫，原先的资本灰飞烟灭。面对着已成一堆废纸的股票，他们无可奈何，咬牙切齿。

时下中国的股票市场基本处于稳定状态。股票发行数量过少使得市场呈现“僧多粥少”的情势。这风险毕竟没有真正来临。可上海股市也有熊市的时候。

不久前，上海股市上的股票部分下跌，上海滩竟因此而出现了奇观：那日，位于外滩上的上海市政府大楼突然遭人包围，几十名输家望着自己政府的大楼两眼在喷火，你们这些政府里的人怎么不保护我们！

有朝一日股市放开，那连篇累牍的风险，将会使更多的股民清醒。当输家对股票说，“你很美丽，但是你很无情”时，这输家便是一个真正的股民。

只有玩家潇洒自在。这类人置身股市仿佛置身大型游乐场。他们视这里的紧张严肃为某种甜蜜的娱乐。他们在股市上也许赢了，也许输了，但是他们同样谈笑风生。

一位上海G先生某天偶然路过证券交易所，见到电真空股票正在下跌。交易所内要求撤销买单的人排起

长龙。G先生颇为这里的一片“空头”喧嚷而痛心。他走到柜台前，毅然填了购买电真空股票的买单。同行的朋友惊诧他的举动，也有人认为他是股市老手，在玩低价买进、高价抛出的把戏。其实这些推测都不准确。他的真实用心很简单，也很朴实：

过去他曾是电真空股份公司中的一家小工厂的工人。那里现在还有他的师傅和朋友们。他不希望他们倒霉。

笔者曾问一位购买小飞乐股票的股民，他为什么偏偏选中这种票面不是别种。他的回答充满趣味儿：

“因为我觉得这种股票可爱。小飞乐！听上去跟小天使般地让人快乐！”

一位E女士花了不少钱买下一种股票。但是后来这股票一跌再跌，让她亏损了几乎大半儿的钱。但是E女士仍然手持这种已“贬值”的股票乐哉游哉。问其原委，E女士娇媚一笑：

“我从未指望买股票发财。我就是愿意体验上股市的感觉！”

有什么理论能解释这种在亏损时还快乐的感觉吗？

玩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玩的就是潇洒”。他们涉足股市只是追求心理价值而非金钱价值。他们是在玩一种金钱游戏。在他们眼中，玩金钱游戏是比金钱本身更为重要、更为有趣的事情。

所以玩家的股市是一种人性的股市而非理性的股市。他们购进抛出股票全凭感情。你不能说他们盲目；但他们实在只是单单听凭自己的主观感觉去行事的。

正是因为玩家的存在，股票市场上有了许多属于人间的乐趣。

(责任编辑：刘家驹)



昔日的战场  
今日的商场

# 中越边境贸易 和平发展的

阮生红



## 东兴镇——芒街

猴年正月初十，笔者从钦州出发，来到北仑河口的东兴镇。这个广西边境重镇，现在成了中越边贸的集散地之一。双方边民凭身份证，办理简单入境手续，便可自由进出两国。北仑河上的小船，像赛龙舟似的穿梭往返中越两国之间。纷至沓来的越南人，在东兴街道上摩肩接踵，或做买卖，或在商店购买他们所喜欢的中国商品；各种摊档曲折逶迤数百米，琳琅满目的小商品，令越南老乡眼花缭乱。

东兴镇的商业发展很快，房地产价猛涨，内地商人都看准了这块风水宝地。国家已投资1.3亿人民币，加快了东兴镇经济发展的步伐。

位于北仑河口的码头，是东兴镇最繁忙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大货场，集市沿北仑河码头摆开，有卖越南的各种鲜果、海产品和手工艺品的，也有卖第三国产的家用电器、小百货、手表、眼镜、时装和纺织工业品的，有零售，也有大宗批发。沿码头聚集了不少交通船只，分不清是越南的还是中国的。一只只木船排列成水上的长街。船主们站在船头上招徕生意。只要花几元人民币，十几分钟便可把你送到对岸的越南芒街。

芒街人似乎忘却了过去的恩恩怨怨，他们既亲切又开放，使中国边民对越南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芒街市场上食品丰富，既有越南的海产品，又有中国的各种轻纺工业品；既有苏格兰威士忌和法国的白兰地，又有美国的香烟、俄国鱼子酱、以及日本的家用电器和钟表等商品。为适应扩大开放，去年越南还建起了芒街宾馆，可供外国人下榻，内分豪华套间、普通客房等四个等级。豪华级套间每天房租约合人民币105元，服务周到热情，还有女郎陪夜。芒街的通信发展迅猛，电话直通世界各地。不少在我国东兴镇做买卖的港澳台商人，专

门摆渡到芒街打国际电话。

4月1日，笔者在中越边境采访途中，收听到河内电台播发越通社一则关于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指示开放21个越中边界口岸的报道。

其实，不少口岸早在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指示发布之前就开通了。

## 今日友谊关

13年前的2月17日，笔者作为随军记者和奋起自卫还击的边防部队，从友谊关进入越南同登、谅山等地。昔日的友谊关硝烟弥漫，两侧地雷密布；今天的友谊关笼罩着轻盈的烟雾。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已被消除。在中国零公里国道两旁山坡树丛中，中国边防部队官兵从纵火烧雷、爆破炸雷、手工排雷到机械压雷，把深埋地下的地雷已引爆完毕，中断了13年的铁路即可从越南首都河内直通北京。中越两国游人在友谊关附近拍照。越南官员看到中国边防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的大扫雷，十分钦佩中国军人以果断的行动支持两国政府开放口岸、发展经贸。

离友谊关不远的弄瑶、蒲寨、平面、油隘等4个边镇，在几年前还是两国军事的敏感区域，现在汹涌的经济发展大潮，使得冷落封闭的边境小镇忽然变得热闹起来。据悉，这一带的边境民间贸易每天成交额达70万人民币。人流熙熙攘攘，叫卖吆喝声和讨价还价声相互交织。越南人对中国生产的啤酒、自行车、药品、布匹、食品等十分欢迎，大量采购，由此转销越南内地。这里过去1元人民币兑换700越南盾，现在竟升值至2000盾，人民币和美元一样成为越南边民最喜欢的外币之一。

## 船头口岸也开通了

1992年4月。当“老山兰”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怒放的时候，老山船头地区360.6万平方米的地域内，

大规模的扫雷拉开了序幕。过去，这片经常发生军事冲突的山谷，突然遍地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山谷里回荡，熊熊烈火从东向西燃烧。仅仅几天功夫，雷场变成了边贸通途。

过去双方军队在船头国界线一带曾埋下14000枚防步兵地雷，400枚反坦克地雷，这高密度雷场成了双方人民不可逾越的死亡之谷。曾在自卫还击战中闻名全国的老山英雄们，又担负起中越边境大扫雷的和平使命。几十具火焰喷射器从3个纵火点同时喷火，霎时，随着火舌，从船头公路向老山方向的杂草、荆棘变成了一片火海。继而引爆的地雷炸声不绝。从22日上午9时一直响到午夜零时。

船头地区，气温已高达40℃，排雷工兵们穿戴着10多公斤重的防护装具，一连几日烈日暴晒，汗水浸泡了全身，为及早开放船头口岸，他们连续奋战，开始了第二道工序：爆破炸雷。在那拉口子国界石桥的中越公路上，工兵们趴在滚烫地面上，拉动各自操纵的单兵火箭爆破器的发火装置，启爆炸雷。随着一声声闷响传来，旋即火光、烟柱冲天而起。4月25日，排雷工兵进入第三道工序：手工排雷。就是把埋在深层的反坦克地雷用手挖出。这是最危险的一关，随时都有可能碰响一颗刚震松发火装置。然而中国边防部队的工兵们以熟练的排雷技术，将埋在深层一颗颗各式地雷掏取出来，从未发生过一起事故。4月28日，扫雷工兵部队又把10余吨重的军用推土机开上了船头公路滚压数遍，直到没有听见任何爆炸声才罢休。至此，船头一带公路线上的地雷全部排完，不留隐患。5月1日，中断14年的中越船头公路全线通车，百孔千疮的路面，迅速修复，中越双方公民开始了贸易往来。死亡之谷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船头口岸开通了！昔日的战场现已变成市场。

## 河口的“越南街”

河口历史上就是中越边境的一个口岸，它的对岸就是越南的老街。

如今的老街人来车往，一派和平景象：街上的食品店中，各种食品丰富多彩，任人选择。

这里位于东京湾三角洲，地理条件优越，自越南从长期的战争灾难中摆脱出来，又实施经济改革政策后，这个地区实行了彻底的家庭承包制，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私有制”得到普遍认可，农业生产有了惊人的发展。越南一直是缺粮国，但在1989年，越南破天荒出口大米达142万吨，1990年出口大米达150万吨。在与中国接壤的北部边境，即使是在全年最寒冷的一、二月份，也可以见到水汪汪、棋盘格似的整齐农田和绿油油的秧苗，以及男女老幼在稻田愉快、辛勤劳作的情景。越南人均国民收入仅200美元左右，但越南的教育制度在亚洲国家中算得上是很完善的，中小学实行上午和下午两部制教育，全国识字率已达到88%。

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河口瑶族自治县这个中国少数民族集中的边境地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振兴新机遇。云南省省长和志强说：“目前，边贸已在全省4000公里边境线上的26个县全面展开。”河口仅是其中之一。目前在河口已建起一个贸易市场，当地称之为“越南街”。在“越南街集市上，有越南边民长期开设的240个家庭式的固定摊位，一般资本较厚，所销售的产品档次也高一些，如俄式手表、剔骨刀、不锈钢餐具、电热淋浴器、食品加工机械等独联体产品，也有泰国的化妆品、日本的家电产品、越南牛角工艺品等等。大部份越南边民朝来夕返，肩挑手提销售小量的各种蔬菜、水果、鲜鱼、蟒蛇、蜥蜴，还有猴子等珍贵禽兽及硬木雕花床椅、竹编等，大量的还是农作物。据越南农业部长阮功丹说，改

革使越南从一个大米进口国变成重要的大米出口国，今年越南南部的春稻在没有前苏联供应化肥的情况下，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80年代后期越南实行的农业改革，允许农民长期租用农田，农民可以把农产品拿到自由市场出售。

在边贸中，我方向越南提供的产品有60多种。其中，有化肥、布匹、白糖、电池、胶鞋等。越南提供我方的货物主要是优质大米、香蕉、黄连粉、木材等农产品。去年双边来往人次达60万，今年势头更猛。为进一步发展中越边贸，河口镇人民政府计划兴建一个占地12万平方米的经济合作区。现在河口镇已有全国各地设立的33家商业点。

## 昔日军事前沿 今日贸易前线

1991年中越边境民间贸易额据最保守估计，已达到3223万美元，今年扩大开放21个中越边界口岸，边贸金额将成倍上翻。

越南百废待兴，是一个难得的销售和投资市场。由于连续几十年的战争，越南顾不上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越南有森林面积730万公顷，北方边境的广宁、谅山、高平、河宣、黄连山、莱州6省就占2/3。此外，还有煤、铁、磷、锡、锌、金、水银、锰、锑等十几种矿藏，有待开发。1990年以来，美国石油公司在越南大陆架初步探明石油储量达3000亿桶，仅次于中东。美国对越南丰富石油资源，垂涎三尺。据越南一些人士透露，越南一些重大项目都等着美国投资开发。越南感到比中国落后，在地缘上必须靠中国，但在经济技术上，要依靠美国和西欧的发达国家。

越南这个淘金地，吸引世界各国的合作伙伴；据胡志明市工商处公布：1990年共有1414个外国代表团来该市洽谈商务。1991年平均每天

有8个商务代表团到胡志明市来。中国是第8批到越南洽谈的。中国商务代表团经6天反复艰苦的谈判，越方邮电部觉得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厂生产的S12全分散数字程控交换机和广西桂林光安通信设备厂生产的附件的技术性能、价格及售后服务等优于法国生产的，最后才做成这笔大生意。

在1989年至1990年3年间，越南批准的外国投资项目达200项，吸引外商投资金额超过12亿美元。1992年1月底，日本企业决定参加开发越南南部海域的石油和天然气。为促进吸引外资和技术，扶植出口产业，去年11月底，越南制定了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地区”）设置令。今年1月，又批准了法国和泰国等国6家银行在越南开办分行。

## 争相赴越南“淘金”

越南正扯起风帆，迎接八面来风，希望自己能成为下一个启航驶向富裕的东南亚国家。美国的投资者只希望他们不要误了这艘航船。

而布什政府却畏缩不前，于是美国民间争相赴越南“淘金”，老兵挺进金兰湾。这些美国客人的身份对越南政府来说的确有些微妙之处。17年前，这些美国人曾身陷越南丛林，成为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无情子弹的追逐目标，他们的同伴有的被击毙在这里；他们也曾驾驶B52轰炸机在越南的村庄、城镇实施绝灭人性的地毯式的轰炸，造成越南人民的巨大伤亡。今天，这些早已解甲的侵越南美军重返旧日的杀戮战场。他们随身携带的当然不是卡宾枪，而是当今越南急需的美钞。美国加特彼勒公司负责泰国及印度业务的推销员约翰，七十年代初是派驻越南的美军。他最近飞抵河内时说：“回到越南，确实充满激情。民众从我的衣着就知道我是美国人，但我没有感到半点敌意。”当年一位在越南战场苦熬了3年的美国退

役海军军官多尔顿，最近筹划了一项有关越南自由市场经济教育计划，传授市场经济的经验。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所罗门访问河内期间，答应在7个方面向越南提供最少300万美元的援助。越南则同意协助美国专家搜寻战时失踪的美国军人踪迹。

在越南政府的压力下，在金兰湾的所有的俄国士兵，将在今后数月内离开这个军事基地。苏联军官以前可以随意进出这个基地，现在，他们必须得到越南当局发放的许可证才行。自1975年越南统一以来，越南要苏联每年支付4000万美元的使用费，现在，越南任意将这个基地的租金提高了10倍。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深水港之一。河内准备利用它建立一个贸易、工业和休养中心。1991年以来，苏联驻这里的官兵只有500多名了。据说，美国老兵挺进金兰湾，在那里又受到欢迎。第一批投资建造的饭店正拔地而起。目前，美国已批准国民可以观光团形式到越南旅游，旅美越侨也获准通过美国的银行寄钱回家乡。越来越多的越战结束时逃往美国的越南人重访故国，带回不少资金和技术。

## “广西——香港——越南”三角构思

笔者在中越边境采访，了解到广西的有识之士深感广西乃至中国对越口岸贸易和投资都面临新的机遇和激烈竞争。越南战后重建，转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百废待兴。越南的工厂设备，零件缺乏，残缺破旧，大都是五六十年代苏联和中国援建时的机械

的服装厂，原为苏联和匈牙利加工服装的厂，由于机器陈旧、原材料不足，现都闲置。中国援建的项目现都急需恢复和更新设备和技术，大量进口所需原材料。而这些设备、技术及原材料，非我莫属。

台湾利用外汇储备的优势，对越南的投资总额已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中占据首位。据越南官方统计，截至1991年底，外国企业对越南的累计投资额已达27亿美元，其中台湾投资达到6.02亿美元。台湾企业纷纷进入越南，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越南劳动力和地价低廉。另有一方面，受去年11月中国与越南关系正常化余波的影响，一致同意签署的投资保护协定以及互设贸易办事处事项至今仍处“搁浅”状况。台越经济交流却得到了加速发展。另原因是越南仍有其自身的魅力，其中一点就是胡志明市有一大批善于经营的华人。胡志明市由西贡、嘉定、堤岸3个区组成，面积2029平方公里，人口390多万。历史上十分繁华，西贡和堤岸被称为“东方的巴黎”。华人经营的私营企业800多家，由于以前越南政府排华，现华人回归后，他们把隐藏着的大量资金和黄金用于重振旧业。很快走向复苏。这批华人同从北京往南沿着环太平洋国家到雅加达的强大的华裔商人有着天然的联系，胡志明市能迅速出现繁荣的生机。主要是由于他们注入了活力。越南从中国的“特区”中吸取了经验。胡志明市政府1990年在市郊的守德区划出5000多公顷的土地作为免税区，供外国人投资。现在越南中央银行、外贸银行、商业银行这三大银行美元储备和支付能力仍不景气。我边贸口岸的公司与越南洽谈业务，越南对中国的商品都想要，但

谈到支付时，越方两手一摊没办法了。正如越南中央银行对外部主任阮宫海说，越南就像一条饿汉。但如果我们吃得过多，我们将会撑死。所以，目前广西商界的有识之士与越南做生意，合作办实业，尽量争取做有联合国贷款的项目，减少风险。并努力采取“广西——香港——越南”的三角构想，即大的生意和投资项目，我方与驻香港机械构或公司联为一体，由香港融资，把我方贸易和投资的风险转嫁到国外银行上。这样可能既同越南做成大买卖，搞到一些大项目，又能使贸易和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鉴于越方支付能力差，可以让其提供优惠政策补偿，如允许广西、云南优先开发边境越方一侧的森林、矿产资源和房地产，提供特种运输证，搞跨国汽车运输等等。广西的同志去越南考察，结合我国国情，发现在越南可以搞不少项目。如橡胶来料加工轮胎，销往东南亚国家；越南许多服装厂停工待料，而出口服装配额较多，我方可以利用他们现有的设备和技术力量，承包组织生产；越南木材资源丰富，质量好，我方迁去一些木材加工工厂，就有做不完的生意；目前河内、胡志明市许多房地产都可以供我方进军开发，如在河内购地建宾馆、商店、在胡志明市堤岸华人区合作建“中国城”等等，在充满发展机会和赚钱机会的“东方巴黎”大显身手，施展中国人的才能。

总之，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许多国家都对越南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作出反应：已有9个外国集团投标争取对大熊油田的开采权，该油田是越南最大的近海油田。我国将面临更强硬的竞争对手。

(责任编辑：刘家驹)

# 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

## 征 聘 著 者

热烈欢迎有志学者积极参加撰写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办公室

为弘扬中华民族之文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决定编撰百卷中国文化巨著——《中华文化通志》。全著分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共10典100志，每志25—30万字，全书共2500—3000万字，五年内完成。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已组成，由萧克任编委会主任，李学勤、宁可、王尧、刘泽华、孙长江、庞朴、陈美东、刘梦溪、汤一介、姜义华等十名国内外学术界有影响且年富力强的专家、学者任编委会委员，并分任各典主编，具体承担各典10志撰稿的组织和审定工作。总策划姜义华、张国琦。

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全面、系统地阐明中华文化的总体结构、历史沿革和主要特征；同时将从制度文化、物化文化、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及其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等方面，具体翔实地总结和阐述中华文明所作的贡献。

这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工程，它将以全面性、系统性、权威性成为研究中国国情的一部重要文献，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对于推动祖国统一大业以及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将起着重要作用。

为集合全国学术界力量共同完成这一宏大工程，编委会决定向海内外征聘各志的编撰者，尤欢迎广大中青年学者以弘扬中华文化的豪情与责任感参加这一工作。

应招办法是：

- 1、向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办公室（北京市文津街7号北图分馆6号楼）索取申请书。
- 2、按要求填写申请书，提出课题设计的初步构想，于1992年10月底以前寄回办公室。
- 3、每人应招不得超过一志，每志可由一人承担，亦可二、三人合作，但不得另组编委会。
- 4、由编委会选定的各志编撰者，参加将于年内举行的全体作者会议，研究编撰事宜，分别与各典主编签订协议，以保证质量准时完成编撰任务。

这项工程规模宏伟，意义深远，已得到各方面有识之士的积极赞助。北京丽人美容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茜女士，决定给每志撰稿人赞助科研经费1万元，共计100万元。我们欢迎海内外热心中华文化的各界人士支持、赞助这一惠及炎黄子孙的伟大事业。

附《中华文化通志》目录

# 《中华文化通志》拟目

## 一、历代文化沿革典

(主编: 李学勤)

1. 中华文化起源志
2. 商代西周文化志
3. 春秋战国文化志
4. 秦汉文化志
5. 魏晋南北朝文化志
6. 隋唐五代文化志
7. 宋辽金元文化志
8. 明代文化志
9. 清代文化志
10. 现代文化志

## 二、地域文化典

(主编: 宁可)

1. 秦陇文化志
2. 中原文化志
3. 齐鲁文化志
4. 荆楚文化志
5. 吴越文化志
6. 巴蜀文化志
7. 闽台文化志
8. 岭南文化志
9. 港澳文化志
10. 海外华人文化志

## 三、民族文化典

(主编: 王尧)

1. 壮、傣、布依、京等族文化志
2. 满、锡伯、赫哲、鄂温克、鄂伦春、朝鲜等族文化志
3. 蒙、土、东乡、达斡尔、保安等族文化志
4. 维吾尔、柯尔克孜、哈萨克、俄罗斯、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裕固、撒拉等族文化志
5. 藏族文化志
6. 彝、纳西、拉古、基诺、傈僳、哈尼、白族等族文化志
7. 苗、瑶、畲等族文化志
8. 土家、景颇、羌、普米、独龙、怒、阿昌、珞巴、门巴等族文化志
9. 回族文化志
10. 侗、黎、佤、水、毛难等族文化志

## 四、制度文化典

(主编: 刘泽华)

1. 宗族志
2. 土地与赋役制度志
3. 工商制度志
4. 社会层级制度志
5. 中央职官志
6. 地方行政制度志
7. 选举志
8. 社团志
9. 法律志
10. 兵制志

## 五、教化与礼仪典

(主编: 孙长江)

1. 社会理想志
2. 德育志
3. 智育志
4. 体育志
5. 美育志
6. 学校志
7. 礼仪志
8. 家范志
9. 交谊志
10. 政德志

## 六、学术典

(主编: 庞朴)

1. 儒学与经学志
2. 诸子学志
3. 哲学志
4. 史学志
5. 政治学志
6. 经济学志
7. 法学志
8. 教育学志
9. 军事学志
10. 语言文字学志

## 七、科学技术典

(主编: 陈美东)

1. 天学志
2. 地学志
3. 农学与生物学志
4. 医药学志

5. 算术志
6. 物理与机械志
7. 化学与化工志
8. 纺织与冶铸志
9. 建筑志
10. 水利与交通志

## 八、艺文典

(主编: 刘梦溪)

1. 艺术理论志
2. 歌诗词曲志
3. 小说散文志
4. 戏曲志
5. 美术志
6. 乐舞志
7. 曲艺杂技志
8. 新闻志
9. 典籍志
10. 景观志

## 九、宗教与民俗典

(主编: 汤一介)

1. 佛教志
2. 道教志
3. 伊斯兰教志
4. 基督教、犹太教志
5. 民间宗教志
6. 饮食文化志
7. 服饰文化志
8. 婚嫁志
9. 丧葬陵墓志
10. 民间风俗志

## 十、中外文化交流典

(主编: 姜义华)

1. 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
2. 中国与东南亚及澳洲文化交流志
3. 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
4. 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
5. 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
6. 中国与西欧、南欧文化交流志
7. 中国与东欧、北欧文化交流志
8. 中国与俄国文化交流志
9. 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志
10. 中国与拉丁美洲文化交流志

# 感谢关心支持 欢迎批评监督

本刊已发的郑超麟、师秋朗等同志的来信，在读者中引起积极反响。新疆读者杨仁宝高级工程师也就《延安谜案，王实味平反》一文致函本刊提出了一些问题，本刊特邀编委、文章作者温济泽先生当即作复，并对用稿文字处理提出了不同意见。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霜晓教授，来函在史学以至社会科学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作家赵勇田、朱亮和姚锡佩等都对本刊编辑工作中的差错作了认真的批评指正。还有许多读者反映买不到、订不到、看不到本刊。这些批评很有利于本刊的检查和改进工作。除对来信者表示深切感谢外，特选发摘编一部分，敬请广大读者、作者继续关心支持和批评监督本刊。

本刊编辑部

## 关于王实味问题致读者

杨仁宝同志：

《炎黄春秋》编辑部转来了您5月19日的信，兹简复如下。

毛泽东说要还他一个王实味，只是说不该将他处决，并没有说应为他平反。毛泽东一直还是把他看成国民党特务的。

为王实味平反，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1982年，中央组织部作出了为“五人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1986年，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中，正式宣布了关于王实味是国民党特务的说法不能成立。1991年，公安部又作出了为王实味托派问题平反的决

定。至此，王实味冤案已完全平反。我在文章里已叙述清楚了。至于文学史之类的著作中，今后对王实味的评价，会有改变的。

“历史谜案”，不是我的文章的原题，是封面设计者未征求的我意见而随意加上的。“谜案”二字不妥。我的文章发表后，国内外有多种报刊转载。大家都已确认王实味平反了。至于过去怎样搞错的，平反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文中也作了说明，不知还有什么问题否？

此复，即颂 夏安！

温济泽 1992.6.6

## 真实才是历史

编辑同志：

我作为贵刊的一名读者，认为文史类刊物能吸引我的，并不是耸人的秘闻、轶事。而是评介人物时有历史的高度。读贵刊第六期所载。师秋朗女士题为《应该留下真实的历史》的来函，受其启发，仅谈两点看法。

一、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阴暗面、缺点和错误。马克思说过：“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马克思在这里是从历史的高度，说的是“人类”历史上的“罪过”。我认为对共产党的错误、阴暗面之类，也还是将其真相说出来为好。因为，第一，说出真相本身就是总结教训的开始，就是一种进步。如贵刊第四期报导的“王实味平反”一案，就使我知道李维汉同志晚年在这一事件中的公正态度，澄清了以前流传、报导中一些不够全面、准确的地方。增加了我对李维汉这样一个老共产党人的了解和尊敬。第二，现在不说，将来总有人说，自己不说，别人总会说。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岂能对自己的错误都不敢“解放”。

二、正确看待正面人物的缺点和反面人物的长处。似乎有这样一种“法则”在起作用：对已有定评的反面人

物，特别是死了的，说他有点长处，似乎还铸不成大错。但对正面人物，特别是活着的领袖人物，要写他的缺点、毛病，就有相当风险，甚至是“禁区”。要是说“历史服从政治”，当然无话可说，但是党章上也没有禁止对领袖人物的批评（注意：是负责任的批评，而非其它）。我认为，作为历史人物，有缺点的领袖仍是领袖，领袖的缺点也仍是缺点。有长处的坏人仍是坏人，而坏人的长处，后人似也不必弃如敝履。

师秋朗女士信中说到“应该留下真实的历史”，本人认为“真实才是历史”（此处不涉及历史学定义、范畴之类，只是指对过去事件的表述）。也只有真实才成了历史。用迷信塑造历史，用历史解释迷信，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

还有，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在哲学上是够准确的，正确的提法应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对此也希望引起关注。

谨颂 编安！

霜晓 1992, 5, 15

# ※※※※※粗心大意 照片印反※※※※※

赵 勇 田

图文并茂的《炎黄春秋》杂志面世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我是每期必读，每文必看，获益良深。近读第六期，发现所刊登的照片有若干张印反了：

一、封面右上角毛泽东三人照片印反了，按常规军人胸前勋章的略表应在左侧；两位军人的武装带应是右肩左斜才对。

二、第五页下端“闽台文化学术讨论会”的照片，大会会标是反字，证明此片印反了。

三、第12页刘伯承、邓小平二人合影照片，刘伯承的纪念章、邓小平的胸章都到本人的胸前右侧了。

四、第54页李英儒写字的照片，是左手写字，据知李英儒生前右手没有残疾，照片上为何左手握笔呢？第57页李英儒和孩子的合影也印反了。

五、第66页作者杨永革在陈永贵墓前留影照片，细看“陈永贵之墓”几个字都是反的。

六、封四邓小平的照片也印反了。

为了防止出版物上不出技术性错误，关键是在编、排、校、印全过程中各个环节都要极端地负责任，慎之又慎，层层把关，把错误减少到最小限度。

此外，把健在的萧乾列入“殒星篇”实在不妥。

# ※※※※※希 望 加 强 校 对※※※※※

**朱亮：** 贵刊是一份很有特色，深受读者喜爱的杂志，史料性、文学性均强。只是校对上差错较多。如第六期刊登的拙作《陈立夫惠书大陆丹阳》目录页标题就遗漏“丹阳”两字；第79页陈立夫绣像下的文字说明“陈立夫像（乱针绣）存给简任官。”应为“陈立夫像（乱针

绣），”后面多出的几字显然是正文中的；后19行“杨守玉的乱绣”应为“杨守玉的乱针绣”；第80页右第2行“陈立夫又将三帖墨宝”应为“陈立夫又将三帧墨宝”。

作为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刊物，如果在最后一校中细心一点，上述差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姚锡佩：** 贵刊总第6期刊载的拙文《杂文大家聂绀弩的坎坷路》，排印错误颇多，现拣出19处希予更正：

页 行	错	正
48(中)14行	退 <del>櫻</del> 老庄哲学	嬰
48(中)倒6行	鮑薰 <del>僧</del>	慧
(右)1行	(同上)	(同上)
48(右)26行	概括为“吃人”一词	的
48(右)31行	抒 <del>紺</del> 弩	把
49图片文字	“五十周年今超蜜月”	去掉“周”
50(中)10行	《文艺界同人为团体》	结
11行	御海与主论自由宣言	言
50(右)3行	《误<金瓶梅>》	谈
51(左)8行	神鬼描写	魔

页 行	错	正
51(左)18行	《悠悠六士》	十
51(中)12行	思想 <del>推</del> 新坦白难	推
51(中)倒11行	只谈谐、滑稽、	“只”字前漏“岂”
51(中)倒5行	在一种无法自拔	“拔”字后漏“下”
51(右)倒15行	斗室深宵的灯火	燭
51(右)倒5行	满面伤痕 <del>杀</del> 泪痕	杂
52(中)倒14行	被周颖视为小阿妹	把
53(中)倒11行	他早年形体残疾	“早年”后漏“对”
53(中)倒3行	任人思 <del>故</del>	考



# 本刊重要启事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本刊按原报批所定，自1993年1月起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每月11日出版。

本刊将继续保持其思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并强调其真实性和史料价值，以广阔的选题和丰富的史实，以多色多味的栏目和雅俗共赏的文体，展示炎黄文化成果，记颂中华历代英杰，回顾民族发展历程，描绘神州人文风貌，讴歌改革开放大潮；同时将切实改进版面，提高质量，密切与读者、作者的联系，使本刊以崭新面貌成为广大读者更为亲切更可信赖的朋友。

《炎黄春秋》欢迎老读者继续订阅，热切期望有更多的新读者。现将有关1993年度《炎黄春秋》杂志订阅事项公告如下：

订 阅 处：《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订 阅 时 间：本启事公布后至1992年12月30日。

定 价：每册2.98元，全年12期共35.76元，半年6期共17.88元，一季度3期共8.94元。批量包销办法另议；少量临时需要者，收款后即寄刊物，每册另收邮挂费0.30元。

银行汇款户名：《炎黄春秋》杂志社；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地安门分理处；帐号：032-144230-76

邮局汇款：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炎黄春秋》发行部；联系人：张勤；邮政编码：100802 电话：6016633-227 6846929-3243；

汇款时，务请写清订阅人（收书人）的详细通信地址、姓名和邮政编码，字迹切勿潦草！

需要发票者请注明，款到后立即邮寄发票。

欢迎您踊跃订阅《炎黄春秋》，本刊保证及时地把刊物寄给您先睹为快！

《炎黄春秋》杂志社

炎 崇  
春 秋

● 龚自珍兴王论中的改革观

● 和平发展的中越边境贸易

● 十年厄运 十年辉煌

● 中华英烈彭干臣

● 鬼城丰都悠悠情

● 林园逸事

● 张灵甫死之谜

